

河西居民口述史

河西区档案馆
2023 年 10 月

目 录

两颗哑弹的故事.....	001
河西区革命史之南围堤河战斗.....	006
志愿军老战士：祖国的神圣领空不容侵犯.....	012
老兵周昌达：难忘的赴朝参战经历.....	016
董湘崑：我只领七角五分钱.....	020
朝鲜战场的回忆.....	023
抗战记忆.....	025
乔玉锋事迹.....	028
衡玉山事迹.....	031
引路人，恩人，我尊敬的人.....	038
社区文化志愿者贾铁藩个人事迹.....	045
儿时的战争印象.....	047
圆梦新时代.....	051
北洋旧事.....	053
改革开放前后那些事.....	056
难忘投身抗战岁月.....	059
鹰击长空 捍卫蓝天保家园	062
弘扬红色文化，追寻红色记忆.....	064
刻骨铭心永不消失的记忆.....	066

改革开放与我	070
最难忘的一次战斗	073
日新月异	084
我记忆中的天津卫	088
最美好最幸福河西区	090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092
抗美援朝卫生员——卫素润	094
毛主席不吃肉的故事	096
天湾园社区“口述史”	098
《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故事	099
做疫情中坚定的“逆行者”	101
不忘亡国恨 永保太平年	103
一个四零后对解放初期的记忆	105
我的岳父母	109
志愿军老战士的硝烟记忆	111
铸就辉煌让生活更美好	113
魏荣龙同志事迹	116
七十年前的回忆	118
抗战老兵孙德彩：干一行爱一行，党叫干啥就干啥 ...	120
老兵孙德彩：我的抗战史	124
百岁老人话说人民公园	128
人民公园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134
忘不了的一幕幕	137

人民公园琐记	139
宝和里与人民公园	148
人民公园是我最向往的地方	153
谈谈人民公园老花把式杜文凯	156
我在人民公园当“义工”	159
人民公园趣事	165
我所知道的人民公园	169
人民公园戏曲长廊趣事	173
人民公园的回忆	176
地震后的人民公园	182
厦门路 35 号的考察与推测	186
亲历人民公园辅导班 亲闻埃克斯院长葬礼	190
人民公园——抹不掉的记忆	195

两颗哑弹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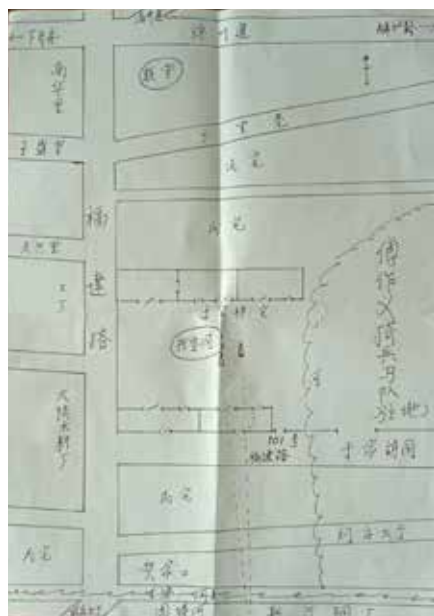
口述历史，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本期口述史是根据河西区居民沈万利先生亲身经历编写而成，讲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天津战役中，为避免伤及百姓所做的爱民之举。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那段难忘的岁月。



口述人沈万利近照

解放前，我们家住在天津市第六区福建路101号（现河西区富裕广场）大院内南面的一间小平房里。院西面是福建路，

院东面有个足球场大的院子，里面驻扎着国民党傅作义的骑兵和马队。



沈万利手绘防空洞及傅作义骑兵马队驻地位置图

1949 年新春，解放天津的战役将要开始。人们为躲避战火就都忙着在自家院中心挖了防空洞。一天清晨起来发现东大院的骑兵马队都走光了，驻军的院子里一片狼籍。昨晚吵扰的人们都睡不着觉，也不敢出屋看个究竟，这一夜人喊马嘶整折腾了一个通宵呀！1 月 14 日是农历腊月十六，攻打天津的战斗打响了，从白天一直打到转天上午，枪炮声轰鸣不断，我们全家和邻居都躲到防空洞里。不知何时辰，突然“咚、咚”有两个大家伙先后掉到我家防空洞周围，砸的地面嗡嗡颤响，洞内的人们谁都不敢爬出洞看是什么东西，只知害怕，听天

由命吧。人们都互相偎着，屏着气，不敢出声，祈祷老天爷保佑平安无事啊！攻城大战打了一天多呀！终于炮声没了，枪声也渐渐的稀少了。不知过了多久，马路上有断断续续的跑步声，逐渐跑步声多了。防空洞内人们正想出洞看看外边情景时，突然有人拍打我们家院大门，并大声喊：“老乡开门，老乡开门呀！”我父亲在洞口蹲坐着，他壮着胆从防空洞爬了出来去开院门。门一开前后拥进四五位背挎着枪，头带大皮毛帽子的军人，对我父亲客气地安慰：“老乡让你们受惊啦，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进院里找点儿东西就走，别怕....”他们进院后就看见了那两颗大铁筒（大炮弹头，长约40厘米左右），他们过去抱起铁筒说：“老乡，我们拿走啦，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吧。”军人们把两颗没有爆炸的炮弹头搬走了。我父亲赶紧回洞口向大家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洞内十几口老小先后爬出防空洞各回自己家了。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向天津发起总攻

（资料照片）

我父亲出了防空洞一看自家住房，傻眼了，房子朝向北的大窗户都破碎了，院子里碎玻璃撒了一地，再打开房门往屋内一看，啊！屋南墙出了个大窟窿。后来分析，这是由一颗炮弹头从房南墙外穿透墙后进屋又继续穿过北窗户后落到了院子里。另一颗炮弹头是飞跨过我们屋房顶后掉落在院子里。炮弹头为什么没有爆炸呢？后来打听才知道，那是因为解放军为避免伤害无辜老百姓，炮弹在入膛前就把炮弹的引火盖拆下来啦，所以炮弹落地后没有爆炸。这就救了我们一家五口（父亲，母亲，哥哥，我和将降生的大妹子）及洞内邻居共计老小十几口人的性命啊！万幸，万幸！



天津战役中激烈的巷战（资料照片）

这年正是我父亲沈学仁而立之年。他从十八岁独自走出家门闯荡，学到了一门车工手艺养家糊口，经历了千辛万苦，如今我们全家人在这两天炮火中躲过了大难，毫发无损，这都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为感恩报恩，他拥护新社会，积极参加了解放初期的护厂、复工生产运动，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从基层抽调到天津市第六区工会联合会机关工作，1955年在全国开展的公私合营运动中被委派为公方代表，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先进工会干部，1956年去北京受到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并在中南海怀仁堂广场合影留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那两颗炮弹不是哑弹，就没有我们全家的今生今世！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全家的大救星、大恩人！我们要世代牢记，教育下一代永不忘本。

（根据沈万利先生回忆整理）

河西区革命史之南围堤河战斗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将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北平（北京）、天津、张家口地区，予以各个歼灭的战略决战性战役。是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

1947年，国民党守军陈长捷搞起了所谓“大天津堡垒化”的城防工事建筑，地处天津东南的尖山地带，是当年国民党守军的城防线。决定沿复兴门、前后尖山和黑牛城的南围堤河一线，利用旧有河道，加深加宽，挖成了一条3米深、10米宽的城防河。南围堤河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环绕全城43千米的城防河一部分。还在南围堤河（城防河）内沿菜地筑起了一道6米高的土墙，墙上密布铁丝网、电网。每隔200米筑一个大碉堡，周围设子母堡群。护城河外沿地势低洼，满是沼泽，是一片苇子地，敷设5道铁丝网，并通上了电流，埋设了宽40米的地雷区，还堆设了鹿砦。为了防备人民解放军从津南突破，特别利用南郊众多的砖瓦、白灰窑，在灰堆镇陈兵设防。并在中纺二厂（今棉纺二厂）一带，设二道防线；耀华中学附近设第三道防线。敌人沿城防河共设380个大碉堡，集中了13万兵力，组成集团防御，企图固守顽抗。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右坐者），正通过电话向天津攻城部队下达总攻命令。

人民解放军平津战役指挥部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1949年1月14日，我军发起总攻。在天津南线由46军137师、145师担任主攻。137师为右翼，在36门山野炮、重迫击炮和7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在南围堤河（城防河）桥（今解放南路南围堤河立交桥和尖山桥以西100米处，已拆除）以东地段实施突破。145师为左翼，在南围堤河桥以西地段实施突破。并部署一定兵力，东从灰堆向上河圈、陈塘庄方向；西从纪庄子向八里台佯攻。4时，各主攻团（137师409团、145师433团）进入阵地，3营是突击营，提前于13日夜12时就进入阵地。8时，佯攻方向开始动作。9时40分，我军

强大的炮火一齐向敌人阵地猛轰。顿时浓烟火光笼罩了整个南围堤河城防。



指战员通过天津护城河向城内攻击

经 40 分钟轰击，145 师突破口两侧敌人的明显目标已大部摧毁。但 137 师方向受地形限制，我军炮兵阵地距敌人目标较远，西北风又把左翼烟雾吹来，以致未能将突破口两侧敌人堡垒摧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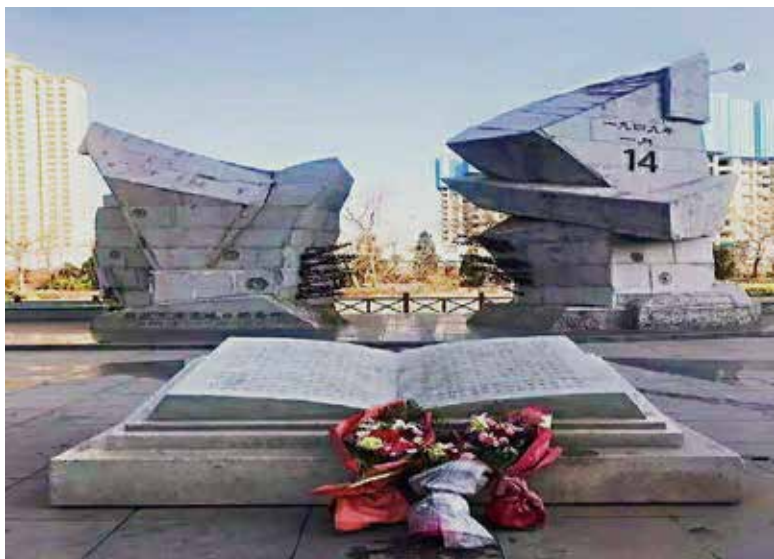
1949 年 1 月，第 46 军参加天津战役攻坚战。图为指战员向天津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10时40分，137师409团3营9连30名战士抬着梯桥在敌人的炮火下，向南围堤河猛进。敌人以大量燃烧弹向我袭击，梯桥被烧毁。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又连续架桥均未成功，我军伤亡重大。137师409团3营（突击营）刘树森营长见架桥不成，决定向前冲击组织爆破。3营7连（尖刀连）沿着战友流下鲜血的路，向敌人占据的南围堤河岸碉堡群冲上去。

13时20分，137师409团3营机炮连再次组织火力掩护，409团7连1排（尖刀排）1班（尖刀班）班长吕树华举起“登城先锋”红旗，率领尖刀班跃出交通壕，像脱缰的马、脱弦的箭，从硝烟弥漫的开阔地冲向突破口。敌人的子弹像雨点般的射来，吕树华班长中弹牺牲。副班长罗开云抢上前接过红旗，又向前方冲去，在通过南围堤河（城防河）时又负了伤。于米福接过红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城防的碉堡连续投中了3颗手榴弹，消灭了碉堡里敌人，首先登上了城垣。13时32分，胜利的红旗在南围堤河桥以东地段的上空高高迎风飘扬。409团7连1排战士紧随而上。这时409团3营7连2排6班班长郑英文也率领3名战士冲进城垣向地堡里的敌人射击，一个箭步就冲到两个枪眼之间，从枪眼塞进手榴弹，消灭碉堡里敌人10名，占据了城堡。守敌乘我立足未稳，从三面向我反扑。3营7连及后续部队8连、9连等连续打退敌人10多次反扑。300多名战士英勇牺牲，用血肉之躯坚持守住突破口。

此时，我军后续部队陆续插入，迅速向纵深发展。在前尖山、土城、黑牛城与敌军反复争夺阵地。从13日夜12

时137师409团3营进入阵地起,经过2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至15日4时我军终于攻占前后尖山。46军主攻团——409团在突破口和前后尖山战斗中共伤亡836人。



解放天津突破口纪念碑

199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陈塘庄车站花园内建立解放天津攻城突破口纪念碑亭。许多中小学坚持多年运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保持与当年参加突破口战斗的部队的联系。2002年,根据解放天津战役南围堤河(今复兴河)桥突破口突击营营长刘树森营长的建议,天津市政府在南围堤河改造工程中,保留3座残存的碉堡,立上带有说明的牌子,成为解放天津的见证。同时在解放天津南围堤河桥突破口原址,结合南围堤河绿化,建立解放天津南围堤河突破口纪念碑,与平津战役纪念馆、解放

天津会师纪念碑、东西突破口纪念地、解放天津烈士陵园形成解放天津的系列纪念地，以告慰为解放天津而牺牲的革命先烈。

本文根据《河西区志（1979-2010）》刊登的解放天津战役南围堤河（今复兴河）桥突破口突击营营长刘树森同志口述整理而成。

志愿军老战士：祖国的神圣领空不容侵犯

讲述人：屠龙根，1934年8月30日生，上海人，家住河西区桃园街连荣里社区。1951年入伍，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解放一江山岛战役，1967年退伍后来津，曾担任天津无线电一厂副厂长、副经理、厂技校校长、中环科学仪器公司工会主席。



本文讲述人、志愿军老战士屠龙根
老先生近照

争、解放一江山岛战役，1967年退伍后来津，曾担任天津无线电一厂副厂长、副经理、厂技校校长、中环科学仪器公司工会主席。

我叫屠龙根，今年89岁，1934年出生在上海市的一户贫困家庭当中。小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

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恶不作，我心中早早就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一定要把帝国主义强盗和剥削阶级赶出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6月，十七岁的我和一位同样在上海石库门长大的邻居好友，在一位邻居医生（实则是我党的老地下党员）的介绍下，一起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参军以后，我们来到了杭州，就读于浙江军区后勤干校，主要学习战地医疗专业，为后面随时入朝抢救伤员做准备。

我们在杭州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本来准备作为陆军的卫生员入朝参战了，结果在1951年秋天，志愿军空军来到我们学校招收维护战斗机的地勤人员，从我们连100多人中，挑选了10多名同志。就这样，我们跟随志愿军空军的首长，来到了祖国东北边疆的安市（今辽宁省丹东市）。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参战的志愿军空军驻地在我国境内，屠龙根老先生年轻时军装照只有有作战任务时才会根据需要飞往朝鲜上空。这是为了保障刚刚新生的志愿军空军的有生力量能够更高效地投入战斗。作为空军地勤，我们就在安东军用机场参加了抗美援朝，这也是我为什么虽然参加了抗美援朝，但是并没有出国作战的原因。

刚到东北的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学技术，是老同志带着我们来维护飞机。我们的工作，就是让祖国的战鹰每天都处于最佳状态。

当时，帝国主义的飞机经常飞过鸭绿江，进犯我国领空，偷袭我们的边境机场。有一天，我和战友们正在保养战机，突然，数架美国飞机出现在机场上空。我和战友们赶忙隐藏飞机设备并就地隐蔽，现场大家离得都不太远，在美国飞机对地面一阵疯狂扫射之后，我们一位战友不幸中弹倒在



屠龙根老先生收藏的由我志愿军空军击落的美制战斗机前风挡残片打造而来的我志愿军空军米格-15战斗机模型

血泊之中，英勇地牺牲了。抱着牺牲战友的遗体，战友们悲愤交加。大家暗自发誓，一定要打败美帝国主义，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紧张的战斗还在继续，我们每天夜以继日地维护着战鹰，随时准备迎敌。

过了一段时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又来进犯我国领空，我们英勇的空军战士火速起飞迎敌。当时的美国空军，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F-86喷气式战斗机，还有众多飞行时间长达数千小时、参加过二战王牌飞行员。而我们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是从陆军选拔过来、缺乏飞行经验、刚刚改装苏联制造米格-15飞机的新手。但是，英勇的志愿军空军勇士们不怕牺牲，用顽强的战斗意志、勇于拼刺刀的亮剑精神，经过激烈的战斗，将来犯的敌机击落在边境线上，捍卫了祖国的领空和民族的尊严。作为地勤人员的我和我的战友们，都目睹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大家欢呼雀跃，共同见证了这次战斗的胜利！随后，领导让大家一起去打扫战场。在敌机残骸

的座舱盖上，有一小块破碎的风挡玻璃。我跟战友商量了一下，就把这小块玻璃带了回来。回到部队之后，我请会钳工技术的战友，根据米格-15战斗机的样式，打造了一枚小小的飞机模型。这枚模型是我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利品，虽然后来我先后在南京、蚌埠、大连等地服役，并在1967年退伍来到了天津市，但是，我一直把它视若珍宝，一直珍藏至今。虽辗转多地，但仍光洁如新，从十八岁到如今的耄耋之年，它陪伴了我已经足足七十多年了。

时光荏苒，今天，祖国已经十分强大，强盗再也不敢侵犯我们的领空。但是，作为一名曾经参战的志愿军老兵，我始终坚定地认为，祖国的神圣领空不容侵犯，若有战，召必回！

老兵周昌达：难忘的赴朝参战经历

讲述人：周昌达，男，1935年12月出生，1952年入伍后赴朝参战，服役于铁道兵某部。1954年回国，1958年退伍。曾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我叫周昌达，1935年出生于江苏省句容市。小时候，句



讲述人周昌达近照

容在日寇的铁蹄下饱经摧残。那时候，年幼的我，心中早早便立志，长大后要参军报国，把一切侵略者赶出中国。

新中国成立伊始，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敌视新生的红色中国，于1950年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当时的我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参军报国责无旁贷。1952年10月，17岁的我背着父母和家人，怀揣着保家卫国，人人有责的信念，偷偷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初，唱着雄壮的《志愿军军歌》，我跟随部队入朝参战。当列车经过辽宁安东过江时，美国的战斗机不间断地在鸭绿江大桥上

空盘旋骚扰，阻止列车通过，上级为确保军列的绝对安全，在军列前后都挂上火车头，军列在桥上来回和敌机斗智斗勇，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形成了“拉锯式”的局面。从下午3点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整整12个小时，军列才终于安全通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部队下车后，几千人神速般的不到半个小时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当时，国家财力有限，部队装备和后勤供给还比较原始。我们部队的战士配备的单兵装备包括一支步枪、50发子弹、4枚手榴弹。另外，随身携带的行李给养还有一个背包、几十斤白面、一包饼干和一壶水。由于对地形不熟悉，又是山路，冰天雪地、气候寒冷，甚至到了三四月份，依旧是春寒料峭，对于我们南方兵来说，各方面都不适应。有的同志一下车就病倒了，有的同志滑倒把腿脚摔伤了。

四月，经过一天的急行军，我们驻扎在一个深山沟里的老乡家。那天下午，美军飞机突然对我军驻地进行轰炸，幸好发现及时，大家疏散较快，未遭受大的伤亡，不过，仍有3名同志身受重伤。当时的我，是刚入伍半年、刚刚到达前线参战的新兵，第一次面对美国飞机俯冲扫射轰炸的场面，听到美军飞机的轰鸣、炸弹在身边爆炸，看到朝夕相处的战友身受重伤，我内心有些恐惧，经过老兵的开导，我逐渐克服了恐惧，内心坚定了为战友和老乡报仇的决心！

5月的一天傍晚，我们在阵地挖战壕，这是一个涧溪两侧的地带，哨兵发现几架敌机在头顶盘旋侦察，鸣枪通知隐蔽，就在这一刹那，敌机已俯冲下来，向部队疯狂扫射和轰

炸，来势非常凶猛，只见我身边的一名战士在轰炸中应声倒地、当场牺牲。几分钟前，我们还在一起挖战壕，转眼间就血染沙场，为国捐躯了，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

部队前进中经常接到新任务。有一次，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全排出动，跑步到铁道线附近，排除一颗 500 磅的定时炸弹。排长说，这次任务十分危险，要听从指挥，安全引爆。大家都很紧张，排长让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给炸弹进行“手术”，其他战士用粗绳把定时炸弹拖拉到离铁道线很远的安全地带，成功地进行了引爆，弹坑足有 5 米深，10 米宽。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为兄弟部队的后勤供给和朝鲜人民的日常生活排除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作为这次行动的参与者，我感到十分自豪。

7 月份，我从“杨连弟”连被调到 8511 部队（铁道兵 11 师）教导队学习内燃机。当时住在一个深山沟的防空洞里，防空



周昌达老先生在铁道兵服役时的机械操作证书

洞里是脚背深的积水，睡铺是用直径 50 公分的松木杆一根一根排起来的，铺垫只有自己的一件黄大衣和一块防雨布，身上长满了虱子，

正如俗话说的“虱子多了不怕咬”，条件非常艰苦，正是这样艰苦环境的磨练和考验，坚定了我的革命意志和理想信念，使我从一个17岁的幼稚娃娃，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53年7月停战后，我们部队仍然驻扎在朝鲜，直到1954年春节回国。回国后，我随部队前往宝鸡，参加营房建设任务。在完成的过程中，表现出顽强的自我牺牲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受到了师级嘉奖并荣立三等功并光荣入党。1958年退伍后，我在铁路部门参加工作，直至退休。如今，年逾九旬的我，想起曾经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战友的脸庞，仍然感慨万千，他们也曾经正值青春年少，但是他们为了保家卫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活着的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份由他们的生命换来的岁月静好。请允许我为壮烈牺牲的志愿军烈士献上楹联一幅：

上联：缅怀先烈功绩永垂

下联：为国捐躯世人永念

横批：永垂不朽

董湘崑：我只领七角五分钱

我的师父董湘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东大鼓的代表性传承人。我师父1927年出生在宝坻，1954年正式拜京东大鼓大师刘文斌为师学习京东大鼓演唱技艺，2013年因病去世，从艺近60年，为京东大鼓事业奉献了一生。

师父一生深耕京东大鼓事业，并把京东大鼓这项曲艺艺术发扬光大。师父一共



收了65位弟子。作为师承的第一课，师父给我们所有弟子，总结了16个字的师训：人比钱贵，德比艺高，德艺双馨，吾辈目标。

这短短16个字，既是我师父董湘崑从艺60年的生动写照，也是师父给我们65位弟子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和师父共事了半个世纪，师父身上发生的很多小事都潜移默化地把这16个字表现了出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家董湘崑（1927—2013）先生演出旧照

我对师父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简谱、低调、谦逊的为人。师父的一曲《送女儿上大学》，火遍了大江南北，师父也成了天津市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但是师父出门一点也没有名人的架子，为我们做徒弟的做出了表率。

上世纪70年代，我们在河东礼堂表演。当时的河东礼堂，是一个1000多座的大礼堂，我师父每次去表演，全场都座无虚席、热闹非凡。

有一天，又到了演出的日子，天空中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去礼堂的路上，积水都到腰部了。我们晚上七点一刻演出，六点半报到。当天晚上参加演出的演员，有我师父董湘崑和我、李伯祥、张志宽等老艺术家。在前往礼堂的路上，我遇到了我师父。师父嘴里叨着一双圆口布鞋，我背着一个塑料书包，我们俩都扛着扛自行车、卷起裤管光着脚走在积水里。他费力地想跟我打招呼，但是嘴里叨着鞋子，实在是无法开口。就这样，

我们狼狈地走到了礼堂的后台。我们找礼堂工作人员报到，工作人员拿来了签到表，在我们几个人名上划勾，



本文讲述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东大鼓代表性传承人董湘崑弟子倪万珠先生近照

来一个划一个。晚上六点半，市群艺馆的馆长问我“万珠，你师父来了吗？”我告诉他，我师父来了，已经报到了，正在做登台前的准备工作。那天晚上我跟我师父唱了三段，台下观众掌声雷动，非常热情，大家高喊，“董爷，您再来一段吧”，一直到演出散场的时候，大家都意犹未尽。就这样，师父带着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当天晚上的演出。

按照规定，70年代的时候我们演出，白天发四角钱补助，晚上发七角五分钱补助。馆里的领导对我们说，“外边下着大雨，你们赶过来完成演出挺不容易的，今天的补助，给大家每人做一块五吧。”就这样，后台工作人员按照领导指示，让参演的每位演员都签领一块五的补助。签领单传到我师父手上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签，咱们规定一晚上补助是七角五分，我就签七角五分的，额外的七角五分我坚决不能要”。师父的人格魅力，深深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这就是我的师父董湘崑。作为他的徒弟，他要求我们德艺双馨，人不行，艺术就不行。我和我师父虽然都是京东大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是我们其实都是业余演员。我师父一辈子从事印刷行业，干过学徒工，干过保全，也干过销售，最后在东方红印刷厂退休。即使在成名后，师父依然为人谦逊，保持着工人艺术家艰苦朴素的作风。师父已经离开我们10个年头了，但是每每回忆起师父的艺术人生的点点滴滴，他那毫无架子的做派，严守规矩的作风，始终影响着我，终生不会忘记。我们作为京东大鼓艺术的传承人，还要把董老“人比钱贵，德比艺高”的精神代代相传下去。

朝鲜战场的回忆

口述者：王建勋 整理者：冯智华

王建勋，出生于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党员，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3月在朝鲜攻打马踏里西山寺，因战斗勇敢完成通信联络任务，保证了上级指挥立下了军功章，1954年3月，因军事训练成绩优良立三等功。

我叫王建勋，今年91岁，1956年退伍。我是19岁（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抗美援朝区政府动员参军，我们自愿去的，我被分配到358团通信连当无线电兵，在那学习无线电快两年时间。1953年3月份参加战斗，写了决心书。那天晚上，在双夹山，我们几十门大炮，三道铁丝网都给打没了，团成蛋了。当时我们组长姓曹，曹组长背着机器，我背着两块干电池，走到山半腰了，我看到三连连长被炮弹打的往那滚，我看着哎呀，这一不小心没看见铁丝网都打成蛋了，我一脚踩进去出也出不来，走也走不了，把我急的，要不我就掉队了怎么办，我一用劲拔出来，急的弄掉块肉也不觉得疼。跟上部队，到了山上我把机器架起来，在战斗当中我负责联络后面炮团，很顺利。人家也有炮，咱也有炮，互相打着。我负伤也一直在战场上坚持。大概不到凌晨四点，天都快亮了，炮都停了，咱这担架也上来了，把我抬下去以前我和我们组长说：“头一次参加战斗我就负伤，光剩你一个人我觉得

你负担够重的，俩个人的活一个人干。”他说你回去好好养着，这样我下了战场。但是那个炮有毒，我腿都肿了，做了手术，全部麻醉，割了块儿肉下去。然后我就坐汽车回国了，头发都推光，洗完澡换上新军装，国家安顿好我们，我就正式从朝鲜战场上退下来了。

我们回来以后，国家多平稳多好啊。毛主席多英明，我们都听毛主席的话。就像我们这打仗一样，一提毛主席就都参军了。我们国家五年经济计划完成这么好，社会发展的这么好，那不是党领导的好嘛，属咱中国最好了。和平来之不易，希望咱国家越来越好。

抗战记忆

口述者：张艺馨 整理者：冯智华

张艺馨，男、汉族、87岁，19岁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叫张艺馨，今年87岁，家住河南省濮阳县，19岁应征入伍。我参军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责任和义务保护祖国和人民，我从小就有当兵的梦。另一方面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我三哥是一九三几年参加的八路军，他在师范毕业以后就当教师，他以这个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他参加八路军和入党是经过一位姓孙的同志介绍的，他说他是江苏搞地下工作的。我记得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日本鬼子把我们村包围了，把村民都集中在关爷庙前一棵梧桐树下，周围架着机枪，把村保长王双燕绑在板凳子上灌辣椒水，让他说出八路军的名单和枪支都放在哪，他始终都没说。后来日本鬼子把我三哥叫出来，看看他的手，又让他把帽子摘下来，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教书先生。后来又问保长他是干什么的，保长也说是教书先生，这才把我三哥放了，当时三哥吓得头发茬子都立起来了。我那时才六岁，也不知道害怕。

一九四几年那会儿我家成了八路军的仓库，正房三间作军需库，把交护上来的武器弹药和制造地雷手榴弹的材料存放在那。西厢房两间是八路军的粮库，打麦场是炼钢炉，主

要是铸地雷和手榴弹的外壳，还有修枪所、制作竹梯子的作坊，我记得八路军的大首长都是住在我家。

我四哥是支前模范，解放山东的时候我们家有一辆车，有两个牲口，我四哥就用大车给八路军送弹药、粮食、服装和生活用品等军需物资支援前线。

我侄子张培显在区里边是搞民兵工作的，我在他的推荐下应征入伍。我刚入伍是在 五三四部队一营一连重机枪班，班长是王全银，同年又调到 五六一部队第七预备师军事教导团一营一连一排三班，任轻机枪手，排长罗有才，班长罗方俊。毕业后学习成绩好的就留校带新兵。我在校期间由于勤学苦练，各门功课优异，被评为二级优等射手和队嘉奖，还往家寄了喜报。

由于朝鲜战场需补充兵源，1957 年春天又开赴到朝鲜，坐的都是闷罐车，走了 20 多天，在 3 月 28 号凌晨 4 点通过鸭绿江。鸭绿江的桥都被炸断了，还有那铁道都炸弯了。树木烧成灰，每个山头都有烈士的墓碑，炮弹坑到处可见。到朝鲜以后，我被分配到九六四九部队二十一团一营二连二排五班任轻机枪手，副手葛全胜。刚到朝鲜的时候没有营房，都跟朝鲜老百姓住一块儿，后来自个动手上山扛石头伐木头建营房。

每天的训练任务很重，尤其是在军事教导团的时候，勤学苦练，练杀敌的本领。训练很艰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越是恶劣天气越训练。夏天还戴着防毒面具，原子弹爆炸以后都在训练这个。原子弹有四种杀伤力：光辐射、冲击破、

穿透辐射还有放射性的沾染，所以就得穿防护衣服。因为是在夏天训练，戴防护面具，浑身都湿透了。三伏天趴地上练瞄准，浑身都是痱子，大部分战士都闹肚子，有得绣球风的，有得黄水疮的。还有冬天训练也是，越是冷越得出去训练，零下二三十度的下雪天趴在雪地里练匍匐前进，袖口都灌进雪了，拉枪栓的时候枪栓都拉断了，手冻的都肿得跟胡萝卜似的，流黄水，鞋垫下边都是冰。

后来我当了军需给养员，司务长、给养员的工作我一个人就干了。

1958年春天，我们从朝鲜战场全部撤回来。

祖国的成立、建设和发展来之不易，是无数个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坚决跟党走，衷心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乔玉锋事迹

我是一位年过八旬的社区志愿者。现任敬重里社区老年大学副校长、手机班教师，社区爱心拍客队队长。从2001年10月退休至今，二十几年来，我积极参加社区各项公益活动，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特长，义务为老年人授课，全身心地奉献社区建设，被大家誉为“老年朋友的良师益友”。

2001年10月，我从紧张繁忙的领导工作岗位退休后，因终身相依的老伴去世而深陷悲痛之中，女儿远在美国，儿子、儿媳都是一级聋哑残疾人，孙子年幼，家中生活无人照料。我孤独一人生活，感到非常寂寞，曾一度产生失落感和孤独感。但这些都不能改变我几十年来乐观向上的态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重新建立学习工作目标，开始了新的晚年生活。

63岁开始勤奋自学汉语拼音，我把主要精力时间投入到学习电脑和摄影知识上。我经常穿梭在书店、图书馆之间，先后通读了《Photoshop图像处理基础》、《摄影三百问》等十余本大部头教材。自学操作中产生的疑问虚心向身边人请教，反复练习，直至弄懂弄通学会为止。从学电脑到用电脑，从查阅资料到网上漫游，再到利用电脑编辑影视作品，制作贺卡，成为电脑方面的行家里手。

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特长，发挥党员余热，义务为老年朋友讲授课程。我先后举办了四期摄影培训班和六期电脑

培训班，动手编写了《数码摄影知识、技巧和后期处理与制作》讲义和《电脑知识和基本操作》讲义，累计撰写十二万字，打印装订成册后免费发给学员学习。2009年8月第一期电脑班开课在即，在社区电脑硬件短缺的情况下，我搬来了自家的电脑，利用投影大屏幕授课，解决了当时开课的燃眉之急。由于授课教室场地所限，只好分两批讲课，每课讲两遍。每次讲完后都有大批学员围着我提问，无论问题多么复杂，也无论这个内容讲了多少遍，我总是耐心细致地为最后一位学员解答完才会离开。

我还运用所学知识，大胆改革创新，把信息化带到了居委会评议工作中，改变了口头干巴巴念稿子的传统方式。转而利用图片、字幕、配音等方式编辑制作居委会工作报告和个人述职报告，既新颖直观，又生动形象。这种做法，当时在大营门街还是第一个。2012年10月，我组建了由20余名摄影爱好者组成的爱心拍客队，我们用自己手中的镜头，实时地记录着社区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创建文明城区中，我们记录了社区志愿者帮扶老人、社区党员清理环境卫生、中小學生慰问残疾人；在旧楼区改造中，我们记录了煤气管道入户、违章建筑拆除、柏油马路修建、树木花草种植。截至目前，我带领的爱心拍客队已累计拍摄近万张照片，并将照片分类制作后广泛宣传，社区的好人好事、各种惠民活动，一传十、十传百，名副其实地使我成为一名活跃在社区、传递正能量的使者。

作为一名社区志愿者，在社区居委会，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践行着志愿者的人生价值，实现着一名老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朋友们，在社区建设的路上，我与大家，一同守护这份坚守，这份执着，这份热心公益的梦想。

衡玉山事迹

讲述人：衡玉山，今年79岁，1944年生于河北承德，1964年1月入伍，历任战士、报话员、副班长职务，荣立三等功一次，1987年10月复员，在天津市河西区监狱纪检委单位工作，2004年3月从天津市河西区监狱单位退休，现居住在河西区大营门街道东莱里社区。

我出生那会儿，正赶上国民党土匪还乡团活动猖獗时期，老百姓生活非常艰难，穷人家里仅有一两件旧衣服，只给外出干活的人穿。孩子们只有光着腚或围在破被子里，谁也不嫌丢人。

我父亲是乡里闻名的细活木匠，曾带出好几位徒弟，这样还能维持最基本生活。即使这样，谁要有病，只有拔火罐、揪脖子一些土办法治病，没钱买药吃。我曾经有一个小妹妹，出生半年后得病，因吃不起药，夜间为了减少他哭闹，我母亲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熬到深夜，最后一天还是在母亲怀里离开了人世。可以说，能活到后来都是捡来的命。

从我记事起，赶上的就是兵荒马乱，那时一部分国民党残余势力经常进村抓壮丁，抢粮抢牲畜。记得在我两岁时的一天上午，街上突然有人大喊：“还乡团来了，快把粮食藏好”。当时家里有我父亲刚买回一袋小米。我母亲急忙让我坐在炕上，从口袋里盛满一升小米，放在我身后，用被子把我围住，嘱咐我有人要问就说我病了。剩下那袋锁在柜子里，不一会儿，

只见三个当兵的端着枪闯进屋里，开口就喊要粮食，逼着我母亲把柜子打开，见有小米不容分说，抢到就走。当时就听街上骂人声、救命声、公鸡被抓的嚎叫声乱了一上午。

在我四岁那年的一天傍晚，我们一家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草房顶上被掀翻。吓得我和哥哥们赶紧扔掉饭碗躲在炕沿底下不敢动，稍后抬头只见一架国民党敌机擦着前一家房顶飞过之后，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然后敌机升高远去。我们壮着胆跑出去，在村边发现一个被炸的深坑，有一个人被炸掉一条腿。

1948年，我们村开始不断有解放军大部队路过，老百姓终于盼到这一天。站满街道两旁欢迎自己的部队。我们家曾经三次住过部队，每次看到他们不顾长途劳累，还要为我们扫院子，找活儿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还乡团被歼灭，那个罪恶多端的头子李宽被公审后枪毙，大快人心。

我能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主要是感谢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

下面我讲几个我在部队对我成长和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有重大作用的比较难忘的战友领导的故事。

好友李排长

解放后，我们村西开始驻守一支部队，担负着警卫铁路、桥梁、隧道和一支劳改队的任务。有一天夜里下起大暴雨，我家临街一堵墙和一个茅厕突然被冲垮。过两天后，十几个

战士来到我家，说要给我们修复土墙和茅厕。然后就动手活泥、砌石头，一个个弄得一身泥土，冒着臭气干了多半天，终于恢复了原样，这样便使我们全家深受感动。从此，我也认识了他们一个李排长，并交上了朋友。一次，我问他：“我也想当兵，是不是很累呀？”他笑着对我说：“欢迎你到部队来。当兵可不是只有军事训练，还有政治理论学习，提高你的思想修养，你会受到多方面很好的锻炼，几年后你就体会在部队成长和老百姓是大不一样的。希望等到你的好消息。”

老班长李宝昌

怀着对人民军队的无尚感恩和崇敬，1964年1月，我终于通过体检，应征入伍。列车将我们送到内蒙古包头市。分配到4962部队警通连报话班。担任我们班长的是已经服役六年的老兵，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就像我大哥。他和蔼可亲，文质彬彬，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他训练有素，善于察言观色。初到部队，我还不懂得部队的规矩和人情世故，只知道埋头参加训练和学习。过一段时间后，他单独找我交心谈话，他对我说：“玉山啊，我观察了你一段时间了，你是个积极肯干的好同志，也善于学习，但这还不够，你应当在群众中树立威信，才能有进步啊。”我奇怪的问：“什么叫威信呀？”他说：“首先要团结好群众，和群众多交流，多帮助学习较差的同志，不要只顾低头拉车。以后我会多帮助你的。”当时我似乎还是似懂非懂，但我照着这样去做后，发现战友们开始对我逐渐

更亲近了。

那时期，部队开展争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李班长在做动员时向全班战士表态，谁要能评上五好战士，我就奖励给他一个最好的笔记本。第一年，我的体育项目不过关，但我不灰心，抓紧业余时间加强身体锤炼。第二年，我和另一名战士通过不断的努力终于被评上了五好战士。李班长说话算数，奖励给我最珍贵的精装笔记本，我十分珍惜，一直保留至今。

在他的引导下，我渐渐的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后来我被提拔为副班长。开始像他那样照葫芦画瓢去管理应尽的职责。三年后，他复员了，我成为班长，我永远忘不了他。

连长宋福礼

我们连长宋福礼虽然没啥文化，但从小就机灵，16岁就到部队当通讯员。在连队大会上，经常念错字，引得全体战士哄堂大笑，但是他对连队管理条理清晰，知人善任。我爱写写画画，引起了连长的重视，经常让我写黑板报。在一次军区征书画作品时。连长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求做一个毛主席头部泥塑像。在我心中，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因为崇敬还真不敢创作。万一不像，那不得受批判呀，连长鼓励我，要我大胆细心，做不好他负责。听着这话，我便试着创作。大约一周后，把样品交到连部审查，得到一致好评。不仅参展，还得了奖。随后他又交给我一个任务，指着营房前一面宽三

米、高四米的影壁墙说，你在这面墙上画一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油彩画像。将来连队天天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汇报。那个年代，正时兴在街上画大幅领袖彩相，我便经常在街上看美工师们如何设计布局、调颜色，经过十几天的努力，终于完成任务。那年是1968年6月28日，讨论我入党的问题。连长说，如果衡玉山同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能画的这么好吗？尽管在支委会上对我指出几点不足，但是还是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我在部队上收到班长连长的影响比较大，我一直都是按照在部队所学，坚持做人做事的规则，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在复员回到地方工作也没有褪色，较好的完成了自己本职工作，一直都是单位的让领导放心的同志。我多年来一直都感谢人民军队的培养。也一直忘不了曾经在我人生道路上影响我的军旅领路人李排长、李班长和宋连长！

1964年光荣的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部队上担任过报话员、副班长，1970年那会儿已服役六年多了，在思想上已做好了复员的准备。3月6日，宋连长突然找我谈话，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有一个培训无线电理论的名额。如果你同意，一年学成后可以任命你为无线电修理技师。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因为这正是我喜爱的职业。想一想后，我向宋连长表态，说非常感谢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六年来，我把探亲的机会都让给了其他战友，至今没回家找个对象。宋连长说，我只批准你回家待三天，千万不能耽误学习报道的时间。

我满心高兴的第二天就赶回承德老家上板城村。上午就

先后有两个媒人闻讯提亲，我没有立即表态，下午，曾是我
最知心的朋友衡德、张连义、姜臣同时来到我家，他们都是
我的长者，在家务农时，他们教我怎样干农活儿、陪我娱乐，
是在我农村的良师益友。寒暄后，衡德问我是在天津找到对
象，我说不愿在外地找，就在家里找，这样生活习惯能相通。
他说，那好，我们就等着你回来呢。我们三位都商量过，有
一位姑娘比你小六岁，没有文化，但说话办事儿都让人很佩
服，是工作队队员，现在正住在咱们村，你若同意，今晚就
在我家见面。晚上在衡德家见到了那个姑娘，她就是我现在
的老伴曲银芬，因为之前不认识，只简单介绍了各自的情况，
初步同意后，第二天又安排和她的母亲、大哥见过面，第三
天双方父母在我家互相介绍，我母亲和他母亲曾互赠一条手
绢，就算定亲了。当晚我就赶回到部队，真是个闪电似的相亲。
当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相亲的。

婚后，我们商量着孝敬双方父母，在生活上，她节俭过
日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他每年来部队探亲，和战士们交
谈中，她明辨是非，以理服人。当时有一文书王鼎笑着说，
你就是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啊？从此，这一雅号就在连队里传
开了，可是没几年，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难解的问题。

社会上都相信“猴虎不到头儿”，她后悔当初没找人算一
算，把我们平时磕磕绊绊都看成是犯相。我并不相信这个公识，
认为我们只存在着两个差异，一是文化不同，二是兴趣不同。

现在，我们有一个约定的共识，就是在培养教育孙辈问
题上全力以赴。外孙和孙女都一出生就归我们抚养上学，只

要他们在家大人就不看电视，生活上也是精心照料。多年的付出也有了回报。如今，外孙已在北京理工大学保研，孙女去年考入哈尔滨理工大学，我们老两口也圆满完成了自己培养教育孩子的使命。

我们还有一个默契，她支持我的文化活动，我支持她的热心肠公益事业，现如今，我们都是东莱里社区志愿者，她当了30多年楼栋长，热心为邻居帮忙。经常有两三户人家把房门钥匙寄存在我家。曾经调解已离异夫妻重新和好，积极参加军属志愿服务队，在社区附近巡逻。我从2005年加入街老年人协会，2006年被聘为社区义务制主任，用我的书法知识先后在东莱里社区、九江路社区退役军人之家举办了书画班，经老年人大学考察后评为校外教学基地，本人也被聘任为东莱里社区书画苑教师。我积极向市区、市老年大学报投稿书画作品，也多次获奖，去年第三次被评为区级文明家庭，这不是很好吗？哪有什么虎猴不到头？

我和老伴的幸福晚年生活要感谢当年多位好友的撮合。遥祝几位已经作古的恩人们，荫佑他们的子孙幸福兴旺，在世的恩人们尽享晚年幸福生活。感谢伟大的党！好些伟大的祖国！祝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早日实现！

引路人，恩人，我尊敬的人

衡玉山

今年，我即将进入 80 岁了。人到老年，常回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些有趣的往事。更忘不了幼小时候的艰苦生活，父母的养育之恩，在我关键时刻真心帮助我的人。虽然他们大多数都已经作古了，但在我心中，他们却还在教导我，指引着我在正确的道路上错力前行，享受幸福的人生。

童年生活

1944 年 11 月，我出生在河北省承德市上板城村，正赶上国民党土匪还乡团活动猖獗时期，老百姓生活非常艰难，穷人家仅有一两件旧衣服，只给外出干活的人穿。孩子们只有光着腚或围在破被子里，谁也不嫌丢人。

我父亲是乡里闻名的细活木匠，曾带出好几位徒弟，这样还能维持最基本生活。即使这样，谁要有病，只有拔火罐、揪脖子一些土办法治病，没钱买药吃。我曾经有一个小妹妹，出生半年后得病，因吃不起药，夜间为了减少他哭闹，我母亲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熬到深夜，最后一天还是在母亲怀里离开了人世。可以说，能活到后来都是捡来的命。

从我记事起，赶上的就是兵荒马乱，那时一部分国民党

残余势力经常进村抓壮丁，抢粮抢牲畜。记得在我两岁时的一天上午，街上突然有人大喊：“还乡团来了，快把粮食藏好”。当时家里有我父亲刚买回一袋小米。我母亲急忙让我坐在炕上，从口袋里盛满一升小米，放在我身后，用被子把我围住，嘱咐我有人要问就说我病了。剩下那袋锁在柜子里，不一会儿，只见三个当兵的端着枪闯进屋里，开口就喊要粮食，逼着我母亲把柜子打开，见有小米不容分说，抢到就走。当时就听街上骂人声、救命声、公鸡被抓的嚎叫声乱了一上午。

在我四岁那年的一天傍晚，我们一家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草房顶上被掀翻。吓得我和哥哥们赶紧扔掉饭碗躲在炕沿底下不敢动，稍后抬头只见一架国民党敌机擦着前一家房顶飞过之后，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然后敌机升高远去。我们壮着胆跑出去，在村边发现一个被炸的深坑，有一个人被炸掉一条腿。

1948年，我们村开始不断有解放军大部队路过，老百姓终于盼到这一天。站满街道两旁欢迎自己的部队。我们家曾经三次住过部队，每次看到他们不顾长途劳累，还要为我们扫院子，找活儿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还乡团被歼灭，那个罪恶多端的头子李宽被公审后枪毙，大快人心。

好友李排长

解放后，我们村西开始驻守一支部队，担负着警卫铁路、桥梁、隧道和一支劳改队的任务。有一天夜里下起大暴雨，

我家临街一堵墙和一个茅厕突然被冲垮。过两天后，十几个战士来到我家，说要给我们修复土墙和茅厕。然后就动手活泥、砌石头，一个个弄得一身泥土，冒着臭气干了多半天，终于恢复了原样，这样便使我们全家深受感动。从此，我也认识了他们一个李排长，并交上了朋友。一次，我问他：“我也想当兵，是不是很累呀？”他笑着对我说：“欢迎你到部队来。当兵可不是只有军事训练，还有政治理论学习，提高你的思想修养，你会受到多方面很好的锻炼，几年后你就体会在部队成长和老百姓是大不一样的。希望等到你的好消息。”

老班长李宝昌

1964年1月，我终于通过体检，应征入伍。列车将我们送到内蒙古包头市。分配到4962部队警通连报话班。担任我们班长的是已经服役六年的老兵，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就像我大哥。他和蔼可亲，文质彬彬，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他训练有素，善于察言观色。初到部队，我还不懂得部队的规矩和人情世故，只知道埋头参加训练和学习。过一段时间后，他单独找我交心谈话，他对我说：“玉山啊，我观察了你一段时间了，你是个积极肯干的好同志，也善于学习，但这还不够，你应当在群众中树立威信，才能有进步啊。”我奇怪的问：“什么叫威信呀？”他说：“首先要团结好群众，和群众多交流，多帮助学习较差的同志，不要只顾低头拉车。以后我会多帮助你的。”当时我似乎还是似懂非懂，但我照着这样去做后，

发现战友们开始对我逐渐更亲近了。

那时期，部队开展争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李班长在做动员时向全班战士表态，谁要能评上五好战士，我就奖励给他一个最好的笔记本。第一年，我的体育项目不过关，但我不灰心，抓紧业余时间加强身体锤炼。第二年，我和另一名战士通过不断的努力终于被评上了五好战士。李班长说话算数，奖励给我最珍贵的精装笔记本，我十分珍惜，一直保留至今。

在他的引导下，我渐渐的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后来我被提拔为副班长。开始像他那样照葫芦画瓢去管理应尽的职责。三年后，他复员了，我成为班长，我永远忘不了他。

连长宋福礼

我们连长宋福礼没有文化，但从小就机灵，16岁就到部队当通讯员。在连队大会上，经常念错字，引得全体战士哄堂大笑，但是他对连队管理条理清晰，知人善任。我爱写写画画，引起了连长的重视，经常让我写黑板报。在一次军区征书画作品时。连长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求做一个毛主席头部泥塑像。在我心中，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因为崇敬还真不敢创作。万一不像，那不得受批判呀，连长鼓励我，要我大胆细心，做不好他负责。听着这话，我便试着创作。大约一周后，把样品交到连部审查，得到一致好评。不仅参展，还得了奖。随后他又交给我一个任务，指着营房前一面宽三

米、高四米的影壁墙说，你在这面墙上画一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油彩画像。将来连队天天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汇报。那个年代，正时兴在街上画大幅领袖彩相，我便经常在上街上看美工师们如何设计布局、调颜色，经过十几天的努力，终于完成任务。那年是1968年6月28日，讨论我入党的问题。连长说，如果衡玉山同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能画的这么好吗？尽管在支委会上对我指出几点不足，但是还是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三位媒人

1970年，我已服役六年多了，在思想上已做好了复员的准备。3月6日，宋连长突然找我谈话，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有一个培训无线电理论的名额。如果你同意，一年学成后可以任命你为无线电修理技师。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因为这正是我喜爱的职业。想一想后，我向宋连长表态，说非常感谢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六年来，我把探亲的机会都让给了其他战友，至今没回家找个对象。宋连长说，我只批准你回家待三天，千万不能耽误学习报道的时间。

我满心高兴的第二天就赶回上板城村。上午就先后有两个媒人闻讯提亲，我没有立即表态，下午，曾是我知心朋友衡德、张连义、姜臣同时来到我家，他们都是我的长者，在家务农时，他们教我怎样干农活儿、陪我娱乐，是在我农村的良师益友。寒暄后，衡德问我是在天津找到对象，我说

不愿在外地找，就在家里找，这样生活习惯能相通。他说，那好，我们就等着你回来呢。我们三位都商量过，有一位姑娘比你小六岁，没有文化，但说话办事儿都让人很佩服，是工作队队员，现在正住在咱们村，你若同意，今晚就在我家见面。晚上在衡德家见到了那个姑娘，她就是曲银芬，因为不认识，只简单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初步同意后，第二天又安排和他母亲、大哥见过面，第三天双方父母在我家互相介绍，我母亲和他母亲曾互赠一条手绢，就算定亲了。当晚我就赶回到部队，真是个闪电似的相亲。

婚后，我们商量着孝敬双方父母，在生活上，她节俭过日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他每年来部队探亲，和战士们交谈中，她明辨是非，以理服人。当时有一文书王鼎笑着说，你就是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啊？从此，这一雅号就在连队里传开了，可是没几年，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难解的问题。

社会上都相信“猴虎不到头儿”，他后悔当初没找人算一算，把我们平时磕磕绊绊都看成是犯相。我并不相信这个公识，认为我们只存在着两个差异，一是文化不同，二是兴趣不同。我们有一个约定共识，在培养教育孙辈问题上全力以赴。外孙和孙女都先后出生就归我们抚养上学，只要他们在家就不看电视，生活精心照料。如今，外孙已在北京理工大学保研，孙女去年考入哈尔滨理工大学，圆满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我们有一个默契，他支持我的文化活动，我支持他的热心肠，我们都是东莱里社区志愿者，他当了30多年楼栋长，热心为邻居帮忙。经常有两三户人家把房门钥匙寄存在我家。

调解已离异夫妻重新和好，积极参加军属志愿服务队，在社区附近巡逻。我从2005年加入街老年人协会，2006年被聘为社区义务制主任，用我的书法知识先后在东莱里社区、九江路社区退役军人之家举办了书画班，经老年人大学考察后任命为校外教学基地，任命为东莱里社区书画苑。我积极向市区、市老年大学报书画作品多次获奖，去年第三次被评为区级文明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何错之有？

遥祝几位已经作古的恩人们，因佑他们的子孙幸福兴旺，在世的恩人们尽享晚年幸福生活。

社区文化志愿者贾铁藩个人事迹

我们荣华里社区有这样一位居民，他热衷于社区文化事业的发展与传播，是我们荣华里社区非常优秀的社区文化志愿者，他的名字叫贾铁藩。

贾铁藩，字健侯，1931年出生于天津，大学学历，原建材局设计院工程师。幼承庭训，喜书画，曾受教于曹柏昆等多位老师，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和天津市的书法大赛并有作品获奖。对魏碑情有独钟，书风清秀舒朗。被周邓纪念馆收藏，多次主动义卖并将善款捐给灾区同胞。

现为天津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天津市政协书画艺术研究会会员，天津市老年书画院理事，天津市老年人大学书画研究会秘书长。

作为荣华里社区优秀的文化志愿者，贾老定期前往大营门街三义书画社教居民和书法爱好者书学习隶书，作为书画社元老级人物，今年可是贾老参加书画社第十五个年头。平日与书画社60多名书画爱好者一起谈诗写字画画，丰富了退休生活，同时加强了群众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贾老平时特别热衷社区活动，只要社区有需要，贾老从不拒绝，笔墨挥洒游刃有余。作为一名85岁的高龄老人依然每天保持读书看报练字的好习惯。为了练习书法，早上早早起床坚持练字一个小时，读过的报纸一张张放好，作为日后书写的素材。写出的字不仅笔锋力道不减

当年，更具形神兼备。

不仅如此，贾老每周六还在我街市民学校教老年人学习书法。从坐姿、握笔的方法、写字的力道等等，一板一眼教的非常认真。“字是由笔画组成的，先练笔画，练好了笔画，再开始练字”，这是贾老的教学方法。

贾老由于年纪较大，听力下降，佩戴助听器才能勉强听清。即便如此，依然积极响应社会活动，但凡社区有活动贾老总会有新的作品送来。每当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宣传时，贾老自告奉勇的组织、带领老年志愿者们宣传知识，并不断鼓励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我们的行动中来，让更多人认识热爱书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每当社区有什么政策咨询、活动要向居民宣传时，他都会成为义务宣传员。平时的老年活动，他都会积极参与，并且还会发动辖区很多居民前来参加。在近几年国家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贾老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工作，他和书画爱好者一同深入居民中向大家宣传精神文明的重要性，积极参与荣华里社区历次文化节活动并以身作则，告诉大家重视传统文化，而且对待下一代的教育孜孜不倦。

贾铁藩，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一位爱好书画、甘于奉献的社区居民。他是伟大而高尚的，奉献社区、回报社会的真情，给荣华里社区这个美丽的家园增色添彩，我们为有这样的居民感到自豪！

儿时的战争印象

讲述人：河西区东海街 刘汉生

我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出生的，儿时的记忆大多淡忘了，但有一件惊心动魄的往事，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小时候，我家住在天津市北边，在武清与宝坻交界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六、七十户人家。在我六岁那一年的冬天，大人们都说：“又要打仗了，这回天津要解放了，小孩子们可不要乱跑。”那时夜里时不时地传来枪声，很是吓人。

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爸妈把我们赶紧叫醒，对我们说：“外边有汽车响，人乱喊乱叫，坏人来啦！可不要出声音啊！”话音刚落，有人踹开了我家的大门。我们家靠村头，遇到什么事，总是第一个被折腾。

我围着被子爬起来，偷偷地从窗户缝往外瞧，可不得了，几个穿着黄色军装，歪戴军帽，嘴里骂骂咧咧的大兵，闯进了院子，随后就一针猛敲我们睡觉屋子的门，我爸爸来不及穿好衣服，慌慌张张从炕上下来，只穿着短裤就去赶紧开门。这时，一个满脸胡碴瞪着大眼睛，让人十分害怕的“大兵”，一边骂着一边挥着手中的皮带，劈头盖脸朝着父亲打来，父亲一个趔趄差点倒在地上。紧接着他又大声吼着：“把钱拿出来，不拿就毙了你。”父亲哆哆嗦嗦抖着双手，好不容易才从桌

子的抽屉里拿出钱递给他，这是昨天刚刚卖了二斗粮食，准备过年的钱。这时母亲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两个姐姐用被子蒙着头，谁也不敢出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凶神恶煞，让人恨透了的强盗。

这个坏蛋拿了钱还在乱翻，嘴上要着东西，不一会外边有人喊：“快出来，这里还有好东西。”听了这喊声，屋里的“大兵”没再纠缠，马上扭头出去了。我们谁都没敢动，等了一会儿外面渐渐平静下来，父亲才轻手轻脚走出屋子，到外边一看，放在外屋桌上的一篮子鸡蛋没了，院里那唯一一头帮助我们种地的牛，也被他们拉走了。后来，我们听村里人讲：“这是一股从天津城内逃出来的国民党败兵，解放军解放天津后，这一小撮溃逃的国民党兵如丧家之犬，大现了原形”。

这股残兵走后，我也跑出来站在街上，村里好多大人小孩都在骂这伙逃兵，一位姓黄的大爷说：“别看他们这么凶，比起小日本，那还算好的呢？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啦！”我问这位大爷：“大兵这么可恨，您怎么还说他们好？”黄大爷说：“孩子，你还小，没经过的事多着呢！这些被打败的兵，还只是抢东西，打人骂人，而日本鬼子比他们还要坏十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咱们村小，又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可日本鬼子都不放过，前几年有一回烧了咱村三十多间房子，抓走了十多个人，据说送到日本当劳工去了，到现在也没消息。”

随着年龄的长大，我知道了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滚回老家去了。“日本鬼子比国民党败兵还坏十倍。”这句话让我记住了日本鬼子的可恶。

我原来的名字叫道生，四九年解放后，我有了上学的机会，因我这辈是我们老刘家“汉字辈儿”，父亲给我改名为刘汉生。后来，从比我大十几岁的大姐口中，我知道了最初为何给我起名道生。

对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原来叫道生吗？”我说：“我怎么知道？”她说：“我告诉你吧！咱妈生你是在地道里生的。”我惊讶起来，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村形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听说鬼子来，村里人就跑，躲起来，庄稼长高了，往地里跑，庄稼没长起来，就提前往外村跑，实在跑不出去，就钻地道，那时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时刻准备跑反。那时的地道弯弯曲曲，不仅家家连着，还能通往村外。

我们村夏天雨大，地道里积水，藏人不方便，冬天地冻得结实，没水能藏人。我出生的那天傍晚，我家里刚点火要做饭，听说日本人又来了，身强力壮的人都跑“反了”，我妈妈身体不方便，我们全家和邻居的一个大娘、一个婶子就都钻了地道，虽然带着棉被，可冬天里，还是冻得人哆哆嗦嗦，因为不知道要躲多长时间，大家都带着些干粮和水，在地道里呆着。没一会，我妈妈身体不好受，肚子疼，在经验丰富的大娘和二婶帮助下，我出生了。大家都担心我的哭声引来鬼子，幸运的是，我渐渐不哭了，十多个小鬼子也在村里没呆太久，只抢走了两头猪和几袋粮食就走了，等大家从地道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大黑。后来大家商量，我是在地道里生的，就给我起了个道生的名字。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把中国人民害苦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昏聩无道的疯狂掠夺让中国人民接着受苦。回想起往事，我对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咬牙切齿，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们的罪恶。

如今我们胜利了，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中国人民是一个富有远见，珍爱和平，最通情达理的民族，回顾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和平，为了人类的幸福，不让这悲惨的历史重演。我想对所有的人说：“请记住，贫穷就受欺负，落后就会挨打。我们一定要跟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圆梦新时代

讲述人：河西区东海街 孟祥芝

我和老伴每个月的十一日都高高兴兴地到银行去领取当月的退休金，这一天，我们又去领退休金了，坐在长椅上等候的时候，看到一位和我们年龄相仿的老人面带微笑的说：“咱们人老了，国家每月还发给退休金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听着这些对话，我心里一惊不由地长叹一声，想起了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悲惨的老年生活。

我母亲是由亲戚过继来的，除母亲外，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没有其他子女，一家三口靠外祖父一人在铁路做巡道工维持生活。当时铁路被日本鬼子垄断着，工人们受尽了欺压凌辱，搜身、挨骂、挨打……外祖父四十八岁那年就被除名了，外祖父回到家里只说了一句话：“老了，人家不用咱了。”二老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老人家的工作丢了，生活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今后怎么生活啊！他们在为自己的晚年生活而发愁、忧虑，他们就在这种极度的绝望之中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天津沦陷，日本鬼子的铁蹄踏遍祖国大地，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我们失去了多少同胞，当时人们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老百姓连糊口的粮食都买不到，市面上只有变了质的杂合面还得去排队、去抢。外祖父这么大年纪怎么抢的上？抢不上

就没有饭吃，再加上被除名了没钱了，生活就更艰难了，无奈之下，外祖父到乡下老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了半袋玉米面，回到天津刚下火车就被日本鬼子发现了，一刺刀就扎破了口袋，刚借来的粮食一口没吃就撒落一地，还挨了日本鬼子的毒打，就这样跑回了家。看见外祖母后痛哭流涕地把遭遇说了一遍。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挨、一年一年地过，万般无奈之下，老两口回了乡下，可他们没种过地，也不会种地，靠种地还是养活不了自己，在乡下亲友的帮助下又回到了天津，可房子也没有了，就找个地方摆个摊卖糖果维持最低生活。不久外祖父去世了，外祖母一想起外祖父就对我讲“到什么时候人老了，能不愁吃穿过上安定的日子就好了，真不敢想……”就这样二老带着这个梦想相继过世了。

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幸福晚年，国家每月给我们足够用的养老金，住房是在职时国家分配的，子女们也都有学上，有工作，就是困难的老人们国家也给以经济上的帮扶，真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衣食无忧安度晚年。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过上这么好的晚年生活，替过去受苦受难的老年人圆了梦。我从心里祝愿新中国永远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北洋旧事

口述者：北洋新里 司连胜

整理者：云广新里社区

天津市河西区挂甲寺街北洋新里小区早时候是一片三级跳坑，改造后有了今天的模样。老兵司连胜同志见证了这里的沧海桑田。儿时家里条件不好，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兄弟姐妹4人。1949年出生的他，正赶上祖国建设的年代，“国家哪里需要，哪里就有我”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司爷爷说：“当时啊，全家的氛围都是要建设祖国。”中学毕业后分配了工作，在工作单位挖河道挖地铁，大家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地搞建设搞生产。在他的哥哥们陆续参军之后，他也踊跃报名参军，把海陆空三军的颜色留在家中。司爷爷是1970年入伍的空军，在云南省昆明市驻扎。据他回忆，当时部队多次进入战备状态，让探亲成了盼望。

1979年2月17日，终于，批下来探亲假的司连生回到了家中。与亲人短暂的相聚。这时前线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当时前线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事。司连胜当时是营职军官，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和家人做了交代，“我穿上新军装就准备去前线了，当时也没多想，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当逃兵啊”他回忆道。他所在的昆明市战况十分惨烈，路上到处都是死伤的士兵，天空上黑压压的都是我们的战斗机。司爷爷

说，年少的我因为情怀和家中积极的拥军氛围，选择参军入伍，献身国防，履行兵役义务。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还历历在目，在云南昆明接受训练，之后从云南昆明到前线军区，为空中部队后勤保障。一直到退伍，虽然没有上过真正的战场，但是一直在前线经历过战火纷飞，对于司爷爷来说，每天的训练和工作就是战场，时刻做好要上战场的准备。当时我怀着不怕吃苦的信念认真地对待每次训练，每项工作，也许是伙伴和上级看见了他的付出。他说道“让我有幸荣获嘉奖，嘉奖是国家对我的肯定，是党对我的认可。”。

司爷爷离开了戎装生涯，他来到了天津市供销社工作，那时候管的工作非常的多。就得精尽办法。想尽一切办法完成好工作。那时的工资很少，但抵挡不住他们对工作的热情。虽然司爷爷一生管过很多工作，但是他说只要他经手的工作，就出不了岔子。后来单位分房子来到了北洋新里。北洋新里刚刚建设好，住进来的时候还有跳坑。司爷爷问我什么是跳坑吗？我说只在书本上见过了。他笑着说“这三级跳坑就是到了下雨的时候先在道路上积水，然后流到门前，最后流进家里的低洼平房”，说起来“咱们这里还是这以前北洋三级跳坑的遗址哩”。他说平时也会写些东西，想把以前的记忆留下来。家里还有着对以前跳坑的描述和以前生活的回忆，司爷爷用文字把他们留了下来，攒在一起，像是一本关于那个时代的传记。

结束采访的时候，司爷爷与我语重心长的说。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了，但是我们不能忘掉以前的精神。吃苦耐劳、

勤朴节约，应是我们每一代人的良好品德。年轻人也要学习新时代的思想，有想办事的工作态度，也要不断学习精进方法，有办好事的工作能力。那样基层才会好，老百姓互帮互助，大家其乐融融。

改革开放前后那些事

口述者：王启成 王派快板书王凤山大师在传弟子

整理者：龙都社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腾飞发展，变化颇丰，进步颇大，龙都花园社区的王哲先生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下面是王哲先生的亲身经历以及切身感受。

首先说说河西区改革开放之前跟改革开放之后，我个人感受的明显的变化。

我原先的住在咱河西的工人新村这一片，都是平房，那时候还不错了，跟刚解放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工人新村那时候建了平房了，一排一排的，但是跟现在没法比。开放之前，到了这个月份，天马上就凉了，家家户户得打烟筒、套炉子、买煤，那时候可麻烦了，往煤场买煤球去，定完煤球人家给送到家里来，那时候没地方搁，一间屋子半间炕，院子也除了平房没有其他地方放。所以在炕底下拿铺板子搭起来，把煤球都搁铺底下，剩下的煤沫子贴成煤饼子或者打成小块。再留一部分封炉子使。除了买煤还得买劈柴，但是很多时候劈柴不好买，老百姓就得用捡的冰棍棍、冰棍纸，还有桦树皮、油毡做引火之物生炉子。

天气越来越凉了，紧接着就得吃的方面，那时候冬天

不像现在，什么菜也没有，有芥菜头、大白菜、土豆。大白菜也是平常不卖，卖的时候需要凭本才能买，一次就得买二三百斤，够一冬天吃的，那时候要买大白菜都跟干工程似的，家里头大人孩子全都上阵，拿自行车推的，拿小孩的坐的车往家推的，你推到家里，完之后你还得保存好了，别烂了，这是吃的方面。水果也只有苹果、橘子、梨，别的也没有，我小时候吃的橘子都苦的、烂的、冻的，跟现在一天一地比不了，现在想吃什么了，点个外卖，不管多晚都给你送来，还得说是改革开放好。

再说说住的方面，家家户户都是一间屋半间炕，那时候大多家庭都有两三个孩子，夏天热得睡不着觉，都在马路边上支个行军床或者竹椅子，有的直接弄块铺板铺凉席睡，现在冬暖夏凉的，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生活越来越好。

再有一个上厕所，可麻烦了，早晨一睁眼你就得往那公厕排队去，甭管男的都排大长队，家里大人上班，早上起来叫孩子先去占位，快到了再去喊。那时候都是旱厕，跟现在的公共厕所没法比。现在的公共厕所里喷儿香，过去旱厕特别脏，还特别不方便。还有一个就是洗澡，那时候想洗澡就去澡堂子，我们小时候腊月二十九就去澡堂子洗澡，孩子到里头一个个搓都跟小胡萝卜似的，这一年的泥都搓下来了。哪像现在，不论是上厕所还是洗澡都那么方便。

最后说说玩的方面，广东路原先有个青少年活动中心，我们小时候那块地方是开洼、大水坑，中间有一块突出来的地儿，我们管它叫“王八岛”，小孩们都往那玩去，家长还不

让去，怕淹着。小时候坐车也不方便，上哪去都不方便，公交车也少，不像现在又是地铁又公交，还能打车。

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归根结底还是要感谢共产党，一点一点地就为老百姓谋福利，现在住的宽宽敞敞，想吃什么有什么，原来不敢想还能吃到外国的东西，现在上个网就买了，连退都不用跑了，出行也方便，所以现在咱们赶上好时候了，感谢共产党，感谢习主席，我们太幸福了。

难忘投身抗战岁月

口述者：尖山街 姚明 整理者：杨明

每一位老兵，都是一部活的抗战史。在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时刻，在炮火纷飞的战乱岁月，用肩膀扛起了一个时代，以满腔的热忱和无限的勇气投入到救国救民的抗争中。每当回想起那段珍贵的记忆，我心中热血沸腾。

“七七”事变前，我还在农村半耕半读念小学。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突然发动卢沟桥事件，不久占领了我的家乡河北藁城，从此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深重灾难中，日本鬼子不断出城扫荡，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每当我看到日本鬼子铁蹄横行的万恶行径，心中就怒火填胸，不甘心当亡国奴。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派来干部到藁城宣传抗日救国，组织青年参加抗战。

1938年夏秋之交，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河北藁城北孟村办的青年训练班。“青训班”主要是组织爱国青年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的抗战三阶段论述，组织成立“青年救国会”发动爱国青年参军抗日。我在“青训班”接受了共产党爱国主义进步思想教育，认清了形势，认准了方向，提高了革命觉悟，在家乡西浦城村担任了青救会主任。

1939年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我被选入村“武委会”担任教育委员，组织广大爱国青壮年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队，

建立村里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武委会”带领村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挖沟破路切断敌人的电话线、公路和铁路，阻扰日本鬼子的扫荡。在残酷的革命斗争考验中，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秋，上级指示秘密建立我们自己的村政权，经民主选举我程伟村政权班子中的三人之一，担任财粮委员，负责征粮和藏粮，同时还要了解敌伪的动向收集情报，并开展对敌伪人员的教育和除奸战斗，记得为了除掉一名罪大恶极的汉奸，事先由游击队员诱敌进入埋伏，然后抓住时机结束了汉奸的狗命，这对日伪人员起到了震慑和教育作用。

1942年5月1日，日伪集中五万余兵力对冀中根据地实行了残酷野蛮的“拉网大扫荡”和“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为了保存地方抗日力量，地方县区干部都转入地下开展秘密的抗日活动和斗争，那时我们的工作不仅全部在夜间，而且更加隐蔽，大部分时间蹲“地洞”或隐藏在可靠的堡垒户当中。

无论环境多么残酷，共产党人的信仰丝毫也不动摇，我的工作重点仍然负责粮食的征收和保管，以保障及时补给我们的军队，由于恶略的生存环境我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全身长满疥疮，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渐渐治愈。

在1941—1945年抗战期间，我曾再次遇险，一次是在北隆官村活动时，村子被日伪军小分队包围，鬼子机枪不时向村里扫射，突然枪声停了下来，好大一会儿没了动静，我判断敌人走了，就与村武委会主任商量决定撤离转移，这时候

村治安员来报，说日伪小分队都埋伏到村口，他毫不犹豫地把我们带到一堡垒户家中，钻入他挖的地道里，这个地道的出口在村边的道沟处，顺着道沟猫腰疾走翻出去钻进青纱帐，敌人似乎觉察了动静，用机枪一阵扫射，子弹从身边嗖嗖而过，我们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埋伏。

另一次，因为天热得很，晚上趁天黑我爬上了吴村村边一家佃户的房顶上休息，由于白天忙累，不知不觉睡着了，敌人悄悄摸进村子时发现了，一个鬼子上房搜了搜发现我没有武器，就把我交给了爬上房的两个伪军看着，我急中生智把藏身上的边区票子和一点钱拿出来假装藏掖，两个伪军见钱眼开，一把夺过票子和钱，他们只顾着分钱，我趁机转身从房檐跳了下去，当时心想宁肯摔死或被乱枪打死，也不能落在鬼子手里，当两个伪军醒过神来胡乱朝房下打了机枪，幸好没有伤着我。听见枪声村里的一个堡垒户及时掩护我躲进他家里，将我藏在了夹墙中才躲过此一劫。

每当我想起这两次遇险，死里逃生，除了靠着机智勇敢和坚定的信念，多亏了老百姓的保护。我们共产党植根在老百姓心中，老百姓筑起了铁壁铜墙，共产党人和老百姓同仇敌忾，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想的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

回顾自己参加抗日走上革命道路的件件往事，不仅是为亲历和参加那场抗日战争而感到自豪，也是为缅怀已经牺牲和故去的老战友们，更是为了告诉后代，勿忘国耻，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而奋发图强。

鹰击长空 捍卫蓝天保家园

周修平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每当我回忆那段难忘的历史岁月和可歌可泣的往事，心中更加热血沸腾。

我是周修平，1933年出生在上海，1950年入伍，光荣的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畏强敌，荣获飞行大队集体功。1959年国庆十周年阅兵时，驾驶战机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三次，获得飞行荣誉证书及多枚勋章。

在我的记忆里，华东军政大学校歌是最熟悉的旋律，我现在还经常唱起。从淞沪会战时的日军轰炸、全家逃难，再到上海解放后国民党空军袭扰，我当时17岁，热血少年，从上海虹口中学出发，参军报国。第一站，来到华东军政大学学习。空军部队选拔，从6000余名学员中脱颖而出，赴济南第五航校培训飞行，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空军飞行员。

1952年，我接到命令，加入空军第三师入朝作战。战斗机都是团队作战，志愿军将面对经验丰富的对手。但在作战中，志愿军空军丝毫不怵，英勇出击。我至今还记得一次空战中，战友罗沧海1分钟击落了3架敌机，打了场漂亮仗。

由于当时通讯技术不发达，1952年的一次执行任务中，因战斗后油料不足，临时降落在别的机场，我经历了一次难

忘的“牺牲”。十年后，我和航校老教官的一次见面，才重新“归队”。1959年5月，我刚为人父，奉命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阅兵。各型战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圆满完成任务，我能够参加国庆阅兵，感到很光荣。

后来转到空军十一航校任教后，主编撰写了多套空军战术教材，培养了一代代人民空军飞行员。三十三年立功无数，但我从未忘记青春年少时的爱国初心：“学习一生，战斗一生，为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天津总站联合多部门推出《的峥嵘岁月 家国记忆》特别节目对周修平老英雄的口述采访综合整理。

弘扬红色文化，追寻红色记忆

——抗美援朝战士吴光简要事迹

柳林街东海里社区

口述人：吴 光

整理人：东海里社区 王子一

我叫吴光，女，汉族，1934年11月08日出生，1951年6月入伍，在太原市晋龙捷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工作。1952年08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同众多男志愿军战士一起进入朝鲜随军参战，成为了一名文化教育员，用知识武装战士头脑，除了教战士们识字读书，还为战士们缝补衣物，照顾伤员，做好后勤保障工作。1953年荣获抗美援朝三等功一次，195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1月退役，转业安置河北省石家庄



吴光同志在朝鲜前线

市长安区邮电局工作。

在退役以后，投入到抗美援朝优秀事迹的宣讲工作中，在社区主题党日活动多次为大家讲述抗美援朝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光荣历史，带大家重回抗美援朝时期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牢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老兵们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



吴光同志与朝鲜群众



吴光同志为战士缝补衣物

刻骨铭心永不消失的记忆

柳林街腾华里社区

口述者：原天津市造纸一厂 书记兼厂长 刘树森

整理者：腾华里社区 耳玥

时光已过去四十多年，76年大地震一幕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任天津市造纸一厂书记兼厂长，该厂一千多名工人在抗震救灾中，演出了一场可歌可泣的篇章，我曾代表他们出席了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京津唐地区抗震救灾英雄模范代表大会。

一、厂与家

1976年7月28日清晨，地震刚刚发生了一个小时，厂党委总支的所有成员已全部到厂，党员、团员二百多人也先后来到工厂，后续来了更多的人，他们都是和家人刚刚逃出室外的普通百姓，他们还惊魂未定却毅然向工厂飞奔而来，他们不是不关心家人，他们更担心还在车间生产的一两百名工人兄弟和工厂的安危，在四十多年后经济社会的今天，回顾他们当时的忘我精神，到底该如何评价？他们那种精神又该如何理解？

二、承诺

在灰蒙蒙的清晨和连续不断的余震中，党总支宣布紧急决定：

1. 以车间支部为核心，以班组为单位，立即出厂到所属工人各家各户摸排伤亡情况，重伤送医院，轻伤送回厂，全厂大小车辆全部跟随出动。

2. 对工人家属有条件搭盖地震棚的，按所需要数量由厂发给原材料，对没有条件搭盖的员工，把全家老小全部搬进工厂。

3. 全厂组成物资组、后勤组、抢险组、保卫组各负其责。

仅在一两天内，全厂工人和家属全部得到了妥善安排，具体情况是：住的方面，在厂内共用了上百块大毡布搭起上百个大棚，为大家遮风挡雨；吃的方面，由厂大食堂和部分家属帮忙蒸馒头、切咸菜，每顿饭大人们可以领两个馒头，小孩儿领一个，四天后，库存的白面用光了改吃玉米面，再后来开车到外地兄弟单位借粮，这种情况一直坚持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在工厂周围搭建了一百六十多间临建房，让全部工人家属搬出厂外，临时安了家。

事后后勤组合算，共用了木材 215 吨（全部是造纸原料）、苇席 500 领、毡布 50 块、油毡 200 捆，还有砖瓦水泥和粮食消耗等等。

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头看一个小小的厂党总支，在没有经过上级批准的情况下，竟敢动用了如此大量的国有资产，是对还是错？是功还是过？

与此同时，有一个兄弟大厂地震发生后，党委立即组织干部民兵荷枪实弹，严守工厂大门和各个出口，不准工人进厂，怕出现哄抢国家财产的情况，该厂震后没有丢失任何财产，

受到上级部门表扬。

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来造纸一厂采访，她听取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后问我，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当时的动机是什么？我答：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处于大灾大难之中，任何党组织都有责任解救他们。她又问，没有经上级批准，你们就发放了这么多的物资，这是国家的财产，你们不怕上级怪罪和处分吗？我答：在封建社会，有县太爷敢冒杀头之罪开仓，放粮，救灾，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为什么不敢。她最后问我，你们还想到了什么？我说：我们党总支成员们一致认为，平时天天讲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工人以厂为家，在这大灾大难面前，党组织必须要兑现承诺。

三、胆大妄为

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厂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工人们背着厂部、党总支，各车间自行开工生产了，原来他们自全家都得到妥善安置后，一天都没有休息，经过严密的组织安排，冒着不断的余震，分班昼夜抢修，加固厂房和损坏的机器设备。在车间支部的统一领导下，毅然开工生产了。巨大的机器轰鸣声振奋了全厂工人干部和家属们的心，难道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也怕，所以在抢修厂房和设备的同时，也制作了各种防震保安的措施，如厂锅炉房在气压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只要报警出现地震，在几十米之外的防震岗哨上，拉下控制绳索，锅炉立即停气熄火、放汽保安全；车间操作工人自制了比坦克还坚固的钢铁堡垒……后来轻工业部的王毅之部长还亲临造纸一厂视察抗震救灾情况，特别对那些防

震措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还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些不仅是防震的好办法，同样也是战备的好措施，我看到了工人主人翁的精神。事后还是那位新华社记者来厂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工人们对她讲，在我们一家老小最困难的时候，工厂变成了我们工人的家，当然我们也要真正体现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她又问工人们，你们开工生产，为什么不事先向厂党总支汇报？工人们答：面临如此险情，领导不会让我们去冒险，既然厂领导敢担当，我们工人也敢作为。

震后，冒着巨大的余震，恢复生产的第一家工厂就是我们天津市造纸一厂，恢复生产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市，影响巨大，每天兄弟单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我厂产品供应全国各地的固定用户。当用户得到我厂恢复生产的信息后，都争分夺秒来厂提货，我们仅开工两个月的时间所赚到的利润已远超地震损失。

原造纸一厂上千名的老工人都早已退休，有很多人已经过世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早已销声匿迹，烟消云散，但在我心中依然是刻骨铭心，是永不消失的记忆。

改革开放与我

口述者：孙晓雁

整理者：霍婧媛

口述者孙晓雁是三合里社区现任马场街三合里社区党委委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到发展的伟大飞跃。而我，完整地见证了这一过程。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3年，12岁之前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受迫害致死、母亲被关进了“牛棚”；1968年哥哥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山西运城地区夏县插队；几个月后我因无经济来源无法独立生活就投奔哥哥去了山西农村，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活。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条件很差，知青们住窑洞、睡土炕，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我们和那里的乡亲们干一样的农活，一年忙到头。在冬季农闲时我还要继续找活干，挣工分养活自己。虽然生活环境很艰苦，但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给予我很多关照，让我感到了温暖。在劳动中我不怕苦和累，是知青里最能干的女生，还曾经成为生产大队“学大寨百人突击队”成员。

1979 年国家拨乱反正，我父母得到平反，我也落实政策回到天津，分配到天津人民出版社工作。

回城使我生活状况改善很多，但工作上的压力很大。我的岗位是校对编辑，需要具备一定的汉语文字水平，所以，尽快提高工作能力成为当务之急。我那时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但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到南开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中文系攻读汉语言文学与编辑学专业，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在出版社校对编辑岗位三十余年，工作认真，得到了领导和同人们的认可。这些年，我亲眼看到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变化：国力强盛，个人收入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幸福感满满。人到中年后特别怀念曾经为之奉献过青春的第二故乡夏县水头镇和那里的父老乡亲，曾多次回乡探望过。我看到曾经很贫困的村子发生的巨大变化：很多乡亲已经脱贫，住上了独栋小楼，家家有汽车，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还用上了天然气。村子里道路修葺一新，还有花园、戏台；孩子们上学有校车，老人有食堂，真是面貌一新啊。在感慨村子变化的同时，我和哥哥商量要为乡亲们做点什么。经过反复考虑，我们决定利用自身优势，给村里捐建一个图书馆，让乡亲们生活富裕起来的同时精神上也得到充实。我们的想法得到知青们的支持，大家利用自身的资源，找资金、找图书。在村委会支持下，一座漂亮的知青图书馆在九年之后落成了，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图书馆募捐到近万册图书。

改革开放虽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今后的任务更艰巨、挑

战更严峻。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共同挥写更加辉煌的历史新篇章！

最难忘的一次战斗

口述者：谢凤林 整理者：王莹

相关背景：口述者谢凤林，男，退休于 93688 部队，现住天津市河西区平山道 34 号院 3 号楼 2 门，中共党员，社区志愿者。

1968 年 3 月 22 日我英雄的空军

地空导弹二营在广西北宁明上空一举将美国高空无人侦察机击落，这是二营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第五次用地空导弹将敌高空侦察机击落辉煌战绩。

我当时是二营一连二号车即指令发射车操纵员，有幸参加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次战斗，回忆起来心情难以平静，下面就让我摘录我们营长陈辉亭写的《飞鸣镝》一书中关于此次战斗的真实经历。

英雄营的最后一战

二营经过紧张的敌前练兵，对三种作战对象了如指掌，对掌握三种打法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全营一杆枪，昼夜遥望天空，等待着来犯之敌。这一天终于给盼来了。

3 月 22 日，是广西北宁明一带多日来少有的好天气。蔚蓝的天空，一丝云彩也没有，风不吹，树不摇。正是木棉花盛开的季节。木棉花，又叫英雄花。阵地周围那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木棉树上盛开的木棉花，被阳光照射得像是一簇簇跳跃

着的火焰，十分光彩夺目。那形状还真像战争年代为英雄们佩戴的大红花。据说，古代打了胜仗的英雄，才有资格佩戴木棉花。

部队吃过了早饭，就进入阵地待战。

上午8时，从北部湾的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轰炸机，一批接着批，对越南的谅山、克夫一带进行轰炸。二营的全体指战员严阵以待地守卫在阵地上，随时准备着歼灭可能入窜到中国境内的战斗轰炸机，但整个上午也没有发生敌机越境入窜的情况。午饭后，大家就地休息，等待敌机下午轰炸的开始。

13时12分，营指挥所的值班无线电员收到了一批新的情况，编号为7308批，机型不明，高度18000米。

部队多年来都是打的高空侦察机，所以值班无线电员一听到高度是18000米，立刻警觉起来，报告了作战值班参谋郭新平。

值班标图员听说有了高空敌情，立即戴上耳机，将无线电员收到的敌情标在图上。

敌机是在越南奠边府以南180公里的老挝境内，向越南的奠边府方向飞行。

营值班参谋郭新平与师指挥所的值班参谋校对了敌情，确认这是一架高空侦察机后，立即报告给营长陈辉亭。

营长陈辉亭进入指挥所，就叫值班参谋郭新平问师指挥所：是U-2飞机，还是无人驾驶飞机。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13时23分，敌机高度上升为20000米，从高度上判断像

是一架 U-2 飞机。

13 时 33 分，该批敌机飞往越南的奠边府上空，经奠边府向中越边境增城市老街方向飞行，似有侦察昆明或经昆明侦察我西北纵深的企图

13 时 40 分，该批敌机飞往老街后，改变了航向，沿着中越边境线骗式地向广西方向飞行。营长陈辉亭判断是侦察广西中越边境，下令营指挥所：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13 时 50 分，敌机距离宁明 280 公里时，师指挥所命令二营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因为部队早已在阵地上待命，3 分钟后全营战斗准备完毕
指战员们听说是 U-2 飞机来了，各个精神振奋，自从兰州上中保一仗失利后，这个仗他们已经盼了三年多的时间！

14 时整，距离二营 200 公里时，敌机飞到中国的广西、云南和越南的两国三地交界处，又一次改变航向，沿着中越边界线的那孟、龙邦、高平水口关向凭祥、友谊关方向飞行。

营长陈辉亭和政委林宝喜坐在指挥所的标图板前，分析判断着敌情。这是一条在一年以前 U-2 飞机曾经飞过一次的老航线，入甯到宁明上空的可能性很大。两个人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敌机，思绪也很不平静，因为这将是他们两个人在二营接班以来的第一次战斗。这一仗对二营来讲，是一次只能打胜，不能打败的仗，若再打败了，就会有损“英雄营”的形象，二营的士气就会遭受极大的打击。使他们心里踏实一点儿的是，来到中越边境设伏后，他们冒着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帽子的风险，大抓了部队的军事训练，具备了打好

仗的基础。但战斗中偶然性很大，发射了导弹，飞机不落地谁也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敌机越来越近，战机越来越大。使营长陈辉亭最伤脑筋的是：各级都还未判断清楚目标的性质。按以往 U-2 飞机在该地区的活动航线和 20000 米的高度分析，很像是一架 U-2 飞机，但如果是 U-2 飞机，师和营的目标指示雷达为什么还发现不了目标？从这点上判断，又像是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U-2 飞机和无人驾驶飞机，虽同属高空侦察机，但打法完全不同，作战距离、射击的区域和制导方法都不相同，这两种不同的打法，在发射导弹前转换起来也有不小的难度，因为它要改变作战命令，要改变战斗操作方法，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把 U-2 飞机当成无人驾驶飞机打了，或是把无人驾驶飞机当成 U-2 飞机打了，都将降低导弹的命中概率，甚至造成战斗失利的严重后果。

敌机距离二营 180 公里时，营长陈辉亭进入显示车指挥

上车前，他对政委林宝喜说：敌机快到上车指挥的距离了，我要上车指挥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林宝喜想，前面的五仗，营长虽都经历了，但亲自上阵指挥还是第一次，便对营长陈辉亭说：老营长的经验，沉着，灵活。我相信你一定能打好。万一没打好，我们俩共同承担责任。

陈辉亭说：那好！我决心已定，我们阵地上有四发导弹，先发射三发要是三发没打下来，还有射击条件，就再发射一发。四发打下来，也是个大胜仗，若是四发都没打下来，那就痛

痛快地一块检讨。林宝喜说：好我同意。

说着陈营长就上车去了。

陈辉亭上车后做了简要的战前动员，他说：同志们，根据敌机的航线判断，敌机窜入我营火力范围的可能性很大，我们盼望已久的战机就要来到，但到目前为止，是U-2飞机还是无人驾驶飞机，还没有搞清楚，按高度和航线分析，像是U-2飞机，按情报保障不连续，目标指示雷达还没有发现目标这一点看；又像是无人驾驶飞机，我们必须同时做好打U-2飞机和打无人驾驶飞机的两手准备。要求转换战斗操作要快、要稳、要准。不管是什么飞机，一定要把它打下来，再为人民立新功！

敌机距离100公里时，师指挥所指示二营营长陈辉亭，集中全力，掌握好该批敌机。做好一切射击准备。

14时9分，敌机距二营90公里时，空七军转来空军指挥所的指示：“敌机机型尚未判断清楚，按U-2飞机打，射击距离要适当压近”。

敌机入窜侦察宁明机场的企图已非常明显。

营长陈辉亭下令四发导弹接电准备。

正当战斗进入紧张的关键时刻，营长陈辉亭忽然想起，昨天下午部队刚补入几十名新兵还未对其进行任何教育。他怕发射架载着导弹与制导雷达同步起来，吸引新兵跑到跟前去看热闹，被发射的导弹烧伤，危及生命，他一边命令引导技师再次发出清理场地的战斗警报，一边用对讲机命令指挥所，要组织人员把新兵收拢。

政委林宝喜立即跑出指挥所，组织人员检查，安排干部在阵地入口处警戒。

直到指挥所报告：场地清理完毕，已采取严格措施，防止新兵进入发射阵地。陈辉亭才放了心，集中精力，投入战斗。

此时的情况非常复杂，非但机型没有判断清楚，雷达的情报保障也非常不好，对空情报总站通报的情况，时断时续，时有时无。

当时营主要依靠的宁明机场的 II-20 雷达掌握的情况也非常糟糕，起不到目标指示的作用。本营的 513 目标指示雷达的情况也不连续。作战参谋郭新平只能靠推算出距离指示目标的位置，这一切都给作战指挥增加了难度。

14 时 10 分，敌机距离 65 公里时，师命令二营：“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坚定沉着”“为人民立新功”“坚决消灭敌机”。

陈辉亭接到命令后，按照打 U-2 飞机的作战方案下达了作战决心“前置法，导弹三发 34 公里开天线，33 公里发射导弹。”

14 时 11 分，敌机距离 55 公里时，营长下令接通同步，把导弹指向了飞机。敌机飞过水口关，航向有所改变，从宁明与凭祥中间靠凭祥一侧通过。航路捷径逐渐变大，打 U-2 飞机的射击条件正在变差。

径情直遂的战斗是没有的，正当战斗进入关键的阶段，需要精确的目标指示的时刻，对空情报总站的空情停播了，失去了远方情报。宁明机场航空兵师的 II-20 雷达和本营的 513 雷达也均丢失了目标，近方情报也没有了，就像是一间灯

火辉煌的房间，突然停了电，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

如果当时知道是无人驾驶飞机，营长陈辉亭就会下令开天线，用制导雷达搜索捕捉目标。但因为敌机的性质尚未判断清楚，仍然是按 U-2 飞机处理，陈辉亭也不敢轻易下令开制导雷达天线搜捕目标，因为如果真是 U-2 飞机，被其发现，敌机就会立即施放干扰，转弯机动，逃之夭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命令指挥所，要镇定、沉着、不慌，推算距离指示目标。

作战参谋郭新平一看远、近方情报都没有了，立刻按下了早已准备好的秒表，熟练地按照目标的速度和航向，一点、一点推算目标的方位和距离，进行目标指示。

方位角操纵手张振样，按照目标指示准确地修正装定方位角数值。距离操纵手颜厚册按照目标指示准确地修正和装定着敌机的距离；高低电操纵手王军，按照目标指示的距离和敌机的高度，准确地换算出高低角，一点一点地加上提前量静默跟踪着敌机。

敌机距离 42 公里时，接到上级指示：“入侵敌机是无人驾驶飞机，可提前开天线”。

营长陈辉亭根据指示，迅速改变了作战决心：“三点法，导弹三发，听命令开天线和发射导弹。”

为什么这么处置呢？主要是对要打的目标性质心里还不踏实。陈辉亭想：作为第一线的指挥员，既要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指示，又要根据掌握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处置。上级的判断，是根据各方雷达的观察综合分析的，是一般抽象的判断，

但到底是 U-2 飞机，还是无人驾驶飞机，具体的、更准确的判断，最终还是要靠制导雷达开天线捕捉目标后，由作战单位的第一线指挥员，从显示器上直接看到目标信号和敌机的反应才能确定。是无人驾驶飞机，目标信号小，不机动，无干扰；是 U-2 飞机，信号大，就会立即施放干扰并机动逃脱。基于这种考虑，营长陈辉亭定下了一个既能打无人驾驶飞机，又能打 U-2 飞机的决心，将开天线的距离定在 38 公里。

营指挥所的作战参谋郭新平一听营长定下了 38 公里开天线捕捉目标的命令，全神贯注地推算着敌机的方位和距离。

目标 40 公里！

目标 39 公里！

目标 38 公里！！

他的声音洪亮、干脆。

营长陈辉亭一听敌机到了 38 公里，立即下令：“开天线，搜捕目标。

这时，指挥所和显示车内一片寂静，大家都在捏着一把汗，揪着一颗心，担心能否发现得了目标。因为从 65 公里失去了远、近方情报，到 38 公里开天线，这中间的两分钟的飞行时间、27 公里的航程，都是靠作战参谋用一块秒表，按飞机的秒速推算出来的，推算的能那么准确吗？万一发现不了目标，后面的结果就是贻误战机。

目标！方位角操纵手张振祥首先发现了目标

发现目标！！高低角和距离两个操纵手同声报告发现了目标。

陈辉亭下令：判断目标性质。

“无人驾驶飞机，不是 U-2 飞机，信号很弱，只能手控，不能自动跟踪。”引导技师向营长报告着。

陈辉亭紧紧盯着显示器上的目标信号，判明确实不是 U-2 飞机，随即下达按无人驾驶飞机进行战斗操作的命令。

敌机距离 34 公里时，回波信号逐渐转强，由手控转为自动跟踪。

射击标图员陈军测出目标航路捷径是 21 公里。

由于战前陈辉亭已把与航路捷径相对应导弹发射距离熟记在心，当听到目标航路捷径为 21 公里时，他知道还只有一点点杀伤区了，航路经再大 1 公里，就没有射击条件了。在 21 公里的航路捷径上，只有在 30 公里的距离上发射导弹，才有可能使导弹在仅有的一点点的杀伤区与目标清遇。发射早了，敌机还没有进入杀伤区；发射晚了，敌机就会飞出杀伤区，两者都会大大降低导弹的命中精度。

成败在此一举。陈辉亭当机立断，补充下达命令：30 公里发射导弹。敌机到达 30 公里时，引导技师报告：“发射距离到！”

营长陈辉亭立即下达了发射命令，引导技师连续发射三发导弹。

导弹的轰鸣，响彻云霄。全体指战员的心也跟着这三发导弹一起飞去，两眼紧紧跟踪着远去的导弹，心揪得紧紧的。他们在担心着：这么小的目标，这么高的高度，这么弱的目标回波信号，这么差的射击条件，能把敌机打下来吗？我们

二营可不能再打一次败仗了，要是再打一次败仗就真是无地自容了。

在指挥车内，一片寂静，营长陈辉亭和引导技师及操纵手们全神贯注地在操作着，两眼紧盯着显示器上那三颗不断接近敌机的导弹信号和跟踪波门，第一发导弹就要靠近敌机了，刹那间显示器上显示出导弹在敌机跟前起爆的回波。

引导技师杨联兴激动地连声报告：第一发击中目标

因受第一发导弹起爆的影响，第二发导弹穿越敌机自毁，第三发导弹紧接着又与敌机遭遇起爆。因体积小，飞机的高度缓慢下降。

营指挥所的对讲机里，传来了营长陈辉亭的声音：“上报战果，消耗导弹三发，击落美帝高空无人驾驶飞机一架！”

在发射连和技术保障连的阵地上，战士们看到发射的导弹起飞后也都手搭凉棚地顺着起飞的导弹膝望着天空，观察着导弹的飞行状态当天空中闪出导弹击中敌机的烟云时，战士们各个喜笑颜开，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喊着：打中了！打中了！

阵地上一片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上中堡的仇报了！”“上中堡的耻雪了！”“我们还是‘英雄营’！”……

憋了三年多的一口气终于喷发了出来。

敌机的残骸坠落于宁明机场西南 21 公里处的宁明县寨安公社板屯大队。经现场勘察是一架 147-H 型无人驾驶侦察机。

战后，我新华社以《我英雄空军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持高度戒备，再次击落美帝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一架》的通栏大标题发表了消息。

4月7日下午，空七军在宁明为二营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热烈庆祝3月22日一举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飞机一架的重大胜利表彰作战有功人员。

广空王朴司令员代表空军领导机关宣读了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嘉奖令。

王朴代表空军领导机关授予作战有功人员奖状和奖品。国防部为二营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全营有七十名干部战士立功受奖，在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员，荣立了一等功和二等功。与此前的数次奖励不同的是，1965年5月我军取消了军衔制，而此时又当“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所以没有了给官兵们晋职晋级的项目。

营长陈辉亭代表全营和作战有功人员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营从青藏高原，长途跋涉8000公里，来到广西中越边境，在空七军和师的领导和指挥下，取得了击落敌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上级正确指挥的结果，今后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为保卫祖国再立新功……

这一仗，为二营的十年征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年10月，国庆十九周年的时候，营长陈辉亭和在3月22日的战斗中荣立一等功的制导雷达连显示车的方位角操纵手张振祥应邀参加了国庆观礼。他们又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这在当时更是全营获得的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

日新月异

口述者：崔可美

整理者：霍婧媛

崔可美是三合里社区现任马场街三合里社区党委委员

我叫崔可美，今年 72 岁。我是 1967 届初中毕业生。毕业于天津市第 19 中学（老三届）。我曾经下过乡，插过队，当了几年知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自己是 1969 年 1 月份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们的口号是：绝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到祖国广阔天地去。就这样，由学校统一分到天津北大港翟庄子大队插队。当时不到 18 岁，尽管在农村吃了不少苦，经受了劳动锻炼，却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学到了书本里没有的知识。重要的是政治生活上，在大队团组织教育培养下，自己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共青团员了。后来又担任了大队会计。在 1971 年 9 月份第一批被选调回天津市和平区当上了小学教师（当时觉得好像在做梦，没想到还能回城市来）。经过边教学，边学习，补习功课获得了中等师范文凭。那个时候，中央教育部规定小学教师必须具备中等师范学历。

说到这，我要插几句话。实际上我从小就非常崇拜解放军。我就想长大了，当一名解放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枪，在祖国边防哨所，在各个岗位上，保卫祖国。哎！这也是我

终生遗憾。然而，自己先当了农民，又当了一名人民教师。不过也挺高兴，有工作了，由在农村挣工分转为挣固定工资了，当教师也光荣！下面我想从两个方面说说改革开放前后情况的今非昔比。（（一）教学方法（二）生活变迁）

（一）教学工作的教学方法不同了。

我从教<英语>教学，那时就是一本书和粉笔。教学中板书很重要，多数情况用白色粉笔，重难点用彩色粉笔。一节课下来，涂擦黑板的粉笔沫，布满教室。老师和坐在前排学生整天吸粉笔沫。为了让学生对学习英语感兴趣，自习练习画画和简笔画，有时直接板书在黑板上画，多数情况是提前备课时，用纸画好图案，然后讲课时，张贴在黑板上，这样学生能直观掌握词汇和句意，不感觉出枯燥。现在不同了，教学用电脑，进行电化教学，提前备课做好“课件”。教室有大屏幕，用电脑操作。单词、词组、句子和图案都能显示出来，非常先进。粉笔利用率不高了，教室里再也没有粉笔沫了，空气也干净了。另外粉笔也是那种不掸沫的粉笔了，真好！这也是改革开放的硕果。

好！接着说，自己在学校任劳任怨，成绩出色，也靠拢党组织，后来在学校党支部的教育和帮助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经过成人高考后，上了天津党校学习了三年，获得市委党校经济管理系（大专毕业文凭）（校长是张立昌）。

岁月如歌，弹指过，到退休年龄。我想退休不退志，要有一颗进取之心对待生活和未来。离开了学校，我愿意为社

区服务。我很幸运！被社区推选为党委委员，三合里第一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义务制主任。

下面讲第二方面：

（二）生活、幸福指数提升了。（改革开放前后生活不同了）

从衣食住行来说，

1)衣：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买衣服要凭布票。穿衣色彩、样式单调，千篇一律都是蓝色、灰色和草绿色。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随着物质丰富和思想解放，人们衣着款式多种多样，有的人穿上了世界名牌服装和时装。显示了人的个性和风度。

2)食：过去只有过年过节，拿副食本才能每人几两瓜子、花生。买菜拿副食本，买肉要肉票。现在不同，超市什么食品都有。

3)住：原来住平房，改革开放后，平房改造，住上了楼房，甚至是商品房。

4)行：中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现在不同了。老年人65岁以上免费乘公交。交通工具有地铁，还有高铁（从天津到北京仅用半个小时），想旅游的人们，包括出国旅游，老百姓可以乘飞机不是稀罕事了。中国人开私家车出行。普地都是，残疾人乘车免费。

5)改革开放后，购买方式与过去不同了。运用互联网功能。过去想买自新车、手表，得拿“条”，单位半年才分配个“条”，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现在有公共、共享单车摆在便道上。这些年，人们都使用手机网上购物，国家运用互联网方便人们，想买任何东西，包括电器、吃的、用的、家具等等，一

切网上都有，还送到你家门口。你如果不让送，就到驿站去取。非常方便！吃饭如果不想做饭，可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去买，也可以让他送到家里。或者拿手机一点餐，网上付钱就可以。很快送到你家。

总之，我觉得现在太幸福了！我们生活在新时代要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要紧紧团结在习主席党中央周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永远跟党走！

最后，让我们一起，在河西区委，马场街党工委和三合里党委领导下，以饱满的生活热情，共同构建我们“时代华庭”和谐美满的家园！

我记忆中的天津卫

口述者：张玉珍 整理者：王莹

相关背景：口述者张玉珍，女，76岁，天津市政三公司退休，现住天津市河西区吴家窑大街佛山里46-202，中国党员，社区志愿者。

我今年76岁了，快80岁了，90年代的天津古文化街“津门故里”，虽然现在变了样子，但当时的模样和发风土人情，让我记忆犹新。作为津门十景之一，古文化街有百家店堂，是天津老字号民间手工艺品店集中地，有地道美食：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煎饼果子、天津麻花等。旅游景点更是数不胜数。

住在德才里这里也几十年了，90年代的佟楼跟现在区别不大，但关于“佟楼”的来历据说和清朝的贵族佟佳氏有关，听老一辈人说是佟国维的后人还曾住在这里。

现在交通便利，地铁可以去往很多地方，曾为美国和英国租界的小白楼，名字的由来我记得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外墙涂白色的二楼酒吧，当时这一地区没有正式地名，当地居民便以这一独特白色小楼为标志，后来就称这一地区为“小白楼”。

现在的大胡同与原来的大胡同完全变了模样，没有了以前的拥挤，没有之前街头的吵架声。原来这里，商户们争相

甩卖，场面火爆。近几年，经济迅猛发展，城市也发生巨变，大胡同已经很难承载如此之多的商铺和顾客，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这些年虽然大型购物中心相继出现，但是大胡同的人气依然不减。同时呈现出来的则是交通拥堵不堪，配套设施的老化的现象不得不做出改变。

以前走进新的万隆大胡同商业中心，随处可见很多施工车辆来回忙碌着，商场中部分店铺正在忙碌的封闭装修中，随处可见外面来回穿行忙碌的施工工人。商场外，2个大型长途公交车站。除了购物外，在新万隆大胡同商业中心内，还有小吃一条街，在小吃街可以吃到纯正的天津食物，耳朵眼炸糕还有老豆腐，油条，如果时间来不及买一套煎饼也是很方便的，老天津卫人都知道的还有一种叫油茶面的吃食，非常推荐，中午在附近的饭店吃就可以了，有很多北方的特色菜，一般下午六七点就关门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后来许多的商家搬进这里，包括扩我在内的无数的天津人都目睹了这些年这里的变化。无数的建筑区，鞋包、衣服、文具等等应有尽有，一逛就是一天，吃喝玩乐样样齐全，不过还是大多数人都是逛的衣服鞋子，可以看到很多的批发商在各个地方门脸批发着东西，受这么多人的欢迎也是因为东西便宜。

每一个有着天津情怀的人都会去一次那里，一个贯穿天津几代人的记忆，想着它嘈杂的，想着它的讨价还价，想着每个人都说着纯正的天津话。

最美好最幸福河西区

口述者：王祥臣 整理者：王莹

相关背景：口述者王祥臣，男，76岁，天津市河北区再生资源回收公司退休，现住天津市河西区吴家窑大街佛山里13-401，中国党员，社区志愿者。

2023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密切配合，经过三年殊死搏斗，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赢得了抗美援朝这场“立国之战”，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为今天振兴发展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历史动力。

新时代的万象更新，日新月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今年我已七十六岁了，在河西区居住了七十年了，感觉到近十几年我的家乡变化太大了。七十年前，我居住的佛山里是姓梁家族、官家族、两家族墓地，随着天津市民心工程越来越多，小区的改造翻新也是一轮接一轮。今年又迎来了小区改造，德才里口袋公园的提升改造，小区花园成了一大美景。如今的小区，可以推窗见绿，出门进公园。

犹记得，马场街2021年5月并投入使用的马场街卫星雅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离我所住小区最近的社区级的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为社区老年人提供配餐服务，价格有政府补贴，饭菜丰富美味可口，食谱不重复，为老年减油减盐减糖。社区以及社区周边年年的变化，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最喜欢的就是咱河西区友谊路天津大礼堂对面的银河广场，我觉得是河西区最美最好最幸福的地标。七十年前那里可是一片野草丛生的大洼地，如今却拥有了五大展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天津科技馆、天津图书馆、天津美术馆、天津自然博物馆。银河广场就是我们河西人的一个大花园，让我们可以共享鸟语花香，饭后散步的好场所，孩童玩耍的嬉戏地……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环境，要感谢时代的进步，更要感谢党和政府正确领导，好的方针政策，才让我们过上了这做梦都不敢想的好生活。

我每一年都会来这里一两次参观博物馆，这里有一家人带着孩子、有学生、有外地游客……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凝结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了民族自尊自信，更好的前进。自然博物馆，让我们知道地球上的生命是个奇迹，让我们认识到地球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家园，我们要热爱保护地球。

我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在天津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正确领导下，回顾历史，亲自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发生在身边的环境变化让人们感动至深。事实最有说服力，人民最有发言权。我们坚信，在过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光荣！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白洋淀有个聪明勇敢的男孩叫张嘎。在鬼子的一次突袭中，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鬼子打死和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被抓，所以悲痛欲绝，决心报仇，毅然出发去寻找打鬼子的游击队伍。

在路上，他误把游击队排长罗金保当作汉奸，想缴他的枪而闹出笑话。

之后，人小鬼大的张嘎收缴了胖翻译的“真家伙”。为了不让队长把枪收回去，他竟动了“嘎”气，将枪藏到了老鸹窝里。经过区队长的教育，张嘎认识到自我的错误。

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了伤在老乡家里休养。在游击队攻打敌人岗楼时，他偷偷从老乡家里跑回参战，不幸在进城侦察时被捕。在敌人面前，张嘎刚强不屈，并在战斗中逃了出来，并配合游击队拔掉岗楼，救出钟亮。

战斗胜利了，区队长代表部队表扬了张嘎，奖励给他一支真正的小手枪。张嘎最终成了一名出色的小侦察员。

红色经典故事展现了峥嵘岁月里闪烁着的崇高而美好的爱国主义精神，让孩子深知战争和苦难，感悟民族精神内涵，珍惜和感恩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帮助孩子向张嘎学习，做勇敢、有担当的人，激发他们继承革命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段永恒的记忆

一个红色故事的传诵
将伴随着孩子成长的脚步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红色文化

抗美援朝卫生员——卫素润

口述者：卫素润，女，87岁，现住河西区梅江街景观花园
26号楼3门502，抗美援朝退伍女兵。

整理者：郭连跃

1936年，卫素润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1951年，年仅15岁的她，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献身国防的炙热之心，光荣地走进军营，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入伍后，根据组织安排，她在八九七八部队后勤部担任助理军医，从事军队医疗事业，期间正值朝鲜战争期间，当国家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时，卫素润积极响应号召，为了捍卫祖国的领土和保卫人民的生命，义无反顾跟随大部队走向朝鲜，奔赴前线！

卫素润负责抢救伤员的医疗工作，跟随着新的医疗队一路坎坷，穿过重重障碍，经过3天3夜终于来到了朝鲜战场。救援队不辞辛苦、没有停歇，在当天下午就立即按照各自任务，对前线运回的伤员开展了救治，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很多运回的伤员除了受到炮火袭击，还有因暖季期间就来到前线、没有携行冬季被装而冻伤的战友，卫素润看到一个个受伤的战友，有的弹片刺进身体、有的四肢被炸断、有的血肉模糊，她哭了，因为亲眼看到这些亲爱的志愿军战友，抛头颅洒热血，展现着中华民族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

战斗作风！“我一定要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救治每一名战友，直至最后一刻！”卫素润暗自下定决心对自己说。伤员不断，工作不止，处理伤口、止血、取弹片、缝合、包扎等等，一刻也不肯停歇，卫素润知道自己的使命，只要竭尽全力，就能挽回更多战友的生命。

有一次，卫素润所在的医疗队在一间临时搭建的治疗室为伤员进行取弹片手术，当手术进行一半，忽然听到敌军飞机在上空飞行的声音！怎么办？“手术正在进行，绝不能暂停！牢记我们的肩膀上的职责！”军医对医疗队全体战友说道。所幸敌人没有发现，伴随着敌机盘旋的声音，手术顺利完成了，军医组织全队和伤员迅速撤离，撤离不久就看见临时医疗室附近遭到敌机轰炸，就这样，一次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名名勇敢的白衣天使，用顽强的意志和必胜的决心，救治着亲爱的战友们，她们同样用实际行动为战争赢得了胜利，是民族的英雄，是最可爱的人，更是我们的榜样！

毛主席不吃肉的故事

口述者：李晶 整理者：张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 48 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

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

1960 年 5 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

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一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 7 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

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

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

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

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呷……”

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天湾园社区“口述史”

天湾园社区天湾园小区 5 号楼的侯肇菊老人今年已经 102 岁了，经历过一个世纪的侯奶奶是一位退休老干部，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

侯奶奶出生在河北省，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正赶上日本鬼子在中华大地肆虐，民不聊生。她从小就痛恨小鬼子，发誓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在她 14 岁的时候，八路军在河北省白洋淀附近打鬼子，听到这个消息，侯奶奶坚定地找到组织义不容辞地加入其中。在这个大熔炉里，侯奶奶跟随大哥哥哥姐姐们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她第一个剪了辫子，组织附近的妇女同志们为抗日出力。大家白天学习，晚上纳鞋底、做衣服……侯奶奶还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宣传八路军战士的英勇事迹，为前、后方打气助威。

全国解放后，侯奶奶来到天津工作，她感谢共产党感谢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在世界有了话语权，感谢共产党教她学习识字能为祖国发展贡献自身力量，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繁荣富强。

《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故事

口述者：单春玉 整理者：楫莉

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激励和教育了几代人。他那奋不顾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人们所景仰，他的英雄事迹为人们所传颂。

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0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当过儿童团团长和民兵，被评为民兵模范。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战勇敢，立三等功1次。

1952年10月，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所在营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激战4昼夜后，于19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部队接连攻占3个阵地后，受阻于零号阵地，连续组织3次爆破均未奏效。关键时刻，时任某部6连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他带领2名战士勇敢机智地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一名战友不幸牺牲，另一名战友身负重伤，他的左臂也被打穿。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在多处负伤，弹药用尽的情况下，为了战斗的胜利，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靠近地堡射孔时，奋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

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授“模范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顾玉宁口述史

我叫顾玉宁，出生于1982年，是一名转业军人，曾在北京军区某部队服役。2012年我跟战友代表某部参加某军区大比武，这场比武内容丰富，有三公里越野、标图、沙盘制作、三分钟做一百道题等项目，要求达到100分。

当年我30岁，但是当时在参赛人员里算是年龄偏大的，参赛的很多战友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我的左眼受过伤，瞄准有点困难，于是射击时我用自制的道具挡住左眼进行射击，我想到我们有个领导说过，射击的秘诀就是“有意瞄准无意击发”，一开始老脱靶，但在经过苦练之后，我打了四十多环。还有一个就是制作沙盘，我们四五个战友协作，分工明确，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沙盘的制作，要记住地形，沙盘制作对沙子的干湿度要求很严格，太干或者太湿都不行，不然堆不出相应的地形。三分钟做一百道题，这个对记忆力的考验比较大，但是最后没有达到一百分的人只有几个。

这个比武最后我们得到了军区的排名，虽然不是前几名，但是也算相当不错的成绩。

做疫情中坚定的“逆行者”

——太湖路街雀榕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吕家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雀榕园社区书记吕家伟同志全力以赴投入到抗击疫情第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确保辖区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春佳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享受天伦之乐。然而，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任务，他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投入参与社区防控疫情的战斗之中。

在疫情期间，吕家伟发扬一名退役军人的风格，认真职守点位、记录来往居民信息、发放张贴宣传品、带头深入网格、入户摸排等，扎实基础工作的同时，带领全体社区工作人员认真部署、细致工作，做疫情中坚定的“逆行者”。

雀榕园社区目前代管河西区全运村8个住宅小区共88栋楼132个楼门。疫情期间社区采取封闭式管理，全运村整体仍有16个点位需要开放居民出行。社区要协调解决5000多户居民在疫情防控期间反馈的各种问题，排查来津返津人员，他带领的社区工作者团队同时为居家观察期的居民提供服务保障等工作。

在抗击疫情这场战役中，他帮助居民的事迹也数不胜数：发放便民口罩时，有孕妇领取口罩时已过期，他主动帮助居

民解决领取口罩问题，安抚孕妇情绪；社区糖尿病患者每天需要注射胰岛素，他帮助居民协调日常的必需品酒精；居民的私家车在地库打不着火，疫情期间外来救援人员无法及时入园，他就主动伸出援手修好车辆，解了群众的燃眉之急……吕家伟同志带领的雀榕园社区党支部，在抗击疫情中涌现出许多社区党员积极帮助居民群众的事例，同时出现了捐款热潮，许多党员自发超出100元上限标准捐款。

他做为社区书记，不仅要统筹安排，更要身体力行，自接到上级防疫任务起，他就废寝忘食地奋斗在疫情防控一线，抗“疫”以来，24小时手机不敢离身，有时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时常值守夜班后顾不上休息，又投入到第二天紧张的工作中。经常忙到忘记吃饭，随便一个面包一碗泡面便打发一餐。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负重前行”。社区书记吕家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雀榕园社区筹备组全体社区工作者，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始终把防控疫情工作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主战场，为辖区居民群众织牢控疫情保安全的这张“网”！

不忘亡国恨 永保太平年

河西区桃园街 于增桂

我是于增桂，今年七十九岁，现居元兴新里社区。解放前，我的父亲蹬三轮，母亲当“老妈子”，哥哥收破烂；解放后我们翻身做了主人，父亲、哥哥和我都有了工作，我和哥哥也都入了党。七十年代的房改，使我家从十六平方米、屋高不足两米的窝铺搬入了宽敞的楼房，过上了幸福生活。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九十年前，中国人民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奋起反抗，经过了八年的艰苦抗争，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团结努力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段历史我们要永远铭记，更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保卫来之不易的太平。

在日本侵占中国的时候，我只有几岁，经常听我母亲讲日寇在中国的罪行。当时我母亲在河北省沧县农村，正是花季少女，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的恐怖之中，只要一听说鬼子又来扫荡了，就赶紧把手伸进灶里，摸一把锅底的黑灰抹到脸上，有时还抓一把灰再抹一层，再带上家里能吃的东西和村民一起跑到村外荒凉的野地里藏起来，吃几口地瓜，喝几口低洼地方的积水。几时听说鬼子走了，才能回家。每次总有逃跑不及时的老乡被鬼子抓走，男的去做劳工，女的就被鬼子糟蹋，尤其是女人被糟蹋后，简直没脸再活在人间，整

天寻死觅活，留下终生痛苦。当年这些亡国的灾难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更不能忘记那些为打击侵略者奉献生命和鲜血的革命先辈……

我曾担任一届社区居委会主任兼书记，今天我和爱人都退休了，并培养了年轻的接班人。我爱人今年八十二，是南海舰队退役水兵，因病不能走路，在家里学习书画，创作了一幅反对侵略的国画（该画已交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画面里是一只高亢的公鸡，一脚踏在钓鱼岛上，脚下踩着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螳螂，题款“宣示主权——鸡鸣天下”。这幅画警示侵略者的嚣张不过是螳臂挡车，也昭示天下“中国的领土不容侵犯”。后来，为纪念建党一百周年他又创作了三幅国画，都参展获奖。（包括：红船小赋、一唱雄鸡天下白、虎踞龙盘今胜昔）

今天我们的航母在大洋中游弋，歼 20 战机在蓝天上巡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强起来了！历史的教训永远铭记在心，警醒世人特别是警醒我们的后人要永远反对战争、珍惜和平、永保太平盛世。

一个四零后对解放初期的记忆

桃园街元兴新里社区 孟祥杰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就老了，人的一生过的真快啊。我生于1943年3月，年龄已经80有余了，现如今的说法叫“四零后”，也可以说是“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忙碌了一辈子都习惯了，然而退休在家呆着总是“俱往矣、忆往昔”的，回忆从前的人和过去的事。我在想人老了是不是都这样啊！

我祖籍山东黄县（现更名山东省龙口市），出生在东北哈尔滨，1949年解放那年，我6岁，从北京迁居来到了天津，在天津这一住就是70多年。我小时候不懂事也从来不多想，解放前我家为什么走了这么多地方，生活又如此“漂泊”？后来是跟母亲闲聊中才听她说起解放前我们的窘迫家境和艰难生活。当然，小孩子只要跟着大人，无论贫富或者身居何处都是幸福。我6岁时也记事了，对解放前的事多少也能记住一些，懂得一点家里生活的艰难和旧社会的世道乱像。

我来到天津就上学了，先是在华荫东里的一个家庭补习班学了些日子。后来，我报考了市立实验小学，因为当时只有实验小学一所公立学校，并且不收学费，所以大家都挤破了头报考，排了很长的队，但是哪收得了那么多孩子，其实都在碰运气。我果然是没考上，白白浪费了拍照片（快像）的钱，最后只能去上离家最近的私立志达小学了。

那时的小学生年龄差距特别大，记得当时班里还有比我小一两岁的同学，年龄大的比我大4、5岁，其原因就是家里穷上不起，因此那时辍学也是很平常的事。因为私立学校学费很贵，即便有一些能减免也够呛，可是有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只能紧衣缩食了，我家就属于这样。

解放初期，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败退台湾时事先布下了不少反动残余特务份子，他们经常在暗地里造谣生事，骚扰生产生活，老百姓对他们深恶痛绝、恨之入骨。因此，新政府及时开展了镇压和肃反运动，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并且动员群众提高觉悟警惕，举报坏人坏事。人民群众都被调动起来了，使得坏人难以为非作歹，还逮捕和镇压了大量的敌特份子和黑恶势力。比如，旧社会天津有名的黑帮袁文会就受到了镇压，社会治安秩序大为改善，真是大快人心。当时还涌现了不少英雄事迹，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七个小英雄逮特务”的故事，这在当时广为传颂、人人皆知。

国民党反动派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不时叫嚷反攻大陆，不断骚扰近海，劫持大陆过往船只，还用飞机投放特务、撒传单造谣惑众。我们津华里有个叫施豪杰的，他爸爸在货船上工作，就在那时被蒋匪连船带人给劫持走了。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揭开了震撼全球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序幕，这也是我们新中国建立之初的首个国际援助之战。大家都知道抗美援朝

朝是我国领导人下了很大决心才决定参战的，那时刚解放一年，一切都才开始还没就绪。要知道在这之前我国已经历了一百多年不断的外患和内乱，国计民生早已是一贫如洗，人民盼望的好日子才刚见亮战争就又来了。这场战争对我们国家来说是被迫无奈、不打不行的，它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和新政权的存亡，也就是关系到我们新中国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再困难也必须打。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大无畏精神，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在极其残酷的情势下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说，我们今天享有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至今还深刻的记得当时大家在西安道上欢送志愿军的场景，那些新兵都是有志青年和一些中学生，他们英勇无畏、义无反顾的放下书包投身保家卫国的战场，他们行为高尚、精神可嘉。原居住在我们元兴新里六号楼的冯秉芝大爷，是我们第六支部的老党员、老英雄，现已年近90仍健在。他就是在天津一中报名参军的，曾经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荣立过两次战功。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杨连弟、毛岸英等英烈的英雄事迹尽人皆知，广为颂扬。杨连弟烈士是我们天津北仓人，他多次在敌机轰炸时冒死抢修鸭绿江大桥，为保证向前线运送物资做出了很大贡献，多次荣立战功，最后不幸牺牲，被誉为“登高英雄杨连弟”。

毛岸英是毛主席的长子，毛主席为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自己做出了巨大牺牲。

人民英雄人们永远讴歌！

先烈事迹我们永世不忘！

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包括各行各业都积极支援前线，大家都紧衣缩食捐钱捐物捐飞机。面对炮火连天的危险，我市相声艺术家常宝（艺名小蘑菇）率领演出团队赴前线慰问演出，光荣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和他同时牺牲的还有程树棠烈士。当时，我市领导和百姓为两位烈士举行了非常隆重的送葬、安葬仪式，并安葬在河西区谦德庄西边（今友谊北路）的大片园地上。后来迁坟到烈士陵园，全市人民每年清明节都前去祭扫。

英雄事迹百世流传！

英雄英灵万古留芳！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保家卫国。全国人民为支援前线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促进生产。可是，这时候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事情。当时前线军需紧迫，不少黑心商人资本家想借机发大财，就在生产军需物资上做文章，偷工减料、参假使坏赚黑心钱。好在政府及时发现了他们的卑鄙行为和狼子野心，就在全中国全面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使贪污分子、浪费行为、官僚主义作风和黑心商人受到了应有惩处和严厉打击，为支援前线和发展生产得到了保障。大贪污犯如大官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当时被枪毙的，他俩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住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可是解放后却没经受住金钱糖衣炮弹的诱惑。

我的岳父母

口述者：张兆新，男，青泊洼劳教所退休干部

整理者：李增辉

我的岳父常柏增，1912 年生于河北省遵化市党峪镇上马家峪村。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英雄包森领导下的抗日队伍。我岳父家兄弟七人，自幼习武，都有一身好功夫，都是游击队战士。

一九四三年六月的一天，马家峪村突然来了一个小分队的日本鬼子，把村里的人都赶上打谷场上。日本翻译高喊着常柏增的家人站出来，我岳母家的妯娌几个谁也没有动。日本鬼子大喊着赶快交出常柏增，不然就把全村烧了，当时岳母怕连累全村，就站出去了，鬼子用枪托捣了她几下，一个二鬼子扑来，“快说，你爷们藏哪了，说出来就没你的事了”，岳母说：我们当家的，好多天没回过家了，我不知道他在哪。日本鬼子就用枪托捣她肚子。让她快说，不然就将肚子里的孩子给你打掉。岳母说，你们打死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那时我岳母正怀着七个月的孩子，鬼子又捣她肚子，直到昏死过去才住手。妯娌姐几个救下了她，把她抬回家。怀了七个多月的男孩就这么掉了。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怀上孩子。

那鬼子到村里搜查我岳父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年，日本鬼子对冀东抗日根据地采用烧光、杀光、抢光野蛮的“三光”

手段进行了大扫荡，拉网式地搜索游击队员。那年我岳父从小分队驻地下马家峪往家走，刚走到涅口（“涅口”是上下马家峪唯一的通道）就碰上了日本鬼子和党峪的治安军，其中一个汉奸认识他，于是鬼子围住我岳父，将他抓住带到了党峪一个地主的大院。日本鬼子对他严刑拷打，皮鞭抽，老虎凳灌辣椒水……各种刑具都给我用上了，逼问游击队的驻地。鬼子见问不出啥了，就将他关进了一间磨坊里。天黑了，又饿又困，他蜷缩着依靠在磨盘下迷糊着了。不知道啥时候，听见了有扑棱声，就醒了，一看是一只大公鸡，问看守，弄公鸡干啥？他说明天送你上路用，这下明白了，天亮后，鬼子准备将他杀害。不能这样死！得想法逃出去！于是就跟看守说，咱们都是乡亲，明天我就上路了，我已这样了，跑也跑不了，你给我松松绑，咱们抽支烟，看守还真给真给我岳父松绑了，抽完烟，他假装睡着了，后半夜，看守也打起了盹，他试着叫了看守几声，没有反应，于是赶紧弄断脚上的绳子，慢慢挪到了西墙小窗户旁，踩着磨盘纵身一跃，逃出了磨坊。不远处有两个鬼子听见了动静，过来查看，他趁其不备将鬼子打倒，光着脚钻进了磨坊外的高粱地，一口气跑到了亲戚家，换了衣服，找了双鞋，跑到唐山躲起来。天亮后鬼子出动了大股部队包围了村子，搜查我岳父的踪迹，也就造成了开头我岳母被害的一幕。我的岳父岳母都对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的牺牲与贡献。

志愿军老战士的硝烟记忆

口述者：蔡介斌，男，志愿军老战士

整理者：贵海涛（根据相关口述资料整理）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献县，幼年时，家乡曾经历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所以，自小就怀揣从军报国的理想。1951年，正在上中学的我得知征兵的消息，便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参军，并随部队从献县来到了石家庄。1952年，我随军赴朝。所在的部队接到的任务是负责保护清川江大桥。“这座桥是重要的运输线，敌人千方百计要炸毁它，斩断我们的粮草运输、影响伤员撤退，我们的任务就是严防死守。”每到夜里，无数探照灯的光柱直冲云霄，一旦发现敌机，就毫不犹豫地开炮，令敌人闻风丧胆。有一次，志愿军的大炮击中了一架敌机，敌军飞行员跳伞逃生，降落后被朝鲜百姓发现，老百姓对侵略者恨之入骨，就嚷嚷着要“打死他”，志愿军的联络员及时出面，老百姓将这名飞行员交给志愿军处理。当时那名飞行员舒了口气，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部队不虐待俘虏。

敌军的飞机不仅往地面上投掷炸弹，炸毁建筑物，造成人员伤亡，还企图通过投掷细菌弹的方式，来摧毁志愿军的战斗力。我当时就不幸感染，得了痢疾。那段时间白天还凑合，一到傍晚6点多，简直“提不起裤来”，这种状态持续了四五个月，直到回国后，我在杭州住院疗养了半年才算痊愈。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很多战士都像我一样因为敌方投放的细菌弹而感染上了疾病，但战士们没有丝毫退却，还是顽强地坚守阵地。

经历了烽火连天的岁月，我对如今的生活特别满足。大女儿每天来给我做饭、收拾房间，其他孩子和孙辈、重孙辈也常常来看望我。每天，都到社区花园散步，跟老伙伴们聊天；独处的时候，我就静下心来，写写回忆录，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铸就辉煌让生活更美好

口述者：贾顺生，男，1957 年出生，天津建工集团退休职工

整理者：李栋

我是天津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天津河西人，57 年出生在河西区卫星里、75 年参加工作在天津建工集团从解放北路后来搬到河西区友谊路 2 号，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亲身经历和参与天津市建设见证了天津市市内六区的变化、我也是建设者之一，特别是河西区的变化，从我们的身边说起：海河的桥变多了（特别是河西段桥多更方便了两岸交通）、河水清了（无论是海河还是津河水质越来越好，原来的纪庄子污水处理厂搬迁了减少了周边对大气的污染，再也闻不到臭水的味道了）、路变宽了（原来的黑牛城道，雨天泥泞难行，如今已经变成了交通主干线快速路）、公园绿化树木多了（废弃的李港铁路已经成为绿道公园）、天变蓝了（河西区政府下决心清理了城乡结合部小污染企业，使雾霾天气越来越少了）、高楼林立（银河广场已经成为天津市政府的会客厅，网红打卡地。周边高楼林立，音乐厅、京剧院、图书馆、科技馆、展览馆、博物馆、综合商场、少儿活动中心、大礼堂，已经成为天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八大里改造如今以变为现代化大都市景象）、交通更便捷了（友谊路已经成为天津市政府迎宾大道、地铁已经把我们周边占满方便快捷交通四通八达）、社区管理更规范了

(每个小区都有标准的物业管理团队和小区自治的业主委员会)、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社区为居民们提供设施供人们锻炼)、新的养老生活更便捷了(每个社区都已经建立了养老活动中心)。

我平时有个小爱好,喜欢旅游喜欢摄影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用手机或照相机记录下天津的变化,也随时把自己看到的美景记录下来,并分享到朋友圈让大家都能看到家乡的变化,我的一些国外的朋友看到天津的风景便说哇!天津好美呀!我一定去天津找你,看风景,品美食。

还是说说发生在我家的事儿,我爱人2020年10月5日在家,不慎滑倒将耻骨摔成骨折后到医院急诊治疗,卧床3个多月,不能下地,后经休养身体恢复健康。看病治疗花费1500多元医疗费。开始认为在家摔的认倒霉吧。幸亏天津市河西区政府为每位60岁以上的老人,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开始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没想能给报销,我就带着所有看病的单据,通过申报保险公司审核,没想到很快就审批通过了,钱也马上打到卡里,自己基本没花几个钱。这件事我和我爱人特别感动,尤其是我爱人从内心感谢区政府,说政府对老百姓太温馨了。她说我一定要报恩,她不是党员,但是,当她听说什么地方扶贫、什么地方需要募捐,要我告诉她,说一定参加募捐,在去年和今年街道组织义务捐款活动时,她都积极参加,并捐款200元人民币。新冠疫情期间我第一个向社区党委提出请战:作为一名党员,在疫情面前不能袖手旁观,要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发

扬无私无畏的精神，在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随时听从党的召唤，随时出征奔赴前线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微博之力，不求回报，不论生死。我觉得这才是党员此时应该做的。在我的带动下很多党员也积极响应。

我们退休人员最担心的就是养老问题，河西区政府率先成立了以街区为中心，创新居家养老模式，为全市探索出养老方式，网格化管理，随时都能感受到街区工作人员的温馨服务，在我们周边，走路不超过10分钟就能到附近的老年活动中心享受惠民服务，花不到10多元钱就能吃上美味可口的饭菜，受到了广大居民的一致赞扬。我现在每年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体检一次，河西区天塔卫生院的医务工作者，还定期按季度上门为我高血压病一对一服务指导，耐心细致地告诉我如何控制血压高，和做好预防措施和锻炼方式讲解。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百姓的关怀。

建设美好天津，从河西做起，我是天津人，天津河西人，要从我做起。虽然退休了，我依然是一名党员，要时刻牢记入党誓词，思想不能退，要与时俱进，不给党和政府添麻烦。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党代会的精神落实到社区。退休了更要加强学习，提高素质，作为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牢记使命，找准定位，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儿。保持党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时刻听从社区党委的安排做好党员和党支部工作，要在行动上与上级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

魏荣龙同志事迹

在富裕广场二期 14-305 居住的魏荣龙老同志，出生于 1953 年，是一位充满荣誉和勇气的退役军人。1970 年他毅然决定入伍，投身于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

唐山大地震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76 年初，魏荣龙同志当时正在山海关进行集训，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却让他们陷入了困境。桥梁断裂、道路中断，信息传递也变得异常困难。面对这种危急情况，魏荣龙同志深感战友们的安危，他毫不犹豫地搭上了大部队的车，赶回部队。然而，途中发现滦河大桥已经断裂，车辆无法通行。为了尽快赶到目的地，一行人决定步行前进，300 里地耗时一天一夜。尽管路途艰辛，但他始终坚定地走在前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回到部队，救出战友。

当魏荣龙同志终于到达部队营房时，他看到了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营房全部倒塌，一片废墟。他的内心充满了伤痛，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而是要立即行动起来。他马上加入了救灾队伍，全力投入到救援工作中。

在救援过程中，魏荣龙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物资紧缺的困境。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智慧。魏荣龙带着排里幸存的十五名战友，动手制作了简易担架，优先救治重伤的村民。他们勇敢和无私精神感染了整个团队，大家齐心协力，最终救出了 52 个幸存村民。

和 17 个受伤者。魏荣龙的无私奉献和坚定信念感染了周围的人们。他成为了救灾队伍中的中流砥柱，带领着大家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他的勇敢和坚持不仅挽救了许多生命，也为灾区带来了希望和重建的力量。在救援工作结束后，魏荣龙和他的战友们得到了村书记等人的一致感谢。他们的英勇行为和无私奉献赢得了人们的敬佩和赞誉。魏荣龙同志个人被授予三等功，团队被授予二等功，这是对他们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

后来，魏荣龙回到了天津市，接到了新的任务——引滦入津。他带领着一个连队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个连队并不专业，但他们却要完成一项专业的事情——开山凿洞。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工作量巨大，每天只能吃着简单的白菜土豆。后来，市长到访考察后被战士们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动，临时决定每人每日增加 25 元餐费。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队伍，战士们听到后士气大增，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中。

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努力，魏荣龙和他的连队最终超前完成了任务。他们的辛勤付出和顽强拼搏得到了认可和赞赏。这次经历让魏荣龙深刻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魏荣龙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他的奉献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品质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和挑战，只要心怀信念，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取得成功。

七十年前的回忆

口述者：石晶 整理者：周南

口述者石晶，女，四中退休老教师，哥哥石德崑牺牲于抗美援朝战争中。

我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生的，住在和平区一条安静的小马路，奶奶叔叔大爷一大家人住在一个大院。天津解放时我才三岁，没什么印象，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常听父母大爷念叨我才仿佛亲历一般，至今仍历历在目。

二大爷说，一九四九年一月炮声终于停了，一夜寂静，第二天清晨去开大门，一下子惊呆了：马路上坐满了解放军，一个个冻得像泥胎一样，那可是寒天腊月啊！这一夜没听见敲门声，没听见喧闹声。这一群孩子穿着单薄的棉衣静静地坐在地上，互相偎依着。这时一个中年人走过来和我二大爷商量，能不能让孩子们进屋取取暖。二大爷立即答应了，让全家人腾出一楼的房间，随后小马路上的各家也却让解放军进驻了。

那个冬天因失业，日子过得很艰难。那年的春节，是解放军给我们送的饺子馅、和好的面，一大家人美美的过了年。年后我大哥、叔伯、四哥和二姐三名高中生随军南下，我家成为了光荣军属。

抗美援朝开始后，我大哥从南下部队转而北上，成为一

名志愿军。入朝前夕我母亲去东北看望大哥（细节没说过，我不得而知）回来后不止一次的提起——你大哥跟我说：您别担心我，我就是牺牲了，政府对咱家的照顾也比我强，我是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我大哥牺牲了！（当时我还小，太详细的情况不太清楚。）

正如大哥所说：几十年来我家一直受到政府的照顾。解放初期我父亲、哥哥、姐姐的工作是民政部门协助安排的。就是在文革动乱期间，我家住房被无知群众强占，也是民政部门协助追回，我父母在世时一直感激政府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照。现在父母去世已久，作为烈士的妹妹仍享受着政府的优待，每年街党委都来慰问，居委会也会送来市区两级政府的慰问品。

现在我大哥的烈士墓碑在四平市烈士陵园，每年清明，陵园工作人员替我们祭扫，并发来祭扫的照片。

大哥！安息吧，祖国人民时刻记着您！

我现在常常教育后代子孙：在祖国需要时，一定要继承烈士遗志，挺身而出，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抗战老兵孙德彩：干一行爱一行， 党叫干啥就干啥

讲述人：孙德彩，1929年3月出生，山东省文登人，家住河西区越秀路街道增强楼社区，1947年1月入伍，1949年入党，曾任党小组长、支部委员。1956年支援地方建设工作，由空军二十八师汽车队转业到天津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管理局。

我叫孙德彩，今年94岁，1929年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市南桥村的贫穷家庭。1947年入伍，1956年支援地方建设工作，由空军二十八师汽车队转业到天津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管理局工作，主要是负责全市的运输（包航运、海运、路运）市场的检验管理。

当时天津的运输市场比较混乱，有一些封建霸头掌管大权，解放后仍然和政府枪占地盘、市场，搞地下运输私自组织黑色工头运输队伍进行破坏捣乱。当时市内运输市场非常混乱，违法运输，个体户跑业务，倒卖发货票；投机倒把分子到处盘居强揽业务，随便开



运输发票等。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市政府召开会议，由市公安局，财政局，税务局，交通局组成联合办公室，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市场检查组，专项整顿运输市场，实行“三统政策”、既统一运输，统一发货票、统一价格（运输价格）。我分配到该小组负责检查和管理这项任务，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把天津市的运输市场整顿好了，并顺利地实行三统政策。

这项工作困难重重，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到全市人民的日常物资供应，吃穿等多方面，我始终保持军人、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和光荣传统，认真负责，按政策办事，敬畏职权，从来没有以权谋私，没有请吃受贿，更没有违反党纪、政纪，内心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圆满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不辱使命。

在历次运动（如大跃进、大炼钢铁、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整党等）都很积极投入到运动当中。听党的话，按领导指示办事，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广大群众，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广大职工一道完成各项任务。特别是下到区局，各车队负责整风划分阶级成分等工作，（分工人、独立劳动者、小业主、资本家，）在工作中按党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条件分别对待，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以审阅档案、调查材料、本人历次运动的表现、本人参加劳动、雇佣工人、生产工具占有、劳力及剥削情况来划分阶级成分，并与区局，车队党领导一道共同研究这项工作，经过几次审核、研究、对照条件最后定下方案上报市局审批。

肃反工作也是一项政策性强、复杂性高的工作，对于一

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职工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认真地调查研究，按照党提出的：要看实际表现，不追求历史的指示办事，对于没有向党向人民交代历史和罪恶问题职工，我们没有逼供而是耐心动员、说服，促使他们坦白忠实、实事求是地主动交待；对于个别人思想上有顾虑，怕加重处理或判刑，我就到他们家中去宣传党的政策，做说服动员工作，并帮家属一道进行动员。

1961年按照政府要求充实基层力量，后调任天津市汽车总公司总务科负责人后升科长，主管全公司行政管理。几年来自己始终干在头上，那有困难主动承担按党政领导批示办事。



我始终保持正人先正己，不摆架子，与同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真正的发挥了一个中层领导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曾几次受到局党委，公司党委、行政领导上的表扬，每年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基本上都有我。在担任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支部书记工作时按照党员八项标准，和日常工作实际表现发展党员，积极为党增添力量发展新党员经我个人介绍入党的同志有六名。由于本人工作积极取得了好的成绩，在公司行政管理和党内工作成绩突出，曾评先进个人优秀工作者，先进生产者，治安保卫先进工作者；学习文化中，被评为优秀学员；党内工作突出，曾两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总的来讲，在各方面工作都是干一行爱一行，党叫干啥就干啥。

老兵孙德彩：我的抗战史

讲述人：孙德彩，1929年3月出生，山东省文登人，家住河西区越秀路街道增强楼社区，1947年1月入伍，1949年入党，任党小组长、支部委员。1956年7月退役，服役近10年。在部队中曾任班长、排长、代连长、汽车教练、救护员等。曾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3次，三等功2次，四等功5次，共立功11次；获奖3次。

我叫孙德彩，今年94岁，1929年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市南桥村的贫穷家庭。十三岁时父母双亡，参加村里儿童团，并



参加民兵和农村剧团，在演戏的同时积极宣传抗日活动，在我的内心种下了参加抗日的种子。

村里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参军，我带头报名，村里十几个人一起到区里检查身体，但由于我面黄肌瘦，体重不达标，个子不达标，说还不合格，急的我团团转，但我太想参军了，就动了下小心思，我说：身高测量不对，因为从我脚面量的，申请重新体检下。为了让体重达标我又在腰间藏了一个砖头。检验员见我又哭又闹，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最后我才被收下。

回想因为父母双亡，在村里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如果我不参军，或许我活不到今天。提及往事，心理很是难过，虽然参军后多次面对牺牲的危险，但是我始终感恩，是共产党养活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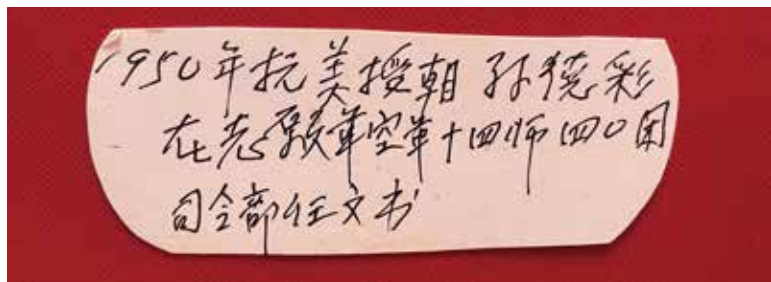
1947年2月入伍后先到文登城外受训，集训后当时编入山东省胶东军区新兵团，在连里受训几个月，改编入八路军北海团抢救连（住烟台），练兵学习政治、军事。1947年国民党全面进攻胶东时，队伍拉出城外改编为胶东军区五师十四团，开始正式打仗。

1947年随队伍参加青即战役之霞县马家河阻击战，那时非常紧张。敌人兵力超过我军几十倍，打一仗就后退。当时友邻部队有十三团、十五团，战斗很激烈，有时连续作战连饭都吃不上，要是动作慢了就被敌人包围了。敌人兵力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我们只是步行，步兵根本没有机械部队掩护。在此次战役中我英勇杀敌、不怕牺牲，顽强阻击数倍于我的敌军，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突出贡献。并在

猛烈的炮火下奋不顾身抢救伤员，因为表现出的高度阶级有爱精神，获得二等功。直到1948年时情况发生转变，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把所有的城镇让给敌人，分散兵力后，主动权在我军手里，开始大面积攻击城市，争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解放城市歼灭敌人。到青岛解放后，当时部队又升为华东野战军（三野）九十五师，二八四团，后又南下打到福州市，解放后部队驻福州市，担任警备部队。



1950年部队又回到北京市南苑机场，改编为空军十四师40团。经过飞行训练，在10月份赴朝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抗美援朝），在志愿军空军十四师40团司令部任文书。



1952 年回国后又到北京南苑飞机场工作（后又调汽队工作）。为了提高文化水平和军事技术，调到华北干校七中队学习文化政治。毕业后于 1953 年调华北空军（唐山机场）廿八师汽车队任排长，代连长汽车教练。



百岁老人话说人民公园

口述人：郭万鹏（1919年8月16日生人）

时间：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

原住址：天津市河西区小刘庄恩德里

按语：百岁老人郭万鹏，现家住人民公园附近的三义庄宝德里。从1936年17岁从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商职部毕业，与校友一起在人民公园前身荣园办暑期补习班、办小学补习班和日语班直到1939年。从1936年至今，几乎天天到荣园——人民公园休闲漫步，可谓82年的老游人了！

我叫郭万鹏，出生在民国八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1919年，生日是阴历八月十六。我家住在小刘庄恩德里^①，小学是在贺家口小学上的。17岁从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商职部肄业，我是初职第一班学生。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上到了



口述人：郭万鹏

① 恩德里在河西区东北部，刘庄斜拉桥南侧。原为刘庄老庄台子，1922年沈氏建房，形成恩德里，1984年更名恩遇里，现不存。源于河西区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津市地名志 03 河西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恩遇里。

二年级，在校期间于1933年参加了由十四五位学友组成的自勉互助小团体——自助社^①，曾为母校办过校工补习班。我肄业后找不到工作，与自助社社友周雨（周宝璞）、王嘉铭、刘继瑞等在荣园

办了一个津南暑期补习班，后来又办了小学班、日语班等。荣园是李善人家的私人园林，我们为



1936—1939年郭万鹏等创办津南补习学校旧址

什么能在荣园办学，是因为刘继瑞家在天津也是个大户，与李家是亲家，刘家找了李家一个老辈叫老姨太的人跟园子管事的说了，答应用现在人民公园原丁香花园北面的那个二层楼，当时楼上楼下共两间房子，作为我们的教室，一楼后边有一间房子可以住人。当时教室里没有桌椅，王嘉铭可是个神通广大人物，他为学校弄来了几十套桌椅。周雨是杨柳青人，在市里没有住处，就住在一楼后边这间房子。我们在门口挂了一个牌子，叫“津南补习学校”。我教数学，周雨教国文，刘继瑞是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毕业的日本留学生，教日文。王嘉铭没有任课，我觉得他有点“不务正业”。我们这个补习班，平时两个班，每个班二三十人，只是给失学的孩子补课，使

① 周宝璞：《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的自助社 创办过校工补习班》，1936年4月20日《益世报》。

用当时的一般教材，没有发过毕业证、结业证，一个小孩每月收6毛钱，够我们吃喝就行了，也没有到教育局注册，先后教过的孩子有百余名。到1939年天津闹大水，就停办了。

与我一起办学的校友周雨，又名周宝璞，比我大一岁，出生在杨柳青周家大院，周家是杨柳青的一个大户，他们那支的堂号叫永兴立，其父周恒赞，字警研，曾随翰林杜彤“赶大营”到新疆任督学，回津后创办安氏私立小学校，任校长。周雨6岁随父入该校读书，不久其父调往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总务科主任，他转入市内秀山小学就学。1931年11月因天津便衣队闹事，转回家乡杨柳青公立六十小学（天齐庙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商职部（也称附中）^①，该校名师周康民、周乾济是他的伯伯。周雨喜好写作，在校期间在校方资助下办过《新开月刊》10期。1935年《益世报》发表其作品——《杨柳青的“年画”市场》时，年仅17岁。1936年毕业，与我一起在荣园办学，教书，住在学校。1939年天津闹大水后，他离开天津，作为天津流亡学生辗转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学政经系读书。1941年起从事新闻工作，先在重庆《益世报》编辑社会服务版，兼任记者、采访主任。1945年转入上海《大公报》。1946年国共和谈时，由重庆调往南京，负责关于国共和谈的新闻报道。1950年，进入北京新闻学校研究班学习。1951年毕业后，仍返上海《大公报》任政治组组长。1953年随报社由沪迁津，在《大公报》驻京

^① 周雨《忆20年代的杨柳青》，1991年《津西文史资料选编》第五辑第108—109页。

办事处任记者。《大公报》由津返京后，任群众工作部副主任。1958年调文化部《新文化报》。1961年该报停刊，调吉林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1984年退休后，被聘为经济日报新闻研究室负责人及《中国人物年鉴》编审。周雨先生古稀之年依旧笔耕不辍。1991年出版的《津西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册）登载了其回忆儿时故乡的文章《忆20年代的杨柳青》。周雨一生编有《大公报人忆归》（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当代经济家传略》五卷集（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企业家列传》五卷集（经济日报出版社）；著有《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王芸生》评传（人民日报出版社）。这位从荣园走出的周雨先生可以称为新闻界元老，著作等身。

与我一起办学的校友王嘉铭，我当时认为他“不务正业”，后来才知道1937年7月底天津沦陷后，他利用在荣园办学为



法商学院校友会 129 纪念会五十周年座谈会合影（后排左 4 为王嘉铭）1985.12

掩护，从事抗日活动。他接受戴笠领导，当时跟天津青年学生的抗日组织——天津抗日杀奸团秘密接头，有时候在荣园见面。我不参与政治活动。王嘉铭给津南补习班送课桌椅，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秘密活动的联络点。荣园是私家花园，外人不能进入，王嘉铭利用补习班的名义，从事秘密抗日活动。

抗战期间，1938年天津部分教育界人士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抗日团体“天津教育促进会”。设理事会、监事会。由教育部陈立夫部长派任天津市战区教育督导员张东祥（号卓然，化名张维民）单独联系，分别协商，推定袁贤能、刘乃仁、黄道、马晋恒、苏亭午等为理事，张维民为理事长，王润秋为副理事长。姚金绅、杨绍思、余宗毅、崔诵芬、汪含英为监事；张士骏为监事长，陈华普为副监事长。于是年底成立，报教育部备案。当时各中等以上学校的校长多数参加了天津教育促进会。1939年春，该会组织一部分青年成立“天津青年读书会”。交通员王嘉铭任干事长，张惠年、张福吉、周宝璞、郑元琳等为干事。读书会的主要活动是联系青年学生，介绍有关抗战救亡的书籍，宣传抗战建国纲领，抵制奴化教育，介绍青年学生到后方升学。荣园是读书会的一个活动地点。读书会到1941年年底，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环境险恶，停止活动。三年中发展的会员约有40余人，介绍到后方升学的有20余人。开展读书会活动的学校有耀华中学、工商学院、市立师范、省立一中（市立一中）、汇文中学（市立二中），新学中学（市立三中）、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等。

1939年天津闹大水后，我到孙冰如先生任厂长的寿丰面

粉厂任工程师（专业为小麦制粉、锅炉、自动化）。20 世纪 50 年代初获天津市级劳动模范称号，获奖证书盖有黄敬市长的大印。我干到 1979 年退休，又返聘 10 年，一直到 1989 年正式退休。

自 1936 年，我 17 岁，到今年我 99 岁，我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出差在外，不管是下雨下雪，过年过节，即使大年初一，也一定去荣园——人民公园遛一遛。我早晨起来，爱在人民公园广东路那边门口附近听歌，下午在人民公园北门附近的月季园听戏。

我的孙子是 80 后，他小的时候，我天天带着他到公园里玩，一晃整整 82 年过去了。



最近，我腿脚不行了，不能自由自在地去人民公园啦，但我心里总在惦着人民公园，还想看看 82 年前我办学的那座楼。

慰问采访人员与百岁老人郭万鹏先生（左 3）合影

（张绍祖整理）^①

① 刘国有先生、可珉女士提供部分资料、照片。

人民公园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口述人：柴玉珂（1933 年 2 月生人）

时间：2018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一）

原住址：天津市河西区佟楼信济里 10 号

我是 1933 年生人，早年间家住佟楼信济里 10 号，我哥哥住在人民公园（当时叫李家花园）附近的的汕头路，我去哥哥家，就近便也常到园里去玩，那时的李家花园没有围墙，随便进，园内比较荒芜。大约在 40 年代末，我在中正中学上初中，学校就在李家花园正门的斜对过，由此一来，我去李家花园的机会就更多了。



口述人：柴玉珂

中正中学没有运动场，附近的李家花园怎么也比学校空旷宽敞，园内的小山也显得很荒凉，我和同学们几乎天天到园里去，钻枣树林，爬山，很是好玩。园里有不少酸枣树，秋天来了，树上还挂着小酸枣。园内东南方向的藏经阁当时是开放的，记得有人在这里办过补习班，学习文化，不收钱，我还在这儿学习了一阵子，时间不是很长。如今园内有一座佛爷殿（显密圆通殿），早年间就存在，古典

建筑，那时叫“吟诗亭”，是李善人家与文人雅士吟诗的地方，当时已经没人在那里吟诗了，我记得不知是哪个单位在这里搞过一次展览，学校组织我们去看，具体展的是什么，我也记不很清楚了，只记得展出的都是些图片，上面有蒋介石之类的人物。时间么，大概是在1947年到1949年之间。

有时我也到公园西面的谦德庄看杂耍儿。这里有练把式的，我看过金业琴等人的表演，后来这些人都成了中国杂技团的名演员。当

时谦德庄这个地方也有演戏的“园子”，段子凌就曾在这儿唱京剧，我看过他唱。当初谦德庄有个叫“义园”的地方，义园的前面有个摔跤场，张大力在那摔跤，



中正中学 天申女中位于今人民公园徽州道大门对过

这个人膀大腰圆，他是摔跤高手“马掌”的师兄弟。过去还有专门霸占“土场子”的恶人，“土场子”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垃圾堆”，你霸占了这一块，捞钱全归你，别人不敢上前。那时有个“土霸”，人们都叫他“刘老”，“刘老”独霸土场，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天他的几个仇人偷偷用铁丝把他勒死，扔在河里，他的尸首被打捞上来，我还跑去看了，人都不像样了。

我上的中正中学是私人办的，一学期得向校方交三袋面。我从小没母亲，父亲给金城银行烧锅炉，我是跟奶奶长大的，家里穷，我上学是家里借的钱，后来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得退学了。1949年，我十六岁那年，报名参军去了北京，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自此我也很少再去人民公园了。但人民公园始终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离休后，我时不时到公园里逛一逛，散散步。每年我都和我的老战友、天津公安总队的离退休干部相约在人民公园，合影、聚会，其乐融融，不胜感慨。今非昔比，天翻地覆啊！

（章用秀整理）

忘不了的一幕幕

口述人：厉泽田 1938 年 7 月 7 日生人

采访时间：2018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

原住址：天津市南开区八里台水上公园 10 排 10 号

人民公园我比较熟悉，第一位园长是进城干部，姓黄。当时人民公园刚刚建立，动物园也刚建成，第一个建起来是猛兽饲虎房吧。黄园长挺辛苦，每天清晨，早早起来进行检查。有一天，他打开饲虎房的后院门，好么，老虎从饲虎房跑出来了，在后院里呆着。黄园长吓



口述人：厉泽田

得也不敢动了，心里说，“你可别伤我啊！”老虎在后院里溜达溜达，又钻回那个饲虎房去了。这真是一次化险为夷。

关于人民公园养鱼，我记得那是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事，养鱼的姓王，年龄不大，十七八岁，眼睛有点毛病，所以大家称呼他“眼儿王”。我有时候去看看鱼，找“眼儿王”要两条鱼，挑两条好的，找个小瓶儿，弄点水放鱼。那个“眼儿王”是怎么来的，他住在人民公园附近，是一个小青年，爱好养鱼，没事他跟着公园的人一块忙活，干活挺利索，养鱼的道理讲得也头头是道，公园就把他招收为正式员工，一

直负责养鱼。

人民公园的笑话，我知道的挺多。有一位负责饲养老虎的姓洪。老洪在一个礼拜天，站在老虎园栏杆里头。有的小孩啊，爱吓唬老虎，逗老虎。老洪脸儿冲着观众，脑袋倚着老虎笼子，正跟大伙讲：“别喊呐，别闹啊！”突然老虎爪子从后边伸出来，把他的脑袋给抓伤了，幸亏没出大的危险，这多悬呀！



厉泽田先生

我也是干市政的，因为工作关系互相有来往，经常见面。熊猫来了以后，他们打电话告知我说，“熊猫来了，来看看，咱先看热乎的。”我去了以后，他们说：“哎，跟熊猫握握手吧！”我说：“你们打镲。”我一伸手，和熊猫握握手，还真是有点像人与人之间握手那个姿态一样！后来赶情一握上，他们说：“你别跟他较劲儿就行，你就慢慢跟他握手。”哎，一看，熊猫挺温顺，挺有意思！

我记忆水上建动物园是在1969年冬季，把东湖、南湖水抽净了以后，挖那两个湖的泥填建动物园，在现在的水上公园南路。在“水上”建动物园，当年建成后需要晾晒，到1972年开始搞设计，图纸陆续出来了，“七建”进驻，建了水上公园动物园，要求现代化。1974年底，可能到1975年，建成了动物房舍，所有的什么猛禽啊，猛兽啊，他们的房舍都建起来了，人民公园的动物逐渐往水上公园迁移。

（张诚整理）

人民公园琐记

口述人：万强（1938年生人）

时间：2018年8月11日（星期二）

原住址：天津市河西区无锡道九和里6号

我出生在河北省永清县南大王庄，那时我的父亲已在外面闯荡多年，最后落脚在天津市。因为他找了一个好事由（天津海关勤杂工），相对收入比较高，又很稳定，母亲就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抱着我，带着我奶奶、哥哥和二姐，从老家到天津投奔我父亲来了。起先住在意租界回力球场附近的海关宿舍，因人口太多了，实在挤不开，我父



口述人：万强

亲就通过中间人，租了两间房，在哪呢？南昌路南端、毓华里旁边沿街的一个院儿，距离李善人的花园也就几十米。学龄前那几年，到了春秋两季，母亲要把我和哥哥带回老家去打理祖上留下来的20多亩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都要雇短工，平日由我的一个干爹给照看着。当然，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父亲这边生活。我哥哥比我大6岁，他经常带着我到李善人花园附近玩。那时，四周没有围墙，是用铁丝网圈起来的，

从外往里看，几乎见不到房子，全是杂草和树木，尤其到了冬天，更是荒芜一片，谁也不敢往深处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哥带着我钻过李善人花园铁丝网去解大手，解半截时忽听草丛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吓得我直哆嗦，我哥说：“甭怕，是刺猬！”，一听说是刺猬我更嘀咕了，别扎了屁股！我哥拾起块土坷垃就想砍过去，我赶紧拦住他，“别砍，那是大仙！”我想起父亲曾经讲过的故事，狐狸、刺猬、蛇、黄鼠狼子都是大仙，不能惹，那年我才四岁。回到家，我哥告状，说我迷信，父亲一听也笑起来。

我六岁的时候，全家从南昌路搬到保定道 57 号，也属于



昔日九和里老胡同，于 1979 年建成无锡道大楼

海关宿舍。这是一所小洋楼，楼上住着外国人，我们住在楼下的一间，我奶奶和我哥哥住在院子里的车棚。这期间，我就在耀华中学对面的立德小学上学了，中

间隔着墙子河。学校就两间教室，楼下一二年级，楼上三四年级，校长姓查。我父亲觉得这么凑合着过不是常事，还是想再租房住。

1948 年，我们又搬回到李家花园附近的九和里。九和里

是条胡同，左手4个院为单号，右手5个院为双号，胡同口在无锡道。我们租的房子是6号院，房主姓陶，他原来是小白楼张顺兴西服店的师傅，手艺相当好。起初，陶家两口子加上儿子一家住在西边的三间房子，两间南房住陶的母亲，两间北房给伙计们加工服装，后来陶师傅岁数大了干不了了，儿子又好吃懒做，就把北房租给了王家，南房租给了我们。天津解放前夕，我母亲陪着我哥哥回老家成亲，等完了事再想回来就进不了，天津整个戒严，局势非常紧张。九和里的住户都备足了水和粮食，然后把玻璃用纸条贴成“米”字，床铺架起来晚上躲在底下睡觉。胡同的栅栏门用沙袋垒起了一人多高的防护墙，严防国民党残兵闯进来抢东西。普通老百姓一律不许出门，他们害怕有人给解放军发信号弹。我父亲上班怎么办呢？他就带着警备司令部统一发放的白色袖标。攻城的头几天，枪炮声不断，最密集的是1949年1月14日，到15日的下午，大街上就有人喊了：“解放军进城啦——！”我父亲胆子真大，他扒开沙袋子就出去了，边走边喊：“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就见解放军大部队从南昌路跑步向北行进。转天早晨，有邻居说，“你们看，无锡道多干净。解放军在马路上住了一宿，出发前都给扫干净了！”

我记得1949年春节前，天津刚解放没多日子，父亲忽然提出想到李家花园看看。那年我已经十岁了，因为搬家，我也从立德小学转到苏州道与南昌路把角儿的四维小学（后改光华小学，又改为三义庄小学）。九和里到李家花园也很近，我们溜达溜达就到了。因为这次是跟父亲一起去的，胆子也



1949年万强在四维小学参加庆
“六一”活动

大了，眼界也开阔了，就好像第一次踏进这个园子，既熟悉又陌生。我们小心翼翼的往里延伸，园子静静的，显得很杂乱，走到一座古建筑前，有些阴森恐怖。因为所有的门窗都没有了，屋里黑洞洞的，再细

细看，没烧尽的火堆全是卸下来的门窗，并且依然散发着焦糊的气味。父亲跟我说，这可能是国民党兵在这儿烤火留下的。又往前走了几步，见两棵树之间拦了一条绳子，中间挂着一张纸条，上写：小心地雷。我父亲下意识的把我拽到身边，压低声音说：“咱回去吧。这是解放军探出来的地雷，要是有的地方没探到，踩上就麻烦啦！”父亲嘱咐我，咱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再回去，千万别往别处走。

别看我在李家花园附近住了这么多年，几乎没去过花园的南头，当李家花园改为人民公园以后，觉得非常新鲜，就想围着公园走一圈。当走到现在的琼州道时，眼前呈现一片绿油油的菜田，一畦一畦的也不知种的什么。我十分好奇，见周围没人，就悄悄踏上了田埂，心想要是能拔俩萝卜呢。可是没走几步，两脚就沾满了黄泥，越踩沾得越多，正低头琢磨怎么办时，走过来一个大人，“你这干嘛？”我不知所措

的抖着手，“看，看着新鲜。”“有嘛好看的。你不知刚下过雨不能踩吗？”他见我手里嘛也没拿，语气缓和一些，说：“踩坏了我还得重弄。你还是个学生呢！”那次挨数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再说人民公园的西边，几乎都是平房，后来知道那一大片叫谦德庄，核心区非常热闹，有点像南市的“三不管”。记得在汕头路附近有一座百花电影院（后改称战斗影院），它的前身是“浙江义园”，是在天津经商的浙江籍人士出资兴建的一间大房子。规模有点跟小剧场差不多，里边专门为浙江人临时停放离世家属的棺材，然后找机会再运回家乡。天津解放以后，棺材进行了清理，政府觉得把它改成电影院正合适，一开始观众就坐在架棺材的长条板凳上看电影，后来才改成正式的座椅。

还有件事特别巧。谈恋爱时，我女朋友问我家在哪住，我说在无锡道的九和里，她一头雾水，又问周围有什么好玩的，我说有人民公园。她听后，眼睛一亮，说人民公园旁边有所学校，叫慈泽中学，我父亲在那教音乐。我也感到很惊喜，就说哪天去拜访一下。她马上说：“别了，我父母离婚了，我们都不跟他来往。”后来才知道，我这位岳父是官僚家庭出身，因家境败落，到学校当老师。上世纪50年代初离婚，不久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后来又加了一条不好好接受改造的罪名，把他遣送到长芦盐场。他这辈子特别倒霉，死了以后才给平反……

我大女儿出嫁前始终在九和里跟着爷爷奶奶，儿子小时

候也在这生活过一段。爷爷奶奶特别疼爱他们，隔些日子就带他们到人民公园打滑梯、看动物。有一年，人民公园请来了苏联大马戏团，轰动一时，根本买不上票。爷爷就推着藤编的儿童车，带着孙子、孙女，到人民公园去等富余票。开场大约5分多钟，还真等上了一个退票的，爷爷推着小车进入大棚，当时正在进行马术表演。最让两个孩子开心的是，头一次看见小丑的眼睛往外呲水。散场以后，孙女一个劲的问爷爷这是怎么回事。爷爷告诉她，小丑的胸口藏着一个水袋子，两根小细管通到眼睛，用力一压，水就喷出来了，孙女听后信以为真。大女儿在“三义庄”上小学，在“人民公园”上中学，始终是班干部。她曾跟我说，她在人民公园广播站当过业余播音员，广播站有个姓孙的师傅特别好，教给她和另一个同学怎么发声，怎么掌握节奏，怎么表达感情。孙师傅每天把要朗读的报纸和表扬稿准备好，鼓励他们大胆练习。有一次，她把“大女儿”，念成了“大女儿子”，意识到后，噗嗤笑出声来。孙师傅马上示意别出声，大喇叭播出去了，那一次对她触动特别大。

应该说，我大儿女交男朋友也是在人民公园谈成的。这里面还引出一段囍事：俩人约定在人民公园正门见面，还特别强调，门口有毛主席的题字。结果，我大女儿在徽州道与厦门路交口的人民公园门口等候，男朋友则在广东路与琼州道交口的人民公园大门等候。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不见人影，俩人都很失望，心想肯定完了。于是，我大女儿骑着车沿着徽州道往西走，男朋友骑着车从广东路也拐到徽州道，一下

子俩人就撞上了。原来，男朋友不知道人民公园还有个大门，他以为看见毛主席题字就没问题了。而我大女儿不记得人民公园后门也挂着毛主席的题字。这个小波折，不但没拆散他们，反而成为一段佳话。



最后说说这几

人民公园塔山集体合影

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先说在人民公园塔山集体合影这张(图1)，这是1958年正月初七拍摄的。那时我还在天津卫校读书，天津卫校就在广东路1号，校舍是原来的美国兵营，我们家离卫校也就5分钟路程。因为天津卫校面向全国招生，一些外地学生或家里比较困难的学生，放假也不回家，就在学校的食堂吃饭。这一年的春节，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在一起，非要逛逛人民公园，于是就定在大年初七这天。过去，游园是个很高雅很奢侈的事情，最起码得舍得买门票吧？！我们有说有笑玩的很尽兴，漫步到塔山附近时，看见公园流动摄影师正在给游人拍照。我们灵机一动，跟摄影师打了招呼后，立即爬到山上。先把外套脱下来搭在山石上，然后按照摄影师的摆布，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前排坐着的叫李玉华，后

排左一是我，左二叫冯志颖，左三叫杨鸿泉，左四叫王士俊。如今，只剩下我和王士俊了！

这张照片是1959年2月24日，独自一人到人民公园拍摄的（图2）。那一年，我被分配到天津体育学院担任天津足球队队医。刚到单位就让我去保定出席医药用品展览会，并在当地买着一顶剪绒帽子，戴上后感觉很英俊，就想回到天津非得拍张照片不可。然而，只有这顶帽子也不配套啊，就找父亲借来呢子大衣和毛围巾，一通装



万强在人民公园老石桥旁留影

扮后来来到人民公园。公园专职摄影师，看了看我的装扮，就带我来到这座汉白玉的老石桥边按下了快门。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喜欢这张照片。

1966年，我响应医疗下乡的号召，来到霸县医院，后调到霸县卫生局。1971年局里让我带队抓合作医疗试点，目的是培养农村的赤脚医生。我就带着几个人，其中有个女青年叫张福欣，因为她家特别穷，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但她属于“根红苗正”那种，大队党支部就把这个机会给了她。怎么办呢？讲理论她听不懂，干脆跟着我看病吧。没事的时候，她总问我，天津有多大？我说，反正是比你们村大。又问能比县城大吗？哦，比县城大好几倍呢！有时就问我在天津什么

地方住，我没法回答，就说在人民公园跟前住。她又问，人民公园都有嘛呀？我说，有水、有桥、有花、有草、有树……

她听完摇摇头，就这些啊！我接着说，还有假山、有亭子、有宝塔……看得出来，她特别向往天津。有一天，我跟她爸爸说，看来你闺女想到天津看看，等我回家探亲时带她去一趟，他爸爸当然高兴得不得



万强一家与张福欣（后排右1）在人民公园合影

了。就这么着，我不但负责她的往返车票，还安排她的食宿。记得那是个礼拜日，正赶上我夫人和三个孩子都在家，就一块去了人民公园。因为机会难得，张福欣又第一次来天津，我就让公园的摄影师给拍了这张合影，后排右一为张福欣。以后张福欣成为俞辛庄赤脚医生，不久到廊坊卫校深造，毕业后分在杨柳青农机校当校医。

（张建整理）

宝和里与人民公园

口述人：徐玉林（1941年生人）

采访时间：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

原住址：天津市河西区宝和里6号

说起人民公园，就不能不说一说周边的老居民区。特别是我们老居民区里的发小儿们，大伙一块见证了人民公园几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与人民公园为伴，几十年生活在这里，有着很深的相依相伴情结。我们下瓦房街宝和里老居民们就是其中之一。我今年77了，打解放前就住在这儿，是土生土长的老住户。



口述人：徐玉林

宝和里东起大沽南路，西至厦门路，北起金华道，南至琼州道。

紧邻人民公园外墙，在藏经阁旁边。隔着一条厦门路，是一个老居民区。天津解放前那会儿，这儿是一片矮平房，房子很旧，都说是李家所盖。这些平房有的出租，也有卖的，时候一长，这里就聚了不少河北、山东一带到这里打工混事由的老百姓。

一晃几十年过去，过去的李善人花园发展成现在的人民



宝和里与人民公园相邻（左边是人民公园的藏经阁右边楼房是宝和里）

公园，只有我们老居民对人民公园的发展变化最了解。因为我们是这土生土长的。所以说起人民公园，那话题多去了，外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对人民公园有着很深的感情。到现在我们还每天到人民公园里遛弯儿。得益于人民公园的良好环境，我现在身体还不错，有时还打打乒乓球，对老事儿记得还倍儿清楚。

人民公园在天津解放前荒过一阵子。那时没有围墙，只有一个土埝围着，土埝外面是一条水沟。水沟脏兮兮的，里面蚊虫很多，长着很多芦苇。大家管这道围埝叫“土围子”，当时藏经阁是木结构的三层，土围子里树不太多，但有不少枣树。宝和里就在土围子的外面，有一条不叫路的小路相隔，没有名字。解放前这里还有伪警局的一个宿舍，有大铁门，旁边住的是当地百姓。再往南琼州道那边就是伪警局的一个警所。

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儿的发小儿们天天到人民公园里去玩儿，买不起门票，就跳墙进去。那时一放学，人民公园里和旁边的体育场就成了宝和里孩子们的天堂，大家一起踢球、爬假山、摘树上没有成熟的枣；一起模仿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们，在假山上做打仗的游戏。有动物以后就一起逗猴子，拿镜子逗老虎，喂动物。后来长大一些，也时不时的帮助公园师傅们干点活。这样，孩子们与公园师傅逐渐熟悉了起来。孩子们看看金鱼，赏赏花草，公园师傅也很少过问了。孩子们很调皮，有时抓一把喂动物的豆子，到藏经阁那边烧着吃。当时孩子们还分拨的，谦德庄那边是一拨，宝和里这里是一拨，三义庄那边又是一拨了。宝和里的孩子起名字很多跟人民公园的老虎有联系，人民公园大虎下小老虎了，正逢孩子出生，就起名大虎或小虎了，宝和里小名叫大虎、小虎的孩子就有好几个。总之，我们的童年就是伴随着人民公园成长。参加工作后，一到节假日就惦着到人民公园转转。退休以后，每天更是要到公园里溜达溜达，好像不去趟公园就少点儿什么似得。几十年来，大伙与人民公园结下了深深地情结。宝和里拆迁重建后不少人搬到远处，红桥、南开都有，但还有不少老住户放弃多分房子的优厚条件，留下来继续在原地居住。我们离不开人民公园，离不开守了大半辈子的宝和里。也难忘1958年“热火朝天”的时代，大炼钢铁的时候，人民公园外墙建起了好几座小土炉，在那搞土法炼铁。

从毛主席1954年给人民公园题名到现在64年，公园发生了很大变化，1954年就有围墙了，但按照清式传统工艺，

青砖花眼的围墙是后来修的。人民公园有动物以后，逐渐成了当时天津市动物最全的公园。有小熊猫、白虎、猴山，还有河马馆，大蟒蛇。后来又有了大象。菊花金鱼也很有名气，每年秋天都会举办菊展，记得铁树开花的时，登了报纸，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人来看。人民公园那时在天津市知名度倍儿高，全市各区的人，甚至外地人都到这儿玩。人民公园成了天津市百姓的高档游乐之地了。一到节假日，特别是家里来了亲戚朋友，多半会带着到人民公园游览一番。孩子们欢度六一儿童节，过队日，过暑假，人民公园是首选之地，看动物、划船，爬假山，都能忘了回家。

1976年“7·28”大地震突如其来，宝和里的居民都给震醒了，衣服都顾不上穿好就跑到了外面，房子基本都损坏了，这儿成了河西区的重灾区。关键时刻，还是人民公园容纳了我们宝和里百姓。在大墙外面、公园里面搭起了临建棚，安顿了下来。连关动物的笼子附近，滑梯下面都搭起了临建，弄个苫布什么的，用木棍绳子支撑捆绑一下，就住起人来。后来政府和各单位提供了一些材料，搭盖的好了一些，宝和里的居民就在人民公园里过冬了，一住就是一年多。后期也有部分居民搬到了附近小蘑菇坟地成片建设的临建房。1981年宝和里建成单元式楼房3幢，住宅建筑面积8700多平米，公建配套400多平米。宝和里居民终于告别了那居住了几十年，三竖一横的四溜儿胡同，搬进了楼房。在新建的楼房里，隔窗看着人民公园美景，那一片片绿葱葱的花草树木，那一池子湖水，这儿有着大家从童年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时

光记忆，望着那高耸的中和宝塔，听着那百年古建藏经阁风声，走在人民公园的花草树木之间，宝和里居民心里总记着人民公园。

（赵晓光整理）

人民公园是我最向往的地方

口述人：储美起（1943年5月20日生人）76岁

时间：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

原住址：河西区小刘庄刘庄大街康乐里5号

中国的公园千千万万，天津的人民公园是毛主席唯一题字的公园。毛主席曾为天津写下三幅题词，一是“天津日报”，一是“一定要根治海河”，再一个就是“人民公园”。

在我的少年时代，人民公园是我最向往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我作为一名少先队员，常常和同学们来这儿过队日，划船，唱歌，爬到山上的小塔下玩。有一次过队日，

大伙儿添钱拍了一张合影，可惜那张照片找不到了。公园内有动物园，动物很全，老虎、狮子、熊、猴、山鸡、孔雀、猩猩等，有100多种。其中还有一只金钱豹，是1957年非洲的一个国家赠送给我国的。我对园里的大猩猩印象最深。你隔着笼子给它东西吃，它会伸出两只胳膊两爪扣在一起，表示“谢谢”，然后再伸手找你要东西。1980年天津动物园建立，人民公园内的80多种动物迁到了天津动物园，人民公园只留



口述人：储美起

下部分动物，其中就有一对白虎，2008年人民公园改建，这两只白虎也转到了天津动物园。

人民公园里里外外有好多可玩的地方。藏经阁外头隔着今天的琼州道，正对着地毯三厂，这地毯三厂最早在下瓦房，叫“华泰”，这里有我的亲戚，我小时候常去那里。每次我都



执笔人章用秀（中）与口述人储美起、柴玉珂（左）合影

要到公园铁丝网外的琼州道上逛一逛，这里有变戏法的、打把式的、算卦的，还有缝穷的，缝穷的是坐在地上给穷人缝补衣服的，这些人多

是中年以上的妇女，家里也很穷。那时这附近住着一些扛河坝的苦力，他们的衣服破了没人给补，便花点小钱儿让“缝穷”的给补一补，“缝穷”的人干这活儿也是为了糊口。最有意思的是摔跤的。摔跤要打个场子，围一圈人，都是看的，摔跤“主角”是一个外名叫“马掌”的人，这个人干打马掌这一行的，力大无比，人们便都叫他“马掌”。跟“马掌”摔跤的大多数都不是他的对手，转来转去，几个回合，便被“马掌”摔倒在地，于是一声喝彩，便有人出来收钱。其实这“摔跤表演”不过就是套子活儿，纯粹就是为了赚钱。

公园附近的谦德庄也很有说头。谦德庄的形成与 1917 年天津的那场水灾有关。那一年闹大水，一些农民就流落在这儿，建窝棚居住，渐渐地来这儿重建家园的农民越来越多，窝棚一多就变成了棚户区，这里慢慢聚集起卖苦力混饭吃的底层劳动者，后来就有了一个“谦德庄”的名字。天津有民谣说：“谦德庄有个万德里，梳小辫（边儿）的不讲理。”就是讲这一带当年的混混儿斗狠争勇，艺人撂地，谦德庄就像天津的另一个“三不管”。

（章用秀整理）

谈谈人民公园老花把式杜文凯

口述人：俞钟震（1944年11月10日生人）

时间：2018年9月20日（星期三）

原住址：天津市红桥区北大关关上

我表大爷叫杜文凯，是红桥（区）杨庄子人。解放初至1977年退休一直在人民公园干花把式。我经常在节假日带着孩子去他那玩。有一次看见他和一位穿中山服的长者在花窖里说话。一问，才知道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园长张学铭。他叫我表大爷（杜文凯）把栽花的经验讲出来写书，后来还专门请来一位中学女老师与我表大爷合作。书名叫《天津花卉栽培》。



口述人：俞钟震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每年天津办花展，有人民公园、北宁公园、水上公园三家，人民公园的花展最好。各种花最多，最高级。花好，花盆也讲究，花架也是上乘的。花盆有瓷的、紫砂的，都非常高级。还有各种式样的花盆架，当属硬木的最好。在室内展出的菊花上了好盆，再摆在优雅的花架上。嚯！那叫一个漂亮！二十世纪70年代有了墨菊，在当时菊花中当属它最有名，最珍贵，也最惹人喜欢。大家经常围着看。人

多，后面的看不清，急了嚷嚷。后来，把花摆在一个高花架上，大家满意了。

当时有一个有趣的事。花卉展上游客可以给自己中意的花起名。名字起得好的话，被园方采纳。就用粉纸黑墨写个牌，挂在花上。我记得有个盆景叫“嫦娥奔月”，是公园附近一个中学老师给起的名，还真像。

我姥姥家是杨庄子村的。全村都种花，干花把式。市里迎宾馆，各个公园的花把式多是我们村的。我起小也见过不少好花。有一年，我姥爷（与杜文凯是邻居）摆弄出一颗大花，花朵有小脸盆那么大。花有许多花瓣，颜色是背金内红。由于花头太大，



俞钟震画的人民公园枫亭（今显密圆通殿）

花挺子（花茎）撑不住。我姥爷用竹子做了个圈兜住花头的下沿，再用三根树枝棍绑住圈，下面插在土里，这样大花朵就待住了。估计是棵西番莲。有一次我表大爷杜文凯带我看了人民公园展出的一颗“霸王鞭”（仙人掌类植物），可把我惊着了，至今难忘。栽在一个老么大的木筒盆里，独木一枝有脸盆那么粗，高有两层楼。记得霸王鞭的上梢在房顶的天

窗里。

我本人好画画。二十世纪 60 年代在和平区文化馆美术班上课，是李文珍先生（天津著名画家、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画，在耀华中学任教多年）教我们。有一次他带我们到人民公园创作，画的是中和塔和枣林子。李先生当时画的是水彩画，水和颜色在他的笔下出神入化，人民公园的景色在他的画上更好看了。我也画过人民公园的枫亭（显密圆通殿）。

（徐启明整理）

我在人民公园当“义工”

口述人：刘祥俊（1946年生人）

采访时间：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

原住址：河西区谦德庄永安道永安东里26号

我从小没有母亲，上边就一个姐姐，所以家里管我特别严。上学之前，根本不让我走出胡同。我奶奶隔十几分钟就喊我一次，听见我答应了，可以接着玩。有一次，我产生好奇心，就悄悄走出胡同十多米，家里喊我没听见，我爸就四处找我，气得他抬手就给我一个大脖溜儿，这是我第一次挨打。我父亲、我奶奶总跟我说，外面有撒迷幻药的，其实是怕我跟坏孩子玩。



口述人：刘祥俊

永安东里是条很长的胡同，大约有30多个院子，一个院儿6间房，一间房9平米，光东里就得住着几百户人家。我们院儿一户姓陈、一户姓赵、一户姓褚、一户姓刘、一户姓郝，再加上我们。正因为我在家里是个盛宝儿，所以9岁才上学。我姐姐比我大6岁，她天天带着我去绍兴道小学上学，它的



夫人带着儿子在人民公园湖边留影

前身是木兰小学。一上学眼界开阔了，接触的人也多了，胆子渐渐大起来。记得刚上初中那年，有个叫张学光的好朋友约我去人民公园，我们从广东路一侧的围墙翻过去，进了人民公园就是游船码头。我第一次看见公园里有这么大的水面和这么多的树木。张学光跟游船码头的

孙师傅很熟，就把我引荐给他。后来知道孙师傅叫孙学文，这个人不简单，公园的几十条游船，就他一个人负责。不仅开票、计时、收费，还得帮着游客登船、上岸，赶上节假日才有人过来帮忙。所以他特别希望孩子们陪着他，给他打打下手嘛的，一来二去，我就成了人民公园的常客。以后，我奶奶去世，我爸爸续弦回老家，我姐姐参加工作，就更没人管我了。除了上课，就去人民公园，那时我从家去人民公园就爬墙，因为从永安东里出来，隔着广东路就是人民公园。那时公园也有执勤的，逮着了就送到办公室，所以我们翻过墙都得在草坑子或树后面先观察观察动静。这里有个小插曲：由于我经常爬墙，发现墙头儿顶端的瓦当上刻有“人民公园”几个字，

① 第2至4张照片均由刘祥俊先生拍摄，第1、5帧由张建先生拍摄。

这个细节恐怕别人不知道。

要是从学校（二十七中学）去人民公园我就走琼州道上的小栅栏门，这个门平时不开，是专门给动物配送食品和接送动物的。看门儿的姓米，跟我也挺熟，即便锁着门一喊米师傅或孙师傅就给我打开。那几年，我几乎成了不拿工资的人民公园职工，每天下午或周日必到游船码头去“上班”。从最开始的握着长沟协助游客上下船，到后来坐在小板房里给租船游客开小票。记得租一条船，先交10块钱押金，每划1小时4毛钱，超过1小时、不到俩小时



给两个孩子在人民公园中和塔下留影

6毛钱。别看这么多孩子到游船码头帮忙，孙师傅就喜欢我，把我当成了他的徒弟。有一次公园死了一头熊，食堂炖了一锅熊肉，孙师傅从公园外的职工食堂，特意端了一小碗熊肉让我尝尝。我呢，不惜力气也不嫌麻烦，一切听从孙师傅的安排。忘了是哪年，张学光又领了个同学到游船码头，那段时间我们就在一起跟着孙师傅忙活。忽然有一天，孙师傅慌了神，急得团团转，细问得知：他放在小屋抽屉里的一块手表不见了。这块表是北京的朋友听说天津委托店出价高，就

拿过来托他帮忙给卖了。孙师傅随身带着，有时也用它记划船的时间，没想到瞅眼不见就丢了。问谁都说不知道，那就报警吧！警察看了看现场，又问了问情况，圈定了六七个人个别谈话，等都轮过来，警察对孙师傅说：“偷表的人找到了，你跟他们说说，主动把表交出来就算了，要不咱就立案！”孙师傅心想都是孩子，尽量别把事情闹大了，就说：“谁把表拿走了，还给我。就当是逗着玩儿，行嘛？！”结果，是张学光后来带来的那个孩子干的，警察跟着他回家，从铺底下把表取回来。

再说冬天，人民公园开辟滑冰场，游船码头就改成了冰橇码头。冰橇一米五长，80公分宽，靠前是小椅子，能并排



姐弟俩在人民公园后门小广场留影

坐两个人，后面可再站一个拿冰镩子的，这样的冰橇大约有几十个。我和同学接着去服务，这个阶段我姐姐已经出嫁了，住在岳阳道的恩庆里，姐夫是蔡家的后代，很有身份。姐姐的婆婆老说，祥俊挺苦的，一定照顾好他。所以我姐每个月给我18块钱生活费，我没觉得有多孤单，反倒觉得挺自在。

《话说天津卫》有人提到过德国坟地，我也去过，只见那

里有许多大石块，东倒西歪，也没注意上面有没有字，我们老去那儿是为了逮蜗牛。旁边还有一溜低矮的平房，跟公园连着，也就是说从房后头就能直接进公园，原先还有铁丝网，后来几乎平趟了。我们邻居褚家的大闺女嫁到了这个院儿，丈夫姓刘是退伍军人，所以我再去人民公园就从褚大姐家的后院儿进去。这就引出了地震后的一件事：



老式照相机承载着人民公园的记忆

1976年7月28日地震过后，家家户户都出来搭临建棚，我们家在人民公园后门（广东路与琼州道交口）附近，搬了几把椅子、立了几根竹竿，撑起一块儿塑料布。大地震当天的傍晚7点半，又来了一次余震，就看人民公园的围墙，波浪似的来回摆，等余震停了再看围墙又恢复了原样。几天之后，褚家大姐碰见我们，说他们家后身的人民公园空地上搭了一间大席棚，非常正规，让我们挪到那里去住。那时我已经成家，有了两个孩子，于是就来到大棚。这间大棚是用杉篙搭建的，四周和顶子围着苇席，里面一条大通铺能同时容纳100多人睡觉，男女老少、认识的不认识的全在一起。再看人民公园里边，也都搭满了

临建棚，就连动物笼子跟前也都没了空地。大约住了半个来月，我们厂给了些建筑材料，我就在儿童医院附近找了块空地搭了间临建，等到天冷了才返回永安东里的家。

接下来说说人民公园的“踩踏事件”。人民公园有个露天影院，周围居民经常带着板凳去看电影。电影票1毛钱一张，如果只买公园门票，在广场里待到电影开演也不会有人哄你。但是，你出来再回去就不行了，几座小石桥都有把门儿的。那天，露天电影院上映彩色戏曲片《杜鹃山》，我和老伴带着两岁的闺女，肚子里还怀着儿子去看那场电影。因为是新片子，去的人特别多。谁知，刚开演不会儿，天就阴上来了，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我一看不好，赶紧走吧，跟着有些人也急着往外跑，我们叽里咕噜回到家，可是雨也没怎么下。转天就听说人民公园出事了，具体严重到那种程度就不知道了。

参加工作以后，特别是成家以后，去人民公园的次数就少多了。但是，我喜好摄影，老早就买了双镜头120照相机，带着家人在人民公园拍了不少纪念照，有时我跟老伴翻看翻看，很是感慨……

（张建整理）

人民公园趣事

口述人：李建樟（1947年9月3日生人）

采访时间：2018年9月17日（星期一）

原住址：天津市河西区南昌路福安里4号

我今年71岁，过去我家离人民公园很近，与她有着很深的感情。1992年我搬到了和平区，但母亲还住在福安里，我每周要来一两次，直到2013年母亲去世。今天，我想讲一讲亲历亲闻的人民公园趣事。



口述人：李建樟

我对人民公园围墙印象比较深，因为小时候我能记事时公园没有围墙，只靠木柱子之间缠绕着的铁丝网围着，铁丝网有的地方有缺口，孩子们就从缺口悄悄地进了公园。我们哥儿四个，从小父母就经常带着我们到人民公园游玩，成为人民公园的常客。那时候公园门票2分钱。从我记事时候起，透过铁丝网看到公园西北角有一片坟地，再往西有几条胡同。在我的印象里，人民公园中部、北部比较繁华，南部、西部略显荒凉。1954年毛主席为人民公园题名，我年满7岁上了学。1955-1956年公园建起了围墙，是雅致的比较矮的青砖墙，可以从公园外面看到里面的景色。我看

到人民公园有山有水，有花草树木、岛桥亭阁，有动物、儿童游艺场。一年四季，春游赏海棠、消夏看晚会、深秋观菊展、寒冬滑冰排，功能齐全，活动丰富，还有咏诗亭、中和塔、藏经阁等历史文物，是一座靠近市中心比较大的历史名园，是天津的一张名片。我父亲经常对我们哥几个说，你们出去玩，一旦迷了路，你就问人家人民公园怎么走，找到了人民公园，也就找到了咱们家啦！

我对人民公园动物最感兴趣，地方不大，种类齐全，有熊、狮、虎、豹、狼、河马、斑马等大中小型野生动物 80 余种，500 余只。各种禽类 100 种以上，还有金鱼、热带鱼等。我家离公园近，每天能听到虎狮吼叫，叫声能传到方圆三五百米。有一天黄昏，我带着小表弟去人民公园看动物，路过虎笼子，正好赶上虎的吼叫，不仅小表弟害怕了，我也有点打颤，赶紧说咱们快走吧！这一回我才真正明白了《黄河大合唱》“吼”字的深刻含义。1952 年我 5 岁那年，听说人民公园的“豹”，



执笔人张绍祖（中）与口述人李建樟、
彭学敏（左）

从笼子里跑了出来，我们几个小孩也去看热闹，在路上大人警告我们，快回家，要不豹会吃小孩，吓得我赶紧回家关上大门，把屋里的门也关的紧紧的。后来听说豹跑

出了笼子，被解放军击毙了。1953 - 1954 年人民公园贴出了广告，说新到了一只“飞虎”，人们以为是“会飞的老虎”，一时人山人海，到公园看“飞虎”，原来“飞虎”型似燕巴虎，近似猫大小，真让人哭笑不得！

我经常到人民公园，本人善于观察，看到饲养员与动物和谐相处，还真有点意思。我看到一位 50 多岁的老虎饲养员盛夏在给老虎扇扇子，老虎是那么惬意；一位狼饲养员在进到有三四只狼的笼子后，才开门把狼赶到另一个笼子；负责蟒蛇的饲养员每天下午四点多展览完毕，把蟒蛇装进麻袋背回园舍。

人民公园没有大象，1972 年 6 月，斯里兰卡前总理西里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曾向中国赠送一头一岁小公象“米杜拉”，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交接仪式。不久，人民公园从北京动物园租借了这头小象，展出了两个月，地点是在当时的河马馆，现在的“西岸相声馆”。这可以说是人民公园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大象动物展！

我保存着几帧有关荣园 - 人民公园的老照片，其中有两张老照片是我姑妈在 1940 年前后，在河北省立天津女子中学校（今海河



河北省立天津女子中学校（今海河中学）学生 1940 年前后在荣园留影

中学)上学时在荣园的留影。其中第二张我认为是在山的旁边,左后方是水面。还有一张老照片,是我的表叔、天津日报摄影记者于嘉祯 1955 年拍摄的,当时人民公园门楼建成不久,是我姐姐在人民公园留影。

人民公园在历史上还曾做过避难场所。1976 年“7·28”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当天天亮后,姐夫接我家到他居住的河东,他家是楼房,下午发生了 6.5 级余震,我们觉得楼房不安全。转天我与弟弟在人民公园用塑料布、竹竿搭起了地震棚,用宁波道华北纸制品厂提供的厚纸往地上一铺睡了两宿,后来把家里的床搬来,一家人就在公园度过了几个月。



1980 年李建樟子女在人民公园留影

到了 11 月初天气凉了,就回家暂住;可是我家平房后墙向外鼓,孩子不到一岁,不安全,恰此时又发生了一次较大余震,于是决定再回公园搭间临建。单位给了竹片、油毡,角铁等,在公园靠厦门路小桥左膀子一侧,搭了一间临建,一直住到了 1978 年六七月份,家里平房重新翻盖后,才搬回了家。人民公园一直到 1980 年左右,才从避难场所恢复为鲜花盛开的公园。我保存着一张 2 个孩子 1980 年在人民公园的合影,从背景看人民公园已在恢复重建之中。

(张绍祖整理)

我所知道的人民公园

口述人：冯栋梁（1949年4月1日生人）

采访时间：2018年9月26日

原住址：苏州道141号

先说说我的个人简历：7周岁入同福小学，后改为河西第七十四小学（三义庄小学），班主任是崔玉福老师，她教我们数学。1963年考入第六十三中学，中途休学1年。1966年初中毕业后到西郊区小沙窝村务农。1975年初，被选调到天津显像管厂玻璃壳车间做工人，一年后调到技改组，后又转到供销科担任稀有



口述人：冯栋梁

金属的原料供应。2000年下岗到外企打工，2004年55岁时退休。

我记得第一次去人民公园是四五岁时叔叔带我的，公园四周没有围墙，仅有不高的铁丝网，外面有许多乱坟，很荒凉。大概是为了修围墙正在清坟，特别是徽州道一侧，全是坟，工人们先是把坟头的土全部挖开，再向地面以下挖土，直到露出棺材为止。我记得我曾看到许多棺材，很大，有黑漆还

有红漆的，工人们用很粗的两根绳子穿过棺材底部，在棺材顶部系成扣，再用大木杠穿入扣内，几个人把棺材抬出，放在平地上，再用车运走。我因年纪很小看见这么多摆在地上的棺材很是害怕。这时的广东路、谦德庄一带也很破烂，很快公园四周的青砖围墙修好，周围也没有坟头了，公园也显得特别漂亮，徽州道一侧又修了正门的牌楼，上面有毛主席写的“人民公园”匾额，很是气派。围墙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整个围墙顶部排满了一块一块的两面坡的护瓦，每块瓦的最下方的圆形部分都烧出了“人民公园”四个字，非常醒目。

我听老人说，公园不是一个规矩的长方形，有个刀把，风水不好。这个刀把克小口儿（对家族年轻人不利）。公园每年都搞菊展，每年秋天，公园就把自己培养的各种盆栽菊花摆在空场上展览，这时也是游人特别多的时段。菊花颜色可以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都有，而花型更是多得说不清，菊花的这些特点，别的花园没有。我祖父特别爱



执笔人尹树鹏（中）与口述人刘钧政
（右）冯栋梁合影

菊花，每年菊展必到，常带我去看菊花。一年，我和祖父看到了花瓣为黑色的菊花，叫墨菊，这种菊花的花瓣是深紫色，紫得发黑，引起人们的好奇，但墨菊绝不出售。

有人说墨菊从西乡移来用黑汁浸泡根部，花瓣的颜色就变黑了，但我觉得这不够科学，墨菊应该是用生物学育种的方法培养出来的。后来天津还把墨菊作为香烟的商标，成为天津的一个品牌。

我祖父还特别喜欢养金鱼，人民公园的金鱼养得特别好，鱼把式们常说，养鱼就是养这盆水，水好，鱼就好。所以他们每天都要晒水，就是把刚换上的自来水在大木盆或大泥盆里让阳光晒，待氯气没了以后成了熟水再把金鱼放进去，等到每条金鱼在里面游得非常自然以后再喂一点食，这时只见每一条金鱼都机灵得吸食鱼虫，鱼尾摆动得也特别快。这里的金鱼一般的家庭没有，主要有“望天”、“红帽子”、“珠子”还有眼睛外面包着一层大水泡的“泡眼”。但即便是普通的龙井，也因为头部、身部匀称特别是尾鳍开叉特别整齐，也显得特别好看。养金鱼很辛苦，冬天上冷的时候要把它们搬入屋内，窗户还要糊上绵纸保温，夏天热的时候要用苇帘子将鱼盆盖住，避免阳光直射，每当我看到一个一尺多高的木盆或泥盆的四周长满青苔，条条金鱼在里面悠闲地游着，我的心里也非常舒服。我祖父每年在秋后用一个玻璃罐头瓶买几条小的，因为和鱼把式混熟了，他们尽量给挑一些周正、好看的小金鱼，当时每条小金鱼二三分钱，花三毛两毛的可买上十七八条，因祖父的爱好，我家经常摆着从人民公园买的金鱼和菊花。

每年公园会将一些体型不好的金鱼放入湖中，因湖水很深，冬天湖底又保暖，这些金鱼反而长得比木盆里的个还大。

每到春天，这些红金鱼游出水面人们倒觉得很新鲜。

动物园的动物我记得猴笼前最热闹，有顽皮的小孩用糖纸包上一块肥皂头扔给猴，猴吃到嘴里以后呲牙咧嘴，并朝人淬唾沫。再有就是给猛兽喂活食，因为有一个饲养员住在绍兴道明德西里，是我同学的邻居，所以有时他喂活食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将地面扫完后，把一些小白兔和活鸡放进去想让这些猛兽或蛇去捉着吃，以培养他们的野性，所以在它们的笼子里会看到鸡吓得乱飞、兔子乱跑。但我看到的猛兽并不积极，待到鸡飞不动了，它们才去咬。倒是蟒蛇吃兔子时，兔子吓得就不动了。冬天蟒蛇在白铁皮的罩子里还要开着灯来保暖。

人民公园的湖面夏天划船，冬天的冰面上可以租冰排子划着玩。冰排子约2米长，1米多宽，上面有坐，可以坐两个人，冰排子下有两根平行的铁条，撑起来不费劲，所以孩子们非常愿意玩，价格是每小时两角钱，我的这些记忆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景，现在公园的变化太大了，这些都消失了。

（尹树鹏整理）

人民公园戏曲长廊趣事

口述人：张玉成（1950年8月23日生人）

采访时间：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

原住址：河西区利民道景兴西里92门201

人民公园里有一条蜿蜒走向的长廊，设计得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两边的廊沿可以坐人，冬暖夏凉，这里每天上午即是京剧戏迷、票友的乐园，又是交流学习的场所，届时檀板清脆、皮黄悠扬。

十年前我住在景兴西里，离人民公园很近。当时，小孩姥姥与我们一块生活，照顾孩子、做饭，对我们



口述人：张玉成

无微不至。结果有一年老人家忽然患病，过世了，残酷的现实让我老伴不能接受，痛苦的心情总不能解脱，我一看这哪行呀！结果就每天早晨带她去人民公园遛早。当时能买月票，大概每月两块钱，时间一长，老伴看到长廊里有很多唱戏的票友，一次看到有位老大姐唱程派《锁麟囊》中的《春秋亭》很是好听，那悠扬的旋律，声情并茂的表演，让老伴看得入迷了，跟我商量，想学这段《春秋亭》。因为我当年在部队参加过样板戏的乐队伴奏，有些基础，很快我学会了这段唱腔，

并一字一句的教老伴唱，我老伴的嗓音条件不错，唱原调西皮二六，流水板不费劲，我叮嘱她必须入迷，不能再想其他事才能学会，因为“不成魔，不成活”嘛。老伴很下功夫，在家认真练习，很快，能背着唱了。

一次上午去公园经过长廊，遇见原单位的老余师傅，他是唱老生的，每天都来园里票戏，聊起唱戏，老伴很冲地说：“我会唱程派的《春秋亭》。”老余知道我老伴不会唱，就说：“别瞎闹了，你会唱？来一段我听听。”正好有一位姓裴的琴师，会拉程派，还有翁子、月琴伴奏。琴师问：“你能唱几个眼？”这下可把老伴和我都问住了，不明白嘛意思。我忙说：“按原调定吧”，琴师不大相信，问：“行吗？”我说：“试试吧”。



执笔人张诚与口述人张玉成

过门一拉，老伴一张口，有板有眼，吐字、归音唱的像模像样，等唱完一落腔，大家热烈鼓掌，琴师笑着说：“真行！唱得不错。”老余师傅很是惊讶，“嘛时候学的？真有两下子。行，没事来这玩儿吧。”

老伴有信心了，整天琢磨唱腔，每天公园观摩其他票友演唱，几次遛早，后边总有人喊“锁麟囊”，“锁麟囊”成了我老伴的代名词，老伴听了心里总是美滋滋的。痛苦的心情没了，整天除了去人民公园，就是背词、

听录音。是人民公园的京剧长廊让我老伴重新焕发精神，身体好了，性格开朗了，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亲身经历。

人民公园戏曲长廊不但使我老伴焕发青春，而且还培养出了很多知名票友，如陈万树。陈大爷是男旦，大青衣，做派、唱腔满官满调，整个就是专业水平，一张口就是碰头彩，一段下来掌声不断，和陈大爷唱对儿戏的，叫“任包了”，任大爷嘛戏都能唱，只要是谁不会，任大爷就能唱，人送外号“任包了”。陈大爷在人民公园唱出名了，网上也红了，视频传到外地的一些戏迷的手机上，河北、山东、上海等戏迷，都知道天津人民公园京剧长廊有位陈大爷，专程来津找人民公园，听陈大爷唱戏，学戏。前一段陈大爷登上了天津电视台举办的“模唱大师秀”，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好评。另外，评剧、河北梆子在人民公园也相当受欢迎，每当有清唱演出，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满坑满谷，戏迷票友大呼过瘾。大家都认为是人民公园这块闹中取静的风水宝地，将我们的传统艺术活态的传承下来，普及了国粹，为百姓提供了活动场所。不花门票钱，在家门口目睹了在剧场看不到的高雅艺术，并且亲自参与，自娱自乐，满足了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



张玉成与老伴儿

（张诚整理）

人民公园的回忆

口述人：刘钧政（1952 年 12 月生人）

采访时间：201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

原住址：和平区大沽中路崇德里 28 号

我 1961 年入南京路小学就读。我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崔书贞老师，从入学到毕业她教了我们 6 年语文课。她住在和平区新华路文泉西苑 8 号，原新华路体育场正门对过。她原是河北区二中心小学的教师，调到我校后一直干到退休。她高个子，不胖，家中只有一个女儿。她对我们非常的慈善，因为长期站立讲课，腿部有严重的静脉曲张，走路时



口述人：刘钧政

往里撇，每当她站久了就要扶着讲桌抬一抬腿。她在教师中非常低调，不苟言笑，可是对学生非常关心。我们毕业后经常去看望她，直至去世。我之所以提起我们崔老师是因为她常带我们去人民公园开展集体活动。因我家离人民公园很近，我们的大队和中队活动经常在公园里进行，所以我对人民公园太熟了，感情特别深。从 1959 年到 2009 年这 50 年间我时

常到公园里游览。我从儿童的记忆到成年的感知，再到老年的回忆，看到了人民公园 50 年的变化历程。

上世纪 50-60 年代学校的少先队活动特别多，每班是一个中队，经常到园内开展活动。我是个小队长，每到六一儿童节，大队活动更是精彩。全校列队有鼓乐队引领队伍前进，大队长打着大队旗，随后，是每个中队长打着中队旗，到园内开展活动。全校聚集在园内开展活动比较少，各中队在园内开展活动就很平常了。我们班经常在崔老师的带领下到公园开展中队活动。特别是每年新队员入队，都要在园内举行仪式。集体会议以后各小队就自由活动了。孩子们成群结队的走向自己想去的的地方，但多数喜欢去的地方：一是儿童游乐场，一是去看动物。我记得从建园到 1959 年，公园的布局没有改变，除去许多动物外，主要是在儿童游乐场有一个钢柱支撑起的伞状旋转铁塔。下面悬挂着五、六只小飞机。交钱后大人抱起孩子放进小飞机里关上舱门，小飞机在工人的操作下顺着一个方向旋转起来。我记得第一次坐小飞机，是母亲把我抱进去的。当时公园有两个门，正门是徽州道和厦门路交汇处，它位于公园的东北角，门口有牌楼，上有毛主席书写的“人民公园”四个大字。另一个门是位于西南角的琼州道与广东路交汇处，原先门很小，现在变大了。现在人民公园已经有了四个门，南门正对隆昌路，东门在厦门路的丁字路口。人民公园的动物很多，在动物聚集区靠右侧为虎、熊、豹等大型猛兽，靠左有各种鸟类，尤其是鹦鹉，颜色和种类特别多，还有孔雀、珍珠鸡、火鸡等。沿琼州道一侧湖

边藏经阁附近有鹿、猴，猴笼附近是最热闹的地方。往西有斑马，还有一处养着猛禽苍鹰的铁网。里面有一棵枯树，被苍鹰的利爪抓的凹凸不平，旁边还有一块大的岩石。我们都管他叫“老刁”。还有蟒蛇、狼、狐狸、豺狼和熊猫。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又增添了黑猩猩，七十年代中期又增加了河马。一天，我在看熊猫，亲自听见一位熊猫饲养员大爷对别人讲他险遭熊猫袭击的轶事。当时熊猫馆是铁网，没有玻璃。他说：“我进到熊猫围栏内打扫卫生，它在内室看着我，平时很温顺，不知为什么这次它突然从中间的隔离铁门窜出，向我扑来，幸好外面的铁门没有上锁，及时逃出并把门带上。只见它把我扫地的笤帚全部用牙咬断……。”

我性格很稳重，但胆子还是很大的。二十世纪60年代公园内增加了一个铁制的高档滑梯，它由两部分组成，从台阶上到平台分为左右两部分，右部分是一个螺旋状的带侧帮的铁板滑梯。虽然很陡，但因有螺旋缓冲，孩子们可以很安全的从顶部滑到地面。很高但很安全舒适，是女孩子和低龄儿童的首选。左边这部分是两个平行光滑的钢管，以约五十度角斜插地面。快到地面处有一尺高的空间距离。是男孩子们显示胆量的游戏。因为只有两根平行的铁棍，虽然距离不宽，但无遮拦直接看到地面，一般人不敢尝试。滑时两腿担在两根铁管上，两臂在上，掌握速度。时间长了孩子们就创设出许多花样。有两腿伸直盘在铁管上，上身仰卧滑下者；有两腿盘在一根铁管上，对面空出的一侧手臂扶在另一根铁管上掌握方向和速度；还有胆更大者，头朝下，趴着滑下，快到

地面时用手攥住铁管停住。然后再撑起前臂，站立起来。我们管它叫双杠滑梯。

1981年春节前后，我见沿着琼州道围墙挂起了大字标语和图片的广告：脚技、耍蛇、万能脚表演，看这些节目要二次买票，我花钱买票进去了。走进用慢布围起的场内只见一个40岁左右的女士烫着整齐的头，穿着褐色的西服，深灰的裤子，徒手将一直大蟒蛇提起，套在自己的腰上、肩上，最后又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只见她双手攥住蟒蛇的颈部，蟒蛇的头不情愿的乱动，她一使劲蟒蛇全身便使劲的缠绕这位女士的身体，她喊道：“它的力气很大，缠在身上很痛，它在捕捉其他小动物时就是用蟒身将小动物缠成骨折，使其不能动弹再把它吞入腹内。”反复演了几遍以后大家鼓掌。她不知用什么方法使蟒蛇从她身上退了下来。最后又取出眼镜蛇用手挑逗，只见眼镜蛇吐着蛇信向她咬去，但她用手拍了眼镜蛇的头部，最后拿出两条眼镜蛇进行表演，引起人们一阵惊呼。表演完后将它们放入竹筐内。人们在这些惊险的场面中高度紧张。女士刚表演



耍蛇

完，又出来一位男士，只见他上身西服，下身黑西裤，皮鞋袜子，非常儒雅，走在观众前方。突然他肩膀一耸将西服甩

掉，露出白衬衫的两只空袖。原来他是失去了双臂的一个残疾人，他两只脚配合，先脱掉鞋再脱掉袜子，坐在凳子上开始活动自己的脚，他竟用两只脚表演了六个节目。第一个是点火抽烟：两个脚的前两个脚趾不知如何练的这么灵活。一只脚夹住烟盒，另一只脚取出一只香烟，送到嘴边叨住。然后再用脚趾打开火柴盒，取出火柴，划着，将烟点燃。一边吸一边做出各种动作，而后将烟吞入口中再吐出重吸，最后熄灭。第二个节目是穿针引线：他用脚趾取出长短不一的针，还用脚趾取出线，将线头撵细做成韧头，一脚持线，一脚持针，一次成功。特别小的针最多两次。第三个节目是搪瓷杯喝水：他将一只装满热水的暖水瓶和一个茶缸摆在脚下，一只脚夹住茶缸的把手，另一只脚拔出暖水瓶的瓶塞，夹住把手倒水，然后放下暖瓶，另一只脚举起茶缸喝了起来。第四个节目打鸡蛋：磕破三个鸡蛋倒入一个搪瓷碗内，另一只脚夹起一双筷子，快速的搅拌，直至打的蛋液冒出碗沿。大家一片鼓掌。第五个则是更难的箍木盆：只见他用脚端起一只木盆，盆地朝上，用脚将盆底儿踹下，取下木盆上的两道铁箍，然后将木盆的侧帮反向立起，先将小圈铁箍箍上，再将盆底放好，将大箍箍上。把盆底儿用脚踹实，然后再盆地朝上放好。一脚用于长方形的方铁，一脚用锤子将两道铁箍向下方锤紧。将一个散了的木盆重新箍好，最后将木盆反过来放平，倒上水让人们看到不漏为止。大家又是一片掌声。第六个节目是难度最大的双脚写字画画。只见他用脚取出一张比报纸稍大的白纸，一脚夹住毛笔沾满墨汁，熟练的在白纸上写画起来。

左边画了一块巨石上面站立一只勇猛的老鹰，右边则是两行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然后将作品向大家展示，并用沙哑的声音朗读着这句格言。过了几天，我看见晚报上有了具体的报道，才知道这是来自安徽省凤阳县耍蛇、脚技的表演。这个男演员叫鲍盛林，因为这些节目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他的名字我也记得很牢。

上人民公园看看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但是公园内人满为患也是我改变习惯的一个原因。一个是1965年的六一儿童节，大人可以携带儿童免费入园。这一次公园内人潮涌动，动物展区摩肩接踵。最后就是2009年9月天津市八个大公园全部免费，这一下不得了了，人太多了，走不动了。当天我到公园走路都非常困难，人多的都躲不开，此后出现了各种晨练人群，唱京剧的、打球的、演奏乐器的、跳舞的、后背撞树的、练气功武术的、高喊练嗓子的……。一张小小的收费门票拦住了这么多人，要门票时公园里的人除去节假日并不很多，是休息、放松、休闲、小憩的地方。晚上则是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地方，园内还有许多幽静之处。不要门票了，公园的气氛整个变了，变成了人山人海，反倒没有了幽静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将青年们挤出了公园。将学生们的活动挤出了公园，因为没有他们的空间了，这也是社会转型期改变了公园的面貌。

（尹树鹏整理）

地震后的人民公园

口述人：尚连杰（1953年生人）

采访时间：2018年9月27日（星期四）

原住址：天津市河西区下瓦房宝和里六号院10号

1976年7月28日凌晨发生大地震，当时我在下瓦房宝和里六号院10号住，这个院原来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冀中军区地下军手枪队的联络站，也是我父亲原手枪队副队长尚双凯的家。

我被强烈的颠簸和父亲的呼喊惊醒，地震了！一咕噜从床上滚起来，与家人直接跑到院里，这时院里的几户人家也都跑到了院中，天上下着



口述人：尚连杰

雨，人们惊恐万分。这时在黑暗中隐隐看到我家住的9平方米的房子前脸已被震倒，后房山和房顶还好，家中住的父母、我和外甥女四口人都没事。全院的房子都是前脸震损了，没有全塌，各家的人没有伤着。父亲赶忙招呼着，全院的人冒着雨和余震跑出院外，来到大街上（厦门路），满大街全是从平房跑出来的人，不在乎衣衫不整了，在嘈杂中互相辨认着、问候着，不知如何是好，因当时还下着雨，我家与别家一样，

先在人民公园围墙根用塑料布搭了避雨的简易小棚子，因为那时公园的围墙很矮，没危险。记得小时候进公园 5 分钱门票，为逃票，门口的小伙伴几乎全是翻围墙进去玩的。

您问四口人就住 9 平米的房，是的。那时住房普遍困难，宝和里 6 号院的平房全是解放前盖的老房子。我家不是没机会改善，单位有几次想给改善，父亲每次都是让给了别人，总是那句话，还有比我们更困难的同志。没办法，参加过革命工作的那一代老人中，这样的人多。但他心态好，最喜欢的运动就是逛人民公园，每天都要走上四五圈，所以他身体好，



20 世纪 40 年代天津手枪队
尚双凯副队长



尚双凯每天在人民公园
走上四五圈

在我母亲 91 岁去世后的第三年父亲离世，享年 97 岁。

房屋破损，还有余震，原先的家是住不了了。后来人民公园就成了临时地震避难所，先是有胆大的爬墙进去占地儿搭临建，灾难当头，人民公园干脆就敞开大门让附近的居民



尚双凯全家合影（前排右 3 尚双凯 后排右 4 口尚连杰）

暂时避难。人们涌进公园，一家占一块儿地儿，连儿童滑梯下面都占了，把人民公园挤占得几乎没有一点空地儿了。我家在公园大亭子（藏经阁）边

上搭起了地震棚，那时搭地震棚多是自己解决，主要依靠家人所在单位，从单位拉些铁管、檩条等材料，拾点砖头就搭建起来。当时条件有限，不可能有统一要求，所以搭建的很随意，各式各样，有人形容像过去“逃难”的窝棚，后来有了点改善，还通了电，昔日的人民公园变成了由各种不规则样式地震棚组成的人民避震园。

在人民公园地震棚一住就是两三年，地震过去了，直到 1979 年 9 月，人们才陆续回家。我找了几个哥们儿，将震损的房屋前檐儿用砖头垒砌好，窗户用塑料布绷上。同时按父

亲的意思，把同院邻居家震损的房子一同修好。当时就是各家买点儿菜，做点儿饭，招待一下干活儿的哥们儿，很简单。都是互相帮助，搬回了宝和里 6 号院的家。政府根据震情和房屋修缮情况，对人民公园的地震棚进行了清理，人们陆续搬回了重新经过修缮加固的家，生活恢复正常，人民公园也逐渐恢复了公园的本来功能。

（王海冰整理）

厦门路 35 号的考察与推测

口述人：刘植才（1956 年生人）

采访时间：2018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

采访地点：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 35 号

我要谈的是人民公园正门（徽州道与厦门路交口）附近，一座老建筑的历史考证。因为我并不在人民公园那一带居住，却因为这座老建筑经常与人民公园擦肩而过，从而对这座老建筑与人民公园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

我说的这座老建筑，其实就在人民公园厦门路一侧，大门开在厦门路上，老门牌写的是厦门



口述人：刘植才

路 35 号，后墙对着一街之隔的大沽路中学。据了解，这座老建筑解放后曾先后做过天津财经学校和河北财经学院（后更名为天津财经学院，现为天津财经大学）的校舍。以后财经学院在河西区灰堆（现珠江道 25 号）建成新校舍后，厦门路校区就改成教职工宿舍。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后，老建筑被鉴定为危房。1988 年秋天，将老建筑全部拆除，如今的利和里就是在原址上重建的。根据我多年的考察与推断，觉得厦

门路 35 号老建筑与人民公园或者说与其前身“荣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本来是一体的。但相关记载在以往的史料中似乎未见明确注释。前些日子，我在收听“话说天津卫”有关李氏后人谈及家族捐赠“荣园”始末时，也未提及这座老建筑。

我从 1977 年考入天津财经学院后一直在该校学习、工作。

之所以对厦门路 35 号院有所了解，是因为我经常到这里找我的老师。那时我在柳州路住，一有时间就跑到这座老建筑，跟我的恩师聊天、探讨问题。前不久，我找



厦门路 35 号老建筑遗址

到原先居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徐守勤教授和牛庆平老师，得到了更为翔实的信息，对揭开这座老建筑的神秘面纱很有帮助。

厦门路 35 号，从外表观看，高墙几乎遮住了里面的格局，入口是带有门洞的中式门楼，它的南侧是河西区园林局。院内的主建筑是一栋南北朝向、两层的青砖西式楼房，楼房的风格比较简朴但质量不失考究。楼前的台阶用条石铺就，楼内则是木质楼梯，地面铺设实木地板。每层楼有四个房间，每个房间的室内面积均为 22 平方米，显得比较宽敞豁亮。据说，二楼靠西面的两个房间原本是没有围墙的，因为这个位置正

朝着“荣园”，在这里凭栏望去，园中景色会尽收眼底。

环绕主楼，靠着院墙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包括门房、接待室、储藏室、厨房、卫生间等。此外还有一间比较大的房



刘植才（中）与好兄弟在人民公园合影留念

子，具体面积说不好，但后来在内部打了隔断墙，分给了四户职工居住，可以想象这间房子的确不小。据说这间房子当初是舞厅，因为其他辅助建筑都是水泥或瓷砖地面，唯有这间房子铺着木地板。

在我的印象中，院子的空间并不大，建筑布局很紧凑。据牛庆平老师回忆，院内住户最多时达到24户。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的是，院子里有两棵高大挺拔的槐树，每年春、夏、秋三季，枝叶十分茂盛，遮天蔽日，给人以庭院深深的感觉。

关于这个院子原先的产权归属或者说其原业主是谁，院内老住户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它为天津“八大家”之一“李善人”家的产业。至于这个院子的当初用途，大都说他是“李善人”家的别墅，并认为修建这处别墅的目的与李氏家族的祭祀活动有关。我觉得，上述说法是可信的，归结起来有这么几个

理由：

一是当时李家曾在人民公园附近广置土地，并建有多处房产。这个院子对门的“荣园”就是李家的私家园林，另具我市教育史专家张绍祖先生考证，与厦门路 35 号院一路之隔的徽州道 2 号（原大沽路中学，现海河中学分校所在地）也曾是李氏家族的产业。因而，如果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厦门路 35 号原为李氏家族的产业就是一件“大概率”的事情了。

二是当初厦门路 35 号所在地既紧邻幽静李氏私家园林，又与特别繁华的小白楼商业区相去不远，无论购物、消费还是与寓居租界内的社会名流交往都很方便，不啻为建造别墅的理想之地。再从院内建筑的布局和功能分析，将其定位为别墅也是比较贴切的。

三是由于当时“荣园”内建有李氏家族的墓地，说厦门路 35 号别墅与李氏家族祭祀活动有关应是实情。

所以，我倾向于厦门路 35 号应为李氏家族别墅的说法。进而推断这座老建筑，可供其族人到“荣园”消闲、游览时居住或休息之用。每当清明等祭祀先人的时节，李氏家族到“荣园”聚族举行祭祀活动之际，会在别墅中小憩，或者做一些相关准备活动。按照旧时的习俗，在祭扫之后，还可能在那间被称作“舞厅”的大房间里举行家宴或其他社交活动。用现在的眼光看，它就是一个“多功能厅”。

（张建整理）

亲历人民公园辅导班 亲闻埃克斯院长葬礼

口述人：彭学敏（1956年8月14日生人）

采访时间：2018年9月15日（星期六）

原住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张家房子1号

我家自2008年搬到北辰暖香里，之前一直没有离开过人民公园一带。我1956年出生，最早住在下瓦房张家房子1号院。这是个丁字胡同，包括一、二、三号院，三号院最大，套着几个小院。从张家房子出来，过了大沽南路，对过就是下瓦房同善里，是1930年前后李善人家盖的。这里有一个民办初级小学，原是荣园李家办的，



口述人：彭学敏

设初小一、二年级，各一班，有隋、韩两位老师任教。我家1968年搬到九江路志成里6号院，地震时我们家住在人民公园小广场搭的塑料防震棚里。地震时我正在南八里台下乡，给市里父母单位打电话也打不通，特别着急，我们几位住在河西区的下乡青年愣是走了6个小时，赶到了家，一打听才知道家里人住在人民公园，我们家在人民公园住了近半年，

天气凉了，我家才搬到尖山公园临建。后来先后搬到浦口道大兴胡同、南昌路祺寿里 8 门 509、西楼后街拦桥胡同。1981 年我结婚后又在利民道爱国北里买房，住在 49 栋 103。总之，我一直没有离开人民公园，一有时间就往人民公园转转。

记得 1964 年我 8 岁在福建路小学上二年级，是半日制。我家是双职工，父母都上班，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学校就安排我们到人民公园藏经阁附近的教室上辅导班。当时进公园需要买票，我们有一个入园的卡片，盖有学校公章，可以免费入园。我们每个月交课外辅导班费 5 毛钱。课外辅导老师辅导我们完成老师上午留的作业，有不会的地方老师就给我们辅导，可耐心了。写完作业，辅导老师就带我们到儿童游艺场去玩，只要不花钱的游艺项目都可以玩，什么转盘、压板、滑梯等等都可以尽情地玩。我们女同学最爱打螺旋式的滑梯，男同学勇敢，最爱打只有两根铁棍的滑梯。在游艺场玩够了，就去看动物，人民公园的动物可多了，有狗熊、老虎、豹、狼、狮子、猴子等等，有的男同学很淘气，用手电筒透过红布照狼，引得狼嗷嗷的叫。



我最喜欢看

执笔人张绍祖（中）与彭学敏夫妇合影

活蹦乱跳的猴子，有时候给猴子扔点吃的，它还能接到，津津有味地吃着，还点头谢谢你！我们一直玩到下午快5点的时候，辅导老师让我们站好路队，送我们回家。路队路过我家住的张家房子，我向老师喊了声“老师，再见！”，就向家门走去。我在人民公园上课外辅导班一直到1966年，有两年的时间。这段亲身经历，给我幼小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象。



埃克斯院长

我从小爱听老人讲故事，我姥姥住在小西关，坐3路车就可以直通我们家，她常年住在我们家，我最爱听她讲故事。她说：“1934年8月21日下午在德国坟地德国小教堂（今人民公园一部分），为德美医院创始人、首任院长埃克斯（中文名字叫海阁士）举办过一次隆重的葬礼，从四面八方来的人有1000多人，把德国坟地周围挤得水泄不通。当牧师用沉重的语调讲完了埃克斯的生平和业绩后，他的老朋友著名建筑师盖苓、副院长伯瑞尔等五位挚友抬着木棺，在场内外一片哭泣声中，将这个平生一心只为了救治他人的医生，送到通往天堂的路口。”

我想人们为什么这么热爱这位埃克斯医生呢？原来他在德美医院里专门设置了两间为穷人治病的病房，凡在此间接收诊治的穷苦患者，分文不取。他最喜欢在这两间病室工作，常常在那里待到深夜。这个医院的医生还经常深入到里巷为穷人免费看病，我的姥姥、老姨都曾受到这座医院医生免费

治疗。

我从2017年8月14日《天津日报》“满庭芳”栏目上看到理查德·傅莱小写的《天津德美医院创始人奥拓·埃克斯教授》这篇文章，得知1934年夏天，埃克斯的一只胳膊患了痼疾。为了不影



响自己的工作安排，他很快给自己作了手术，将其痼疾切除。手术后伤口愈合挺好，但不久他开始多日持续发烧。8月11日，

1930年天津德美医院外景 埃克斯院长拍摄

他忍受着高烧和

伤痛，继续在医院里给病人作手术，之后伯瑞尔副院长看出了他的病态，将他强制送进诊所进行检查。结果是他给自己做的这个手术引起了血液感染，以至最终造成了败血症与肺部感染，同后来的白求恩病况完全一样。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全力抢救，一直处于高烧昏迷状态的伯瑞尔于8月19日永远告别了他平生的最爱的医院和患者。埃克斯病逝后他的遗孀和大女儿仍住津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将战败国德国的在华侨民统统遣送出境。而天津因念及埃克斯的功绩和为人，准予他的后人仍继续留住该市，直到1952年她们才离津回了德国。

我还听说在人民公园附近的九江路原河西图书馆、三义庄小学旁边有一个修理汽车的门脸，门口有两个动物造型的门墩，主人是德国人，叫艾克·克劳斯，他是埃克斯院长的亲戚，也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才从天津回德国。

（张绍祖整理）

① 照片 2.3 小傅莱先生提供。

人民公园——抹不掉的记忆

口述人：高玉芳（1958 年生人）

时间：2018 年 8 月 25 日（星期六）

原住址：天津市河西区九江路 77 号

我们家过去在九江路 77 号住，往南走穿过无锡道、苏州道、绍兴道，就是人民公园。可以说，在我的人生记忆中，“人民公园”是永远抹不掉的，它伴随着我的成长，许多飘浮的碎片，都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



口述人：高玉芳

先说 77 号大院，它三面楼、一面墙，围成了一个挺大的院落。院子中间有十几棵高大的槐树，树冠

几乎把院子给遮住了，夏天非常凉爽。另外，院子比马路高出半米多，形成一个缓坡，两扇大铁门上边是过街楼。仔细看你会发现，这是三栋楼的组合，主楼局部四层，其它全是二层，但是楼与楼是相通的。建筑风格与天津卫校的群楼差不多，据说也是美国营盘的一部分，起码是同时代的建筑。解放以后就成了港务局宿舍，一共住着 40 多户。幼年时期，都是姐姐带着我去人民公园，主要是看动物，猴啊、狼啊、

老虎啊，印象最深的是人民公园的水族馆，里面养了很多金鱼和热带鱼，金鱼都放在那种深灰色的泥盆里，一个盆一个品种，非常奇特，虽然叫



右侧为九江道高玉芳老宅旧址

不上名字，但能近距离的观看。所以，一去人民公园就蹲在鱼缸跟前不愿离开。再后来，靠南墙的位置，增加了一处“鸟屋”，是单独的一个小院儿，里边嘛鸟都有，有的特别好看，有的特别会叫，反正一进到那里，就叽叽喳喳的让人心动，这也为我以后迷恋养鸟、养鱼、养鸽子，埋下了伏笔。



人民公园徽州道围墙，当年也是学生们翻越的重点

少年时期，再去人民公园就用不着家人领着，因为我所在的绍兴道小学，就在人民公园跟前，我和同学们只要一想去人民公园玩玩，连大门都不走，直接翻墙

而入了。但是，从绍兴道小学进不去人民公园，它侧面隔着一个丝织厂的车间，然而胡同的另一侧是徽州道小学，徽州道小学的操场与人民公园一墙之隔。所以，我们去人民公园就溜进徽州道小学爬墙头。人民公园的围墙很有特点，下半部分是实心墙，上半部分是透眼墙，爬起来比较容易。到后来，把透眼那部分的砖块干脆给扒了个窟窿，进出人民公园就更方便了。这个位置比较背静，翻过去不远就是人民公园划船的一个码头，平时没



口述人提到的人民公园枣树林

什么人，离正门挺远，后门又经常不开，所以从来没有人“逮”我们。那时，小学就上半天课，下午我们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就开始“秘密行动”了。一开始，我们到人民公园是为了粘老褐（蜻蜓），事先在门口的修车摊，捡点补车胎甩下的下脚料，拿小铁罐熬成“粘子”，黑糊糊的，散发着臭胶皮味，然后在人民公园拔几根苇子当粘竿，什么“红辣子”、“黑老婆儿”、“轱辘钱儿”、“花丽豹”……直粘到两个手都夹满了才回家。我们一般就在塔山后面的枣树林里玩，秋天还能捡拾掉在地上的枣儿解解馋，虽然我们几个都属于淘孩子，但从来不爬树偷着摘枣儿。在枣树林侧面有块空地，好像是个“跤场”，赶

上有人在这练摔跤，我们就围过去看看，也挺着迷的。

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兴奋点开始转变了。那时，我在人民公园中学上学，“大课间”时，学校要组织全校师生做广播体操，一开始我们几个“个别分子”就在厦门路那站会儿，后来不知谁的提议，一到“大课间”就飞快的跑进徽州道上的厕所，然后从窗户翻到人民公园里。因迎面就是“儿童乐园”，大家都去抢占转马和秋千。秋千太高，我不敢上，就跟着抢“转马”。谁抢上谁就先“转”，怎么才能把转马上的人换下来呢？下面等着玩的同学就玩命的旋转，直到有的人受不了了，才主动提出来换人。这个过程其实很快，几圈下来就有“晕斗儿”的，如果成心发坏，就转起来没完。我就是那时坐“转马”，坐出毛病来的。有一回，我从转马上一下来就栽歪到地上了，两眼发黑，天旋地转，不知东南西北，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打那以后只要见到旋转的东西头就眼晕，心里发怵。

人民公园中学与人民公园的关系特别好，初中、高中时期的集训都在人民公园广场进行。那时，广场很大、很旷，坐西朝东有个水泥主席台和一面大影壁。好像河西区有什么重大活动或庆祝仪式，都把这里当成主会场。记忆比较深的，一个是全年级十三个班在广场进行“学军大比武”。学校要求我们一律身穿绿褂子、蓝裤子、解放鞋，还要扎上武装带。一个班就是一个方队并按部队的编制称为一个排。之前，专门请部队的战士帮着我们训练，从稍息、立正、向右看齐练起，到最后学会齐步走、正步走、原地转弯等等。各班都练

得差不多了，才举行那次观摩展示。我们就像接受检阅的部队一样，踏着正步喊着口号经过主席台，那场面非常震撼！另一个是在这个广场参加过好几次“公判”大会。也许我们学校离人民公园太近了，一有这类活动就有我们参与。当然还有下瓦房中学、大沽路中学、二十三中学、二十七中学……每个学校按指定地点就坐，学生们都自带板凳。就因为过去老带板凳上学，家长们就“发明”了各式折叠小板凳，谁要是能有这么一个，还挺洋气的。别说，“公判”大会的震慑力确实很强。一辆又一辆的解放牌大卡车，在军用摩托的开道下，浩浩荡荡的开进人民公园广场后台。大会宣布开始后，犯罪分子挂着大牌子，被荷枪实弹的公安民警和民兵依次押上主席台，我们学校有个老师负责在现场领喊口号。记得有一次，台上还有我们年级的一个学生，罪行是“偷听敌台广播”，宣判后好像被劳教两年。

另外，这个广场还经常放映露天电影，我也总去看，就不多说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这块儿震损的房子也不少，家家都搭地震棚，离人民公园近的住户就搭在了人民公园的空地上。一开始都是弄几根竹竿架块塑料布，下面放一张行军床或几个凳子，因为小白楼一带死伤不少人，谁也不敢回家。大概将就了一个多月，有少数房子没事的就陆续搬回去了。凡是房子震塌的、震倒的、震裂的住户都原地不动。有的单位来慰问，发放少量的救灾物资，条件好的国有企业，提供木料、杉篙、苫布，甚至砖瓦。于是，一些住户开始安营扎

寨，做起长期居住的准备，人民公园内外开始私搭乱盖临建棚，到了当年的11月底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因为天渐渐凉了，家回不去，可生活还得继续嘛！谁也没想到，这些临建棚竟然在人民公园存在了好几年。这期间，人民公园恢复开放，还专为这些临建户发放了“出入证”。我们家房子虽然没多大问题，不过也在浦口道与胜利路（今南京路）交口搭了简易棚，后来港务局把海河边的八库、九库腾出来让职工搭建地震棚。再后来，港务局在大光明码头，为职工统一搭建了两排比较像样临建房。1979年我们搬回到三义庄的新楼房。

回想起来，人民公园几乎没离开过我的视线，到了冬天本应该“冬眠”了吧？可是，滑冰的兴趣又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上学时，让家长给做个冰排子，坐在上面横冲直撞。上班后，到滨江道委托店花21块钱，买了双二手的哈尔冰牌跑刀，穿着毛衣毛裤，在冰面上跟着大人们“跑圈儿”，那个美呀！等以后，又和同学到那家委托店各花24块钱，买了一双二手的球刀，玩起来更是忘乎所以，巴不得吸引人们的眼球。不过也有倒霉的，我的一个同学，刚学滑冰不久，就掉进了冰窟窿里，幸亏那块儿地方水浅。

再说我养鸟、养鱼这段儿。人民公园的金鱼在天津市很出名，我从小就喜欢。所以刚上中学就开始在自家院子里养鱼、养鸟、养鸽子。就说我多大能耐吧，本来就养了两只鸽子，最后孳孳到了50多只，那些鸽子都是我一点点给“勾引”来的。有时鸽子的主人找来了，气不打一处来，就想把鸽子拿走。我说，它要是飞回去就算你的，多气人！我们门口有个玩闹，

看上我一对鸟，我说你如果想要就拿金鱼换。没几天，这小子拿来一对“紫兰花”把鸟给换走了。好么，这对鱼可在胡同里出名了，那大尾巴跟公主的大裙子似的，一摇一摆，别提多漂亮了。假如在阴凉地方看这对鱼是纯黑色的，一有阳光，肚皮底下泛着高贵的墨紫色。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这对鱼是那小子打人民公园里偷出来的。

过去，人民公园南墙外的琼州道马路边，有那么一段专门卖蚰蚰儿、斗蚰蚰儿，我特别喜欢到那里看热闹。后来，卖小吃的，卖小玩意儿的，卖花鸟的也都来了。尤其改革开放后，卖吃卖喝卖菜的成了主流，把本来不宽的马路都快堵死了，于是政府就把这个自发的市场挪到墙子河对岸的利民道附近。

（张建整理）